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SIGMUND FREUD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 收 李肇翔 金 锋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奥]弗洛伊德著;常宏,
徐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

ISBN 7-80105-734-1

I. 诙… II. ①弗…②常…③徐… III. ①弗洛伊德·S—
精神分析②幽默(美学)—关系—梦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103 号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著者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者 常宏 徐伟

策划编辑 江红 陈杰平

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版 博瑞激光照排厂

印刷 南方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 开

8 印张 18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80105-734-1/B·13

定价 1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SIGMUND FREUD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韦尔立	王逸明	江 红	孙进军
陈杰平	李乃庄	李正堂	李海燕
李荣贵	李 璞	张贵来	杨 华
崔曙光	曾 林	傅芝发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 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 4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

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 年 12 月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常宏 徐伟 译

目 录

第一章 分析部分	常 宏 译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诙谐的技巧	(8)
第三节 诙谐的目的	(94)
第二章 综合部分	常 宏 译 (125)
第一节 快乐的机制和诙谐的心理起因	(125)
第二节 诙谐的动机——作为社交过程的诙谐	(149)
第三章 理论部分	徐 伟 译 (169)
第一节 诙谐和梦及无意识的关系	(169)
第二节 诙谐和滑稽的种类	(189)
附录: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谜语	(244)

第一章 分析部分

第一节 引言

(一)

凡是有机会随时从美学与心理学文献中查询人们对诙谐的性质及其所占地位有过什么样的阐释的人,将不得不承认,哲学对诙谐的重视远未达到诙谐在我们心理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深入探讨过诙谐的思想家能被提到,其中有小说家琼·保罗(Jean Paul)、哲学家西奥多·维舍(Theodor Vischer)、库诺·费希尔(Kuno Fischer)及西奥多·李普斯(Theodor Lipps)等著名人物。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是把诙谐问题作为陪衬,而主要研究兴趣则转向单方面的、更有吸引力的喜剧问题上去了。

从这些文献中获得的最初印象是除非将诙谐与喜剧联系起来考察,否则,对诙谐的任何处理都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根据李普斯(1898)^① 的说法,诙谐是某种完全主观的喜剧——即是,由某种我们创造的、紧密依附于我们的行为,依附于我

^① 这本书不仅使我有勇气来从事研究诙谐,而且使我有能力来研究诙谐。

们不变地处在主体关系中,而不是客体关系,更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客体的喜剧。他还根据诙谐所产生的效果进一步解释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称的诙谐,指的是使喜剧任何有意识的和成功的再现。不管是作为研究的喜剧,还是处在实际情况之中的喜剧。

费希尔(1889)借助于其认为处在诙谐和喜剧之间的漫画来显示诙谐和喜剧的关系,喜剧与丑陋的联系是在喜剧与丑陋的某种表现方式上:“如果它(丑陋的东西)是被隐藏的,它必定在以观察事物的喜剧性方式下被揭露出来;如果它只被稍加注意或完全被忽视,它必定会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漫画产生了”……我们整个精神世界,这个我们思想和观念的知识王国,在未被外部观察之前是不会展现出来的,它不能被形象地可见地直接想象;而且它还包含着抑制、不足和扭曲——大量荒唐、喜剧的对比。为了突出强调这些情况和使其更接近审美要求,就必须有一种它本身不仅能直接想象对象且其本身就能反映在这些想象上并使其清晰的力量:一种能显示思想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只能是判断。一个诙谐就是一个产生喜剧性对比的判断;它已经在漫画中发挥无声的部分作用,但只有在判断中它才能获得它的特殊形式和其显现的自由领域。

我们看到,李普斯的贡献是在喜剧范围内区分诙谐的特征为动作,是主体积极的行为,但费希尔则在诙谐与其对象的关系中区分诙谐的特征,这种关系,他认为是思想世界丑陋性的隐藏。不可能检验诙谐定义的有效性——的确,它们很少能被思虑到——除非将它们重新置于它们原来所处的情境中加以考虑。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作者对喜剧的解释,才有可能从其中得到一些有关诙谐的知识。然而,在其他文章中,我们看到相同的作者能无需关

注诙谐与喜剧的联系而能基本地、一般地描述出诙谐的有效性特征。

最令费希尔自己满意的诙谐的特征在于：“诙谐是一个游戏性的判断”。为了显示这一点，他进行这样的类比：“正如审美自由存在于对事物游戏性的注视”。在另一处，他认为，我们没有对对象有任何需求的情况时才能成为审美的特征，特别是没有强烈需求的满足感时，我们才能满足于注视该客体的乐趣。审美态度和工作相比是游戏性的——“从审美自由中还可能涌现出：一类从常规和约束摆脱出来的判断，根据其起源，我将称其为‘游戏性判断’，在这概念里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决定因素，即使不是整个公式，但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自由产生诙谐，诙谐产生自由，”保罗写道，“诙谐仅仅是概念游戏。”

一个长期存在的受人喜欢的诙谐定义是在不相似的事物——就是暗含着相似性中发现相似性的能力。保罗在一个诙谐的形式里表达这种思想：“诙谐是一个使每对夫妇结合到一起的伪装的神父。”维舍更进一步进行了解释：“他最喜欢的是将亲戚们并不赞同的双方结合起来。”但维舍的目标是那种没有对比，因此就不需寻找相似性的诙谐。所以，他和保罗稍有不同，他把诙谐定义为，以一种令人惊异的迅速把一些在事实上、在内容上和不同类的概念连结成一体的能力。费希尔再一次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诙谐判断中，发现的不是更多的相似性，而是差异，而李普斯则指出，这些定义是和作为拥有诙谐能力的诙谐全体产生的诙谐活动相关，而不是和他所做的诙谐结果相关。

已被提出的其他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定义和描述诙谐的观点是：“观念的对比”，“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

克雷普林(Kraepelin, 1885)的诙谐定义所强调的是对比的观点。诙谐是“两个在某些方面相对的观念武断的联系和连结,通常是以口头上的词语连结作为手段”。像李普斯一样的批评者毫不费力地指出了这一公式的全部不足之处,但他自己不排除对比因素,只不过是从事其他方面进行解释。“对比是继续存在的,但不是某种附属于词语的观点间的对比,而是词语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李普斯, 1898)。他举例说明怎样理解这一点:“对比的产生仅仅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对比词各自的意义,但我们不能赋予对比的意义。”

如果最后一点进一步发展,那么“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对比就变得重要了”。某时看起来对我们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却毫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所谓的喜剧构成过程——某种说法对于我们将成为诙谐,如果出自心理学需要,赋予这一说法某种重要性时。但当我——这样做时,又把它取消了。借助这种“重要性”,任何事情都能被我们所理解。我们把一种意义赋予一种表达,并依逻辑知道其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意义。我们在其中就会发现真理,而这一真理根据经验法则和思维的一般习惯,我们是在其中找不到的。我们认为它的逻辑的和实际的结果超越了它的真实内容,一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表达的性质,我们就只有去否定这一结论。在每一个例子中,诙谐表达唤起的,也是喜剧感情的基础,我们的心理过程是存在于从意义的赋予,真理的发现,结果的认同到相关的无意义事物的意识或印象的瞬间转移过程中。

然而,这个讨论可能听起来很深入,在这里却会产生的问题是:就诙谐的概念与喜剧的概念不同而言,就喜剧感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什么是有意义与什么是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是否有助

于定义诙谐这一概念。

“困惑与启示”的因素也导致我们深入研究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①认为,喜剧就其普遍性来说,它具有某种仅能蒙骗我们于一时的显著特征。海曼斯(Heymans, 1896)则解释了诙谐的效果如何产生于经过困惑而来的启示。他据海涅(Heine)的一个著名的诙谐来显示它的意思,海涅的一个角色——可怜的彩票捐客赫希·海厄辛斯(Hirsch-Hyacinth),吹嘘伟大的巴伦·罗思柴尔德(Baron Rothschild)男爵视他为同等地位的人——相当地“Famillionairely”,第一眼一看,这个突然出现的诙谐的词汇犯了语法构成的错误,是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的东西,因此,使人感到困惑。通过理解这个词(Famillionairely)的含义,喜剧效果就产生了。李普斯进一步解释这一观点,他认为继启示的第一阶段——令人困惑的词语意味的不确定性之后,跟随着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我们认识到这一无意义词使我们困惑之后接着给我们展现其真实的意义。只是在后一启示中,我们依据普通语言学的用法,发现一个无意义的词构成整个事件的关键——这一发现使问题化为乌有——只有在这后一启示中才能产生喜剧的结果。

无论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观点对于我们来说都好像使问题更加清晰,这场关于困惑与启示的讨论使我们更接近一个特殊的发现。因为如果海涅的“Famillionairely”的喜剧效果取决于看似无意义的词语问题的解决,那么,无疑诙谐必定归因于那个词的形式及因此所形成的那个词汇的特征。

诙谐的另一特性与我们上述已经考虑过的特性毫无联系,而

①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一部,第一部分,第54页。

这一特性被权威们认为是其本质所在。“简洁乃妙语的形体和灵魂,简洁本身就是妙语”保罗写道(1804,第二部分,第42段),这句话仅仅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的那个喋喋不休的普罗提诺(Polonius)所言之语的变更而已:

简洁乃妙语之神
冗长会将其分解
成徒具浮华之外表的词藻
当然,言简为妙

在此问题上,李普斯(1898)关于诙谐的简洁说明是很重要的:“诙谐说它不得不说的东西,并不总是用很少的词,而是用太少的词——即,按严密逻辑和普通思想和言语方式来衡量,所用之词远远未达到要求。诙谐实际上是以其不言说出了不得不说之事。”

我们已经看到,诙谐和漫画的连结“必定要使掩盖和隐藏之物显露出来”(费希尔,1889)。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一论断,是因其与诙谐的关系比它作为喜剧的部分更重要。

(二)

我完全清楚,引自作家们关于诙谐的这些言论并不一定很正确。考虑到对如此复杂且微妙的思想做毫无错误的正确解释时将要遇到的困难,我不得不使那些好奇的求知者花费大量劳动来从原始资料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我不能确信他们能完全满意而归。上面收集的和那些作家所提出的关于诙谐的标准和特征——活动与我们思想内容的关系,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不相似的东西之间的配对,对比的观点,“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的相继,隐藏的东西的显露,特别是妙语的简洁性——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它

们在我们第一眼看来,好像是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容易被事例所确定,以至于我们不能处在低估这些观点价值的危险之中。但是,它们只不过是些只言片语,我们希望的是看到它们被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之后,它们对我们关于诙谐的知识并没有增多,好比我们从关于一个人人格的描述的一系列轶闻趣事中得到的东西并不多于从一个人自传中得到的东西一样。我们完全没有关于可能存在于不同判断之间的连结的深入理解。例如,作为诙谐的简洁性能处理它作为游戏性判断的它的特征是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是否诙谐为了成为一个恰当的诙谐而必须满足所有这些判断,或者只满足部分。如果只满足部分,那么哪些可被另外一些取代,哪些是必要的。我们也想通过那些被认为是诙谐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来分组和归类。我们从文献中所发现的分类,一方面是根据诙谐采用的技术方法(例如双关语或词语游戏);另一方面,也根据诙谐在话语中的使用(例如,用于漫画、特征及冷落目的诙谐)。

因此,我们在阐释新的揭示诙谐的秘密的企图中不该存在困难。为了能取得成功,我们要么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要么依据集中注意或提高兴趣而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的努力。我们至少能保证在后一方面不会失败。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权威们均满足于少量已得到确认的事例来达到其研究目的,而每个人不同程度的都从其先驱那里采用一些相同的事件。我们当然不能推卸责任去分析那些曾有助于权威的著名研究者研究诙谐的相同事例。但为使我们的结论更具有广泛的基础,我们仍试图转向新的材料。我们应该选择这样诙谐的例子作为我们研究的例子,即那些曾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且给我们带来更多美的诙谐的例子。

诙谐这一课题值得我们克服那么多困难吗？我想，它们毫无疑问值得那样做。撇开促使我想了解诙谐问题，照亮我研究之路的个人动机不谈，我恳请大家注意所有心理事件的发生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一事实保证了在一个遥远的领域内所得到的心理学发现，都将会对另一些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应该会记得诙谐在我们的社会中所产生的独特的，甚至是激动人心的魅力。一个新的诙谐像一个普遍令人感兴趣的事件那样起作用。它像最近的胜利新闻一样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即使是著名人物，当他们认为有必要在自传中讲述其出身、其所到过的城市乡村，与之相联系的要人的故事时，也不会因在其自传中叙述他们所听见的诙谐而难为情。^①

第二节 诙谐的技巧

（一）

让我们跟随机遇的引导，思考在前一章遇到的第一个例子。

在题为“卢卡浴场”的赖泽比尔德那部分里，海涅介绍了一个有趣的彩票掇客和玉米花制造商——汉堡的赫希·海厄辛斯，他向诗人吹嘘他与富有的巴伦·罗思柴尔德男爵的关系时，最后说道：“尊敬的先生，我和所罗门·罗思柴尔德先生并肩而坐，这如同上帝将会赠与我所有好事情一样真实，他视我与其是平等的人——很‘Famillionairely’。”

^① 参见《冯·福尔克回忆录》(1897)。

海曼斯和李普斯使用这一诙谐(一个公认的绝妙而有趣的诙谐)来显示他关于诙谐的喜剧效果是产生于“困惑与启示”的观点。但是,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在一边而问另一问题:“是什么使赫希·海厄辛斯的这一说法成为诙谐呢?”只有两个可能答案:要么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本身具有成为诙谐的特征,要么诙谐存在于被给定于句子中的思想的表达之中。无论诙谐的特征存在于哪一个指示中,我们都将更深入地探究并努力去查明。

思想,一般说来可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用各种词汇,即,不同的词汇都同样恰当地表达同一思想。海厄辛斯的谈话以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表达了他的思想。如我们所见,这种方式特别奇特,而且也不是容易理解的那种。让我们的其他尽可能精确的词汇来试着表达同一思想。李普斯已经这样做了,并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地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诗人的意图。他写道(1898):“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海涅的意思是说他(海厄辛斯)受到这一款待是以亲近为基础的——不是那种一般的亲近。这种亲近并非是具有百万富翁特点的人普遍接受的规则。”如果我们换个说法且不改变以上意思或许更适合赫希·海厄辛斯的说法:“罗思柴尔德男爵视我为他的同等人,相当友好,即,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能。”“我应该加上,凡经历过一个富翁表现出的优越感的人,其中的经验总是包含着某种那么非常令人不快的东西。”^①

^① 稍后,我们回头讨论这一诙谐(见本书第149页),那时我们有机会校正李普斯译的这段译文,我们先将李普斯的这段译文作为我们自己版本的起点。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下文中的讨论(可以看到,“familiär”这个词也可能有“属于家庭”的意思)。

现在,不管我们坚持这一思想的两种具有同等有效性的表达方式中的哪一种,我们已经回答了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在此例中,成为诙谐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思想中。海涅借海厄辛斯之口说出的是——一种正确而精细的观察。一个毫无错误的痛苦观察,这种观察在一个面对如此巨大财富的穷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冒险把这描绘成诙谐的本质。如果任何人不能在考虑解释的过程中,走出他对诗人所给予的形式的回忆,因此而认为思想本身也包含在诙谐的本质之中,那么,我们可以指出一个确定的标准,即诙谐的特性在解释中被丢失了。赫希·海厄辛斯的说法使我们捧腹大笑,而李普斯的或我们自己的精确解释,虽然能使我们愉悦和有所思,却不可能使我们发笑。

如果使我们的事例成为诙谐的并不是存于其思想中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其形式中寻找,在其表达的词语中寻找。我们仅需研究其表达形式的独特性就能抓住什么可以叫做诙谐的言语或表现技巧,什么是与诙谐的本质密切联系的东西,如果它被其他东西所代替,那么,诙谐的特征和效果就消失了。此外,在将诙谐的言语方式看得如此重要这一点上,我们与专家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费希尔(1889)写道:“首先,正是纯形式使判断变成诙谐。”并且,我们还想起保罗的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解释了诙谐这一特征——“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语言中,位置都是致胜的力量”。

那么,诙谐的“技巧”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思想,例如在我们的事例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什么的发生使我们开心大笑呢?两件事——我们通过比较我们的译文与诗人的原文发现第一,相当多的“缩写式”的出现。为了充分表达诙谐所包含的思想,我们被迫在

“R. treated me quite as his equal – quite famillionairely.”(R 待我如同等人,相当的友好。)这句原文之上加上一句字数少得不能再少的附言“that is, so far as a millionaire can”(即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能)。即便如此,我们仍感到还有必要提供一个进一步解释的句子。^① 诗人附加的更为简短:“R. treated me quite as his equal-quite famillionairely.”在此诙谐中,由第二个句子附加到第一个句子上的叙述友好对待的全部限定消失了。

但并不是没有留下一个能使我们重构它的替代物。因为第二个转变也已被做出了。“familiär”(亲密的、不拘礼节的)一词处在没有诙谐性表达中,被转换成为诙谐的表达中的“famillionär”一词。毫无疑问,诙谐之得以成为诙谐的特征及其引起发笑的力量正是取决于这种话语结构。这一新合成词前部分与第一句的“familiär”重叠,其后半部分则对应第二句的“Millionär”百万富翁。如其所是的那样,它代表第二句的“Millionär”部分,因而也代表整个第二个句子。这样,它迫使我们处在推断这诙谐表达被忽略的第二个句子位置上。它可以被描绘成由“familiär”和“Millionär”两个成分组成的“综合结构”。图解这一合成词从作为其成分的两个词^② 中派生出来的方法将是非常具有诱惑的:

F A M I L I	Ä R
M I L I O N Ä R	

F A M I L I O N Ä R	

^① 李普斯的翻译也是正确的。

^② 这两个词分别用正体和斜体排印。它们的普通音节都是用粗体字排印的,那个几乎没有发音的第二个“l”当然可以不予考虑,这两个词共有几个音节,这一事实给诙谐提供了构建这个合成词的机会。

这样,便可以用下述方式代表将思想转变为诙谐的过程,这一方式在第一瞥时,好像是臆想,然而其却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准确的成果:

‘R. treated me quite *familiär*,
that is, so far as a *Millionär* can.’

“R待我如此亲密,即,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

现在,让我们设想在这两个句子之外有一种压力作用其上,并且,由于某种原因,第二个句子具有较少的抵抗性,随即,第二个句子便消失了。而其最重的成分“*Millionär*”一词,成功地抵抗了这一挤压,像其原来那样存在着,被推向了第一个句子,并与第一个句子中非常类似于它的成分“*Familiär*”融合成为一体。这样第二句的本质成分得以保留的机会出现了,第二句更愿意分解其次要的成分。这样,诙谐产生了。

‘R. treated me quite *famili on är*.’
 / \
 (*mili*) (*är*)

如果我们不阐明如此相同的这一压力,的确这一压力我们尚不了解,这个压力过程——根据它诙谐得以形成——即,诙谐的技巧——那么在这例子中可以被描绘为“伴随着替代词的形式凝缩”;在现在的这个例子里,替代词的形式存在于“合成词”的形成里。这个合成词“*Famillionär*”其本身就难以理解,但在其所处的上下文中却能被即刻理解并被认为富有意义。它是诙谐致笑效果的工具——然而,诙谐致笑的机制并没有因我们发现诙谐的技巧而变得更加清晰。一个语言学的凝缩过程,包括(伴随)以合成词作为手段的替代词的形成过程,以何种方式使我们愉悦并发笑呢?

显然,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以前,我们暂且把其放在一边。目前,我们将继续讨论诙谐的技巧。

我们希望诙谐技巧对于揭示诙谐的本质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这致使我们立即查找是否还有其他像海涅“Famillionär”那样构成的诙谐例子。这样的例子并非很多,但也足够组成被合成词的形式特征化了的这样的一小组。海涅自己就已从“Millionär”这个词推衍出第二个诙谐——复制它自己,像它被想象的那样。在《观念》第十四章,^①他谈到“Millionarr”,它明显是由“Millionär”和“Narr”^②合并而成的,就像在第一个例子里一样,它表达了一个被抑制的附属的思想。

这里我可以另外再举几个例子——柏林有个喷泉(Brunnen),它的建造使福尔克贝克市长(Burgomaster Forckenbeck)陷于不受欢迎的境地。柏林当地人称其为“Forckenbecken”。这一称呼肯定是在其中包含着诙谐,虽然有必要用废弃不用的词“Becken”来取代“Brunnen”,为了使其与这一称呼联成一体——“欧洲之声”曾制造了一个粗糙的诙谐,将一君主的名字从 Leopold 改成 Cleopold,以示其曾有一时与一名叫 Cleo 的女士亲密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一诙谐作为凝缩的产物使以一个单词来表示引喻这一令人烦忧的行为变得生动起来。一般来说,专有名词容易成为这种诙谐技巧的牺牲品。在维也纳有两个名叫萨林格尔(Salinger)的兄弟,其中一个是 Börsensensal(证券经纪人,Sensal=经纪人)。这为人们称其为“Sensalinger”提供了方便。为了和其哥哥区分开

① 参见《赖泽比尔德》第二部。

② 德语“傻瓜”、“笨蛋”。

来,其弟弟被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Scheusalinger”。^①这样做既方便又诙谐,我不能说这样做是否合适。但我们在研究诙谐时,一般不对此进行过多的追究。

我还曾听到过这样一个有关凝缩作用的诙谐。一个迄今仍在流浪的年轻人,在离开某地一段时间后,回来拜访一位住在那个地方的朋友。朋友看到来访者手上戴着一个 Ehering(结婚戒指),惊讶地叫道:“什么?你结婚了?”回答说:“是的。”“Trauring but true.”(这却是真的)^②这是一个极好的诙谐。“Trauring”是两个成分的结合:“Ehering”变成“Trauring”和“traurig, aber wahr”(悲伤,却是真的)。这一合成词像“famillionär”一样,不难理解且是非存在的结构,而且是一个与其所代表的两个成分中的一个完全相符。而这一事实并没影响诙谐的效果。

在一次对话过程中,我自己也曾非有意地为诙谐提供了材料,这个诙谐再次类似于“famillionär”的结构。我在向一位女士谈起一位被不公正的忽略的科学家所做出的贡献时,“噢!”她说,“这个人应得到一块纪念碑(a monument)”,“或许有一天他会得到的”,我回答说,“但 momentan 目前他很少可能得到。”“Monument”和“momentan”具有相反的意义。该女士继续合并它们:“好吧,让我们祝愿他取得一项 monumentan^③ 的成就。”

我还有几个外文的例子,^④它们给我们展示像凝缩

① Scheusal 意为“怪物”。

② Traurig 意为悲伤之意, Trauring 是 Ehering 的同义词。

③ 一个不存在的词。在英语中有 Monumental 意为不朽的。

④ 本段与接下来后文的三个例子为 1912 年增补。

“famillionär”同样的结构机制。其是布里尔(A. A. Brill, 1911)为更好地讨论这同一课题所采用的英文例子。

布里尔告诉我们,英语作家德·昆西(De Quincey)曾在某处评论到,老年人倾向于陷入他们的“anecdote”里。这个词是以下两个词部分重叠的融合:

ANECDOTE(轶事)

DOTAGE(老年糊涂).

布里尔还从一篇匿名的短篇故事里发现,圣诞节假期被描绘成“the alcoholidays”——一个相似的融合:

ALCOHOL

HOLIDAYS.

福楼拜出版其著名的小说《萨朗宝》(*Salammbô*)之后,该书故事情节是存在于古代迦太基(Carthage)中。圣·波夫(Sainte Beuve)基于其过度的细节修饰,嘲笑其为“Carthaginoiserie”:

CARTHAGINOIS

CHINOISERIE.

然而,这组诙谐事例中最好要数奥地利一位官员所产生的诙谐,他在从事重要的科学和公众社会工作之后,现在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员,由于很难找到更好的事例,我冒昧地运用他制作的诙谐作为研究材料。^① 实际上他制作的所有诙谐均给我留下同样的印

① 我有权这样做吗? 至少我没有草率地解释这些诙谐。它们在维也纳尽人皆知。爱德华·汉斯里克(Eduard Hanslick)著名音乐评论家——在《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及他的自传中已把它们中的很多公诸于世,至少其他的诙谐,口头传说中难免发生歪曲。如果是这样,我就应为此负责。[N先生可能是法学教授,1881年起任最高法院院长的约瑟夫·昂格尔(Josef Unger, 1828—1913)]。

象。

一天,N先生注意到一位显然因给《维也纳日报》写一系列的无聊乏味文章而尽人皆知的作家的形象。这位一头红发的作家,其文章所处理的都是拿破仑一世与奥地利的关系中的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当N先生一听到别人提起该作家的名字时,他问道:“匆忙处理拿破仑家世故事的不正是这位‘roter Fadian’吗?”^①

为了揭示这些诙谐的技巧,我们必须应用还原法(the process of reduction)^②来处理诙谐,其方法是通过改变诙谐的表达方式而代之以能从好的诙谐中推论出来的全部原初意义,从而清除诙谐的诙谐性。N先生的诙谐——关于“roter Fadian”——源于两个成分,一个是对作家的贬低性判断,另一个则是歌德(Goethe)对“Wahlverwandtschaften”^③引申于来自《欧蒂莉的日记》(*Ottilie's Diary*)的著名笑话的回忆。坏脾气的批评家会这样写道:“这就是那个只写拿破仑在奥地利的烦人故事而永不会写出什么好作品的

① “Roter”的意思是“红色的”。“Fadian”的意思是“笨蛋”。词尾“-ian”有时加在形容词之后,使“fellow”(家伙)带有蔑视之意。同样,“grob”的意思是“粗鲁的”,“Grobian”意为“粗鲁的家伙”,“dumm”意为“愚蠢的”,“Dummian”意为“蠢货”。形容词“fade”或“fad”(像其法语的对应词)的意思是“枯燥乏味的”、“乏味单调的”,最后,“Faden”意为“丝线”。如果再遇到这些,就会明白了。

② 在本书此处或他处,弗洛伊德用“reduction”一词是在以下的意义上使用的——使某物回到其最初的形式。在前面有关海涅的诙谐的研究中,他已经使用过这一方法。同样,关于动词“to reduce”的类似用法,可见第20页的例子。

③ “我们听说英国海军有一种特殊的训练。皇家船队的每一条绳索,从最粗到最细的,都用一根“roter Faden”(红线)贯穿之中而编织成。要想抽出些红线,就必须解开整条绳索。同样,情感和信赖的一条线索贯穿于欧蒂莉的日记中,使其成为一体,并成为其整体的特点。”(歌德《亲和力》,20, 212)

人!”这种评论一点也不诙谐。歌德的那个恰当的类比如果如此处理的话,也不会是一个漂亮的诙谐而肯定不能引起笑声。只有两个成分被放在两者相互关联之中,并服从于凝缩和融合的特殊过程时,诙谐才会出现——且是第一流的诙谐。^①

在“Wahlverwandtschaften”中,对令人厌烦的历史学家的贬损性判断和美妙的类比的连接比在许多相似的事件必定会以更简单的方式产生(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不能使其明白易懂)。我将试图以下述结构来代表可能是事件的实际过程的东西。首先,这一故事中经常复现的同一主题的元素可能使N先生模糊地回忆起非常熟悉的Wahlverwandtschaften中的段落,此段落通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它像一根红线(roter Faden)一样发挥着作用。”“roter Faden”的类比现在在第二句表达中起到修改的影响,作为结果,偶然环境中受到侮辱的人也变成rot(红的)——这就是说有着红头发。这样,它就变为:“原来如此,正是那个红头发的作家写了关于拿破仑的令人生厌的故事!”至此带来两个片断凝缩的过程开始了。在其压力下,它在含有“rot”因素中找到了第一个支点,“boring”被吸收到“Faden”(线)之中,并变成“Fad”(单调乏味的)。在这一过程之后,这两个成分融为一体成为此诙谐的实际表达形式。在此事件中,在此诙谐产生中,引语比那个贬损性判断拥有更大的分量,毫无疑问地从一开始就单独出现。

① 弗洛伊德说,我几乎不必指出,这一个不变观察与诙谐是一种游戏判断之间的契合度有多么小。

'So it is that *red* person who writes this *fade* stuff about N [apolcon].
The *red* *Faden* that runs through
 everything.'

"Is not that the *red fadian* that runs through the story of the
 N[apoleonids]?"

在第一章第三节(三)中,当我以某种观点而不是纯粹形式性的观点来分析这一诙谐时,我将要在上述解释中补充一个理由,但也要修正这一解释。然而,无论上述解释还有什么其他令人怀疑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凝缩确实发生了。一方面,凝缩的结果再一次表现为值得重视的相当数量的缩写词汇。但在另一方面,取代其所形成的一个明显合词的是它的两个成分的构成物的相互渗透。的确"roter Fadian"有可能仅作为一个滥用词而存在。但在我们的例子中,它的确是凝缩的产物。

如果就此点来说,读者对破坏其诙谐的乐趣而没有解释此乐趣的来源的方法感到愤懑的话,那么,我恳请他再有些耐心。目前,我们只处理诙谐的技巧。如果我们追究的相当深,那么,观察的结果就会是这被期待的结果。

对最后的例子的分析,为我们发现这一结果做了准备。如果在其他的例子中又碰到这样的凝缩过程,那么,替代被压抑的东西的将不会是一个复合结构,而是某种表达方式的转换。我们或许从另一个N先生的诙谐中知道这某种替代的形式是什么。

"I drove with him tête-à-bête." (我正与他 tête-à-tête 的驱车前进。)^① 没有比还原这个诙谐更容易的事了。显然,它仅意味着:

① 法语 tête-à-tête 的近义词,原意为“面对面的”。

“我与 X tête-à-tête 的驱车前进, X 是一头蠢驴。”

这两个句子哪个也不是诙谐。它们可以被放在一起:“我与那头蠢驴 X 面对面的驱车前进。”然而,这也不是诙谐。只有在省去“蠢驴”二字,将“tête”的一个“t”转换成“b”成为“蠢驴”的替代词时,诙谐才会出现。伴随着这一微小的修改,被压抑的“蠢驴”又再次被表达。这组诙谐的技巧可被描绘为“伴随着微小修改的凝缩”,或许可以设想,修改愈少,^① 诙谐愈好。

另一组诙谐的技巧虽并不是没有其复杂性,却也是相似的。在谈论一个应该给予很多表扬但也发现很多缺点的某人的过程中, N 先生评论道:“是的,虚荣是其 4 个阿基利斯(Achilles)脚后跟中的一个。”^② 在此事例中,微小的修改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取代这位英雄自己拥有的一个阿基利斯脚后跟的是带来问题的 4 个脚后跟。4 个脚后跟——只有毛驴^③ 才有 4 个脚后跟。这样,凝缩在这一诙谐中的两个思想可以这样表达:“除去其虚荣心, Y 是个杰出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他——与其说他是个人不如说他是头毛驴。”^④

我碰巧听到过一个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诙谐。但这一诙谐与

① 在 1925 前的版本中,它被印作“替代性修改”(substitutive modification)。

② (1912 年加的注)海涅好像更早地在谈及阿尔弗雷德·德·马塞特时采用过此诙谐。

③ 在此及以前的例子中,实际滥用的德文词是“Vieh”,其字面意思通常是更为普遍的意思“家畜”。

④ 此例技巧的复杂性在于下述事实:省略辱骂的修改被替换必将被描述为后一个的间接提示。因为通过推理它将导致后一个,因为另一因素使这一技巧复杂化了,参见下文第一章第三节。

上面的诙谐很相似,但更简单。两个都在学校读书的兄弟中,一个很优秀,而另一个很普通。碰巧有一次那个优秀的学生退步了,母亲谈及这个问题时,一方面表明她的关切,另一方面担心此事意味着他无止境堕落的开始。一直生活在其兄弟阴影下的另一个男孩迅速抓住这个机会说:“的确是这样,卡尔正用四条腿向后退。”

此处的修改在于他也同意另一男孩正往后退的意见这一短语的确信的补充。但这种修改却代表并取代了他为袒护自己而做的那种充满感情的辩解:你绝不该仅仅因为他在学校更成功,就认为他比我更聪明。终究他只是一头蠢驴——即,比我更愚蠢。

N先生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诙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洁的伴随微小修改的凝缩的例子。他评论一位公共生活中的要人:“他身后有一个好前途(he has a great future behind him.)。”这位被评论的人,很年轻,并依据其出身、教育和个人素质似乎命中注定他在将来要成为一个大的政治党派的领导人,且稳定地进入政府首要部门。但是时代变了,该政党也不再被公众认可了,这位曾注定要做领导人的青年的前途可预见为一无所有了。所以取代这一诙谐的最简洁的还原^① 应是这样的句子:“The man has had a great future before him, but he has it no longer(这个人前途无量,但他不会再有了).”代替“had”和第二个从句的只是在用“behind”一个小的改变取代 before 这一基本句子(主句)上。^②

① 见前文第16页中有关“reduce”的脚注。

② 以后我们将讨论的诙谐技巧中有另一个因素发挥着作用。它关涉到修改(通过反义词的代表)或通过某些荒谬的东西表现的真实性质。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诙谐技巧同时采用不同的方法。但这里,我们只能一一地介绍它们。

N 先生几乎把同样的技巧运用在一个关于绅士的事例中,这位绅士仅由于曾拥有当作农场主的资格而当上了农业大臣。公众意见认为他是曾任此职位的人中最无能的人,当他辞职后又去过其感兴趣的农场生活时,N 先生提起他时说:“像辛辛纳特斯一样,他又回到了他的犁前。”

然而,这位也是从乡下应召来到办公室工做的罗马人,回到的是他的犁后。无论何时,那时或现在,走到犁前的只能是一 an ox^① (公牛)。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② 有另一个用微小修改而成功的凝缩的例子。他写道,一个煽情主义刊物的记者曾去过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国家旅行,其乘坐的是“Orientexpresszug”,^③ 无疑,这一词合并了其他两个词:“Orientexpresszug”(东方快车)和 Erpressung(敲诈,勒索)。根据上下文情况,Erpressung 这一成分只能作为 Orientexpresszug 的修改而出现——动词“旅行”所要求的一个单词。这一诙谐,由虚假的错误印刷所引起,还对我们的兴趣提出其他的要求。^④

与此类似的--系列例子很容易被找到。但我认为无须要求其他新例子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抓住在第二组中凝缩和修改技巧的特征。如果我们比较第二组与第一组,这些技巧存在于伴随凝缩的

① “Ochs”在德语中的意思和英语中的“ass”一样。

② 只有在 1905 年的版本里,这位作者的名字才被印为“一位机智的作者”。卡尔克劳斯是维也纳的一位著名的记者和编辑。也可见下文。

③ 一个不存在的单词,解释见下文。

④ “作为诙谐与动作倒错的分界线的存在。”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六章,B,例 19)。

合成词形成之中,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本质的,而它们之间的转化也是经常的。合成词的形成和修改均可纳入替代词的形成概念中,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把合成词的形成描绘为用第二个成分对基本单词的修改。

(二)

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暂停一下,反问我们自己,我们从这一课题的文献中所了解到的什么因素与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有着部分或全部的重合。很明显,是被保罗描绘为“机智的灵魂”的简洁因素。但简洁本身并不构成诙谐,否则,每一个简短的评论都成为诙谐了。诙谐的简洁必须是一种特殊种类的简洁。我们会回忆到李普斯试图精确地描述诙谐的这种特殊的简洁性。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诙谐的简洁通常乃是一个特殊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存在于形成诙谐词——替代词的形成这一轨迹之后,通过旨在消除这一特殊的凝缩过程的还原法的运用。然而,我们会发现诙谐完全依赖通过其凝缩过程所建立的语词表达。当然,我们现在的全部兴趣都转移到这种奇怪的过程,这一过程,迄今为止很少被研究过。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诙谐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诙谐所带给我们乐趣的成果,怎样最初从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

我们这里所描绘的作为诙谐技巧的过程是否相似于已经被我们所知的存在于其他领域中的心理事件的过程呢?它们存在于一个单一的领域,且这领域明显很遥远。在1900年我出版的一本书,就像其标题《梦的解析》所表明的那样,此书试图揭示梦中令人困惑不解的东西,并试图将其作为我们普通心理机能的产物来探讨研究。在此书中,我有机会对比明显或显明(manifest),但经常

是很奇怪的梦的内容(content of the dream)和隐喻,或隐含(latent),但完全合乎逻辑的梦从其衍生的梦的思想(dream-thoughts)。研究了使梦从“隐梦”(latent dream-thoughts)产生的过程,及这个转变过程中包含的心理力量。对于这所有的转变过程,我给其取名为“梦之进行”(dream-work),被我视为“梦之进行”的一部分的凝缩过程,极其相似于在诙谐技巧发现的凝缩过程——这一凝缩过程导致了词的缩写,并创造了具有同样特征的替代形式。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的梦时,都会熟悉出现在梦中的人和物的复合结构。^① 的确,梦在词语中构建自己,并通过分析被解剖(例如:“Autodidasker”=“Autodidakt”+“Lasker”)。^② 在其他情况——事实上更经常——梦的凝缩工作产生的不是复合结构,而是除去另一种资源——修改,即像N先生诙谐中的修改——从其中衍生的附加和转变,即产生正好类似某人或某物的图像。我们不能怀疑在这两个事例中,我们面对相同的心理过程。而这一过程,我们可从其同一的结果中识别出来。在诙谐的技巧和梦之进行之间的深入类比,无疑必将提高我们对前一个的兴趣并对我们自己产生一个期望,即诙谐和梦之间的比较将会有助于揭示诙谐。但,我们在进行此项任务时将会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必须反思到,我们只研究很少的诙谐的技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准备依据的向导——类比是否在实际上可行。我们将因此远离与梦的比较而回到诙谐的技巧,就像以前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此研究暂留下宽松的结尾,以便我们在后面可能会再次拾起这个话题。

① 《梦的解析》(1900a, 4, 293)。

② 同上, 4, 298。

(三)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是否伴随着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能在每个诙谐中发现,并因此能作为诙谐的技巧的一个普遍特征。

在此,我想起了一个诙谐,我之所以能回忆起它应归因于我所听到它的特殊环境。我年轻时的一位杰出的教师,我们认为他不能欣赏诙谐且从他那里我们未听到过一个诙谐,一天,他笑着走进学院,并急不可耐地给我们解释是什么导致他这么开心。“我刚读到一个很不错的诙谐,”他说道,“一个年轻人被引荐进了一个巴黎的沙龙,这个年轻人是著名的 J. J. 卢梭(Rousseau)的一个亲戚,其名也叫卢梭。而且他还有一头红发。但他行为举止非常窘迫,因此,女主人对向其引荐的绅士严肃批评道:你使我认识一位 roux(红头发)和 sot(傻瓜),而不是 a Rousseau(一个卢梭)。”^①至此,老师再次笑了起来。

依据权威的命名法,这一例可被归为“Klangwitz”^② 一类,属较低的一类,其使用专用名字来做语言游戏——例如,像《华伦斯坦的营地》(*Wallensteins Lager*)这部著作中卡布什(Capuchin)修士的布道中的诙谐一样。众所周知,后者是 Abraham a Santa Clara 亚伯拉罕的圣·克拉拉风格的模仿:

Lässt sich nennen den *Wallenstein*,
ja freilich ist er uns *allen* ein *Stein*

① 法语“Roux-sot”确实和“Rousseau”发音相似。

② “sound-joke”(声音诙谐)依赖于声音的诙谐,见下面第一章第三节(五)。

des Anstosses und Ärgernisses.^①

然而这一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我们立即会发现，我们所要希望能证明的特征是一个普遍的东西，它在首先出现的新情况下并不存在。这里既没有省略，也几乎没有缩写词。该女士自己直接地在其诙谐中展示了我们所能归之于她的思想。“你让我产生了一个关于会见(J.J. 卢梭的亲戚的期待——或许是精神上相似的)——而他竟是：一位红头发的傻小子(a roux et sot)”。的确，我添加了一些词句；但这种还原的尝试并没有消除诙谐性。诙谐存在并附属于词语 $\frac{\text{ROUSSEAU}}{\text{ROUX SOT}}$ 发音的同一性中。

因此，证明了伴随着替代词形成的凝缩过程在这一诙谐的产生中并没有起到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新的还原尝试使我认识到，直到用其他的词替换“Rousseau”这个名字，诙谐才得以出现。例如，如果我以“Racine”(拉辛)代替它，该女士的批评还是尽可能地被保持，却失去了其作为诙谐的每一痕迹。现在我已知道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一诙谐的技巧，虽然，我仍会犹豫系统地阐释它，我将试着做这些：诙谐的技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此事实由一个词和与其相同的词之中——名字——出现在其被用两种方式使用的方法中，一次是作为完整的使用，另一次是被分割成像字谜游戏。

① 席勒的《华伦斯坦》第八场，原文：“他让别人叫他 Wallenstein(华伦斯坦)。的确，他对我们所有人(Allen)而言是一块令人生厌的烦恼的石头(Stein)。”——亚伯拉罕的圣·克拉拉是一个著名奥地利的受欢迎的传教士和讽刺作家(1644—1709)——而且，作为另一原因的结果，这个诙谐(关于卢梭的诙谐)使人更多地思考，但这只能在以后加以更多的陈述。

样的不相干的音节。

我能举出一些技巧完全相同的例子。

据说,一位意大利夫人^①在报复拿破仑向她说的一句不够机智的评论时,曾运用词的双关用法这一相同技巧来进行反驳。在一次宫廷舞会上,拿破仑指着一位她的同胞说:“Tutti gli Italiani danzano si male.”(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跳得那么糟糕!)她很快地回敬一句:“Non tutti,ma buona parte.”(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而是很大一部分。)(布里尔,1911)

当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在柏林一度上演时,批评家抱怨该作品缺乏适宜的古代韵味。机智的柏林人用下面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批评:“Antik? Oh,nce.”^②

类似的肢解式的诙谐,在医学界随处可见。如果有人问一位年轻的病人他是否有过手淫,回答肯定是,“O na,nic!”^③

在上述三个^④例子中,这些足以满足这一类了,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诙谐技巧:在每个例子中,一个名字被用了两次,一次作为整体使用,另一次是被肢解为孤立的音节,当这些音节被分开时,给出了另外的意义。^⑤

这种同一词多用性,一次是作为整体,再一次是作为其肢解的

① 此例子是1912年版附加的

② Antique在柏林方言中,发音近似于“Antigone”。

③ 其字面意思是“噢,没有。从来没有”,而Onanie(onanism)是与德语词“手淫”一样。

④ 按正确的说法,1912年就应将“三”改成“四”,但忘记改动了。

⑤ 这些诙谐的精华依存于另一个更高级的技巧再被同时使用这一事实——就此点来说,我也可以注意到诙谐和谜语的连接。哲学家(转下页注)

音节,这种用法是偶然遇见的一种技巧的第一个例子——不同于凝缩技巧的例子。但我们遇到的那些过多的例子必然使我们经过批评反思后确信,这一新发现的技巧很少能被限制在这个方法上。这里有好多方法——到底有多少至今仍不可知——在这种同一词语或同一话语材料能被多种方式用在一个句子里。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将被看做产生诙谐的技术性方法吗?好像是这样。接下来的这个诙谐的例子将证明这一点。

(接上页注)布伦塔诺构造了一谜语,在其中它们不得被猜想具有什么意义,因这很少数目的音节被以这种或那种方法组成一个词,且此词给出了不同的意义。例如:“*liess mich das Platanenblatt ahnen.*”(法国梧桐树的树叶使我去想。)在这里“*Platanen*”和“*blatt ahnen*”听起来好像是相同的词。或“*wie du dem Inder hast verschrieben, in der Hast verschrieben.*”(当你为一个印度人开药方时,你因匆忙使钢笔滑落下去。)笔误在这里,*Inder hast*(给印度人)和“*in der Hast*”(由于匆忙)听起来是相同的。一个相同的英语句子会使这一点更清晰:“*he said he would solicit her solicitor.*”(他说他将恳请她的律师。)这些被猜的音节被插在句子的合适位置,在重复的发音“*dal*”掩盖之下,(这样,英语例子将位于:“*he said he would daldaldaldaldaldaldal*”)这位哲学家的一位同事对他进行了攻击,当这位同事听说哲学家的长子结婚时,他问道:“*Daldaldal daldaldal? —Brentano brennt-a-no?*”(布伦塔诺——他在出生吗?)

在这“*daldal*”谜语和上面文字中的诙谐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在前一个中,技术作为前提条件被给予,而后词语才被猜测;而在诙谐中,词语是被给予的,而技术被隐藏了。

在问题中的布伦塔诺,是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弗洛伊德曾作为维也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参加了布伦塔诺的哲学演讲。关于这些谜语的更多解释在下面的附录中。

首先,可拿来同样的话语材料,仅在某排列方式上做出某些改变,这种改变愈小——得到愈多的某物用同一词语被说出的印象——该诙谐的技巧就越好。

“X先生及其夫人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一些人认为是丈夫已赚了很多钱,所以靠存些钱(sich etwas zurückgelegt)来生活;另一些人认为是他妻子有靠山(sich etwas zurückgelegt)所以她能挣许多钱。”^①

多么巧妙的诙谐啊!用如此节省的方法获得如此的效果!“赚了很多——存些钱(sich etwas zurückgelegt);轻松一点(sich etwas zurückgelegt)——赚了许多”。只是颠倒了这两个短句子就把对关于丈夫所说的和关于妻子的暗示区分开来。这里顺便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此诙谐的全部技巧(见本书第38页和第78页)。^②

如果我们扩展“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使之包含这样的事例:诙谐赖以寄身的那个词(那些词)第一次出现时不予改动,第二次出现时才予以轻微的修改,那么,更为宽广的游戏领域向诙谐的技巧敞开了。这里举个例子,是有关赫尔先生的笑话:

他听到一位犹太人的绅士对其犹太民族的特点所做的充满恶意的评论。“赫尔·霍夫纳特先生,”他说:“你在以前是激进的犹太

^① 丹尼尔·斯皮策(1912,1,280)。斯皮策(1835—1893),维也纳的一个记者。

^② (1912年附加)这同样是布里尔(1911)在《奥利弗·温德尔·霍默斯》中报道的极好的诙谐“Put not your trust in money, but put your money in trust.”(不要把你的信任放在钱上,而要你的钱放在信任上)。这里存在着对比的允诺但没有外现出来。第二句取消了这一对比。顺便说一说,这是使用该诙谐技巧无法转换的一个好例子。

主义者我是非常清楚的,你的反犹太主义对我却是新的。”(“Herr Hofrat”, he said, “your antesemitism was well-known to me; your antisemitism is new to me.”)

此处只是几个字母的改动,在随便说时,几乎觉察不到其之修改。这个例子使我们回想起 N 先生其他修改性的诙谐,^①但在这里的差异不是凝缩。所有要说的在诙谐本身中已说出来了。“我知道早些时候你就是你自己,一个犹太人,所以,我对你会讲犹太人的坏话感到吃惊。”

这种修改性诙谐的一个极好的案例是那句众所周知的感叹:“Traduttore – Traditore!”^②这两个词非常相似,几乎是同一个词。这两词代表着那种迫使翻译者走向背叛原文的犯罪道路的必然性——这种极为强烈的印象。^③

这里还有一个据说是产生于法学考试期间的诙谐。考生们必须翻译《法律大全》中的一段:“‘Labeo ait’...I fall, says he.”(Labeo 说我堕落了,他说)“You fail, say I.”(你不及格,我说)主考官回答道,考试结束了。^④谁将一位伟大的法学家错译为动词形式,并回忆错的考生,无疑不会取得更好成绩。但这一诙谐的技巧还在于这样的事实:证明考生无知的同一个字被主考官用来宣布

① 本页的引文出处,在除了初版以外的所有德文版本中,全是错误的。

② 翻译家——叛徒。

③ 1912 年增注了布里尔(1911)援引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修改性诙谐: Amantes amentes(情侣们是傻瓜)。

④ 这是在德文中比较简洁的表达,因为确实同一个词“fallen”是被用于“to fall”和“to fail in an examination”这两种意思。“Labeo”事实上是罗马著名法学家(公元前 50 至公元 18 年),此拉丁语应该被译成“Labeo says”。考生将 Labeo 译成 labor —— 一个拉丁词——意为“fall”。

对他的惩罚。另外,此诙谐是“敏捷的妙语回答”(ready repartee),此技巧和我们将要在(见本书第 70 页)看见的没有什么不同。

词语是可塑性很强的材料,我们可以用它塑造各种形式。有这样一些词,当用在一定的连结中,失去了其原初的全部意义,但在其他连结中,它又获得了这一意义。利希腾伯格(Lichtenberg's)的诙谐是,他精心挑选了语境,使得分节的单词重新又恢复了其全部意义。

“你现在怎样?”^①盲人问瘸子。“如你所见的一样。”瘸子回敬道。

德文中有许多词,根据不同的意思的要求,可根据词的“full”(全部、完全)含义,或“empty”(部分意义)来使用它,取其直接意义或间接指示意义。所以从这个词的词干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使其具有全面意义的单词,另一种是从词头字母分解到最后—个音节或词尾,形成另一个意义,而这两种使用法,其读音还确实相同。“全意词”和“分解词”在读音上的一致有时是偶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诙谐的技巧都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语言材料中成功地行进。

例如,这里有一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供的诙谐,此诙谐作为一个几乎纯粹的这种技巧方法的例子,^②对我们是很重要的:“Eifersucht(嫉妒) is a Leidenschaft(情感) which mit Eifersucht(伴随着急切寻找) what Leiden schafft(导致痛苦)。(嫉妒是一种伴随着急切寻找痛苦原因的情感)。”

① “Wie geht's?”字面意思:“你怎么行进着?”

② 这一类型的诙谐较通常不可翻译的诙谐更为重要。

不可否认这个例子的诙谐性,虽然它不是极具特殊效果的例子。在这里缺乏的一些因素,其会使我们分别审视这些因素时误导我们分析其他诙谐。在词的形成中表达的思想是无任何价值的;在其他例子中给出的嫉妒的定义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这里不存在“胡说的意义”(sense in nonsense),暗含的意义(hidden meaning)或困惑与启示(bewilderment and illumination)的任何痕迹。没有任何结果——在试图揭示“观念的对比”(contrast of ideas)——词语之间的对比且只有经过巨大的困难才能发现其意味什么。这里没有什么简写的标记,相反,构词却给人以冗长生厌的强烈印象。但它也是一个诙谐且甚至是一个完满的诙谐。同时,它们惟一明显的特征如果是缺此特征,这个诙谐就消失了。此处的事实是同一词被多种不同的运用了。那么,我们可选择是否把这个诙谐归入词语被第一次作为整体使用后分解成不同的音节的子类(sub-class)(例如,卢梭或安提戈涅的例子),或者是把它纳入那种由于词具有多种直接意义或由词语成分构成的分节意义(间接引申意义)的另一子类。除此以外,以诙谐技巧的观点来看只有另一个因素值得注意。我们发现这里有一种不平常的被建立的事物状态:发生了一种“统一化”(unification)因“嫉妒”(Eifersucht)被用它自己的名字的方法定义——亦即它自己的方法——如其原初那样,这就是我们将要在(见第 68 页以下)看到的,也是一个诙谐的技巧。因此,这两个因素必定在其自身里足以给予诙谐的特征一个表达。

如果我们现在还进一步深入研究同一个词的多种运用的形式变化,我们突然就会注意到我们面前有许多“双重意义”(double-meaning)或“词语游戏”的例子——早为人知并作为诙谐技巧的形

式。为什么我们还自找困难地去发现可能在关于诙谐极为浅显的文章中就能收集到的新鲜东西呢？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判断里开始辨别，而这个判断是我们拿来的语言表达这同一现象的另一方面。被权威们所假设显示作为游戏的诙谐的特征的东西，被我们归类在“多种运用”的标题下。

更多的多种运用的例子，也可放在一起放在“双重意义”这一标题下，作为一个新的组，第三组，其很容易分出一些子类，这些子类确实也不能根据本质的区分把其从其他子类区分开来，就如不能把第三组作为整体从第二组区分出来一样。我们发现：

(a)名字和物的双重意义的事例被它所指示。例如：“Discharge thyself of our company, Pistol!”(将你自己从我们营地放射出去, Pistol!)(莎士比亚)

“More Hof(求爱)than Freiong(marriage).”(求爱的多于结婚的。)一位机智的维也纳人谈到一些漂亮姑娘被许多人爱慕多年，却永不会找到一位满意的丈夫时这样说。“Hof”和“Freiong”是维也纳市中心两个相邻广场的名字。

“Vile Macbeth does not rule here in Hamburg: the ruler here is Banko(银行的钱)”(海涅)在汉堡的统治者不仅是恶棍麦克贝思，在这里的统治者还有 Banko(既指人又指银行的钱)。

在一个名字未经改变就无法使用的地方[我们或许该说是误用(misused)]，从那，我们就能通过我们熟悉的微小变更找出双重意义：

在过去时常被问到，现在却不再提起的以下一句话：“Why”, “have the French rejected Lohengrin?”“On Elsa’s[Elsass(Alsace)] account.(为什么法国会拒绝了‘Lohengrin’?”“为了 Elsa(Elsass)

的缘故。)”

(b)双重意义是从词的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产生出来。这是诙谐技巧最丰富的资源之一。我将只援引一个例子：

戏剧作家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①的一位以其诙谐著称的医学朋友一次对他说：“我不惊奇于你已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毕竟你父亲用一面镜子照亮了那个时代的人(held a mirror up to his contemporaries)。”剧作家的父亲、著名的施尼茨勒大夫使用的是——面喉镜。^②《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一段著名的台词告诉我们戏剧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也是剧作家创造它的目的，戏剧的目的是：“如其本来那样抓紧它，使其反映自然的本性，显示美德自己本来的性质，轻视她的外在形象和时代及压力在其年龄和身体留下的痕迹。”(“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to show virtue her own feature, scorn her own image, and 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

(c)“专有双重意义的词”或“词语游戏”，这种情况可以描述为“多种运用”的理想例子。这里词不会被牵强地使用，不会将词分解成分离的音节，也不需要服从任何修改，也不是必须从其所属的领域(例如：专有名词领域)被转换到另一领域，如其原初所是的那样存在于句子里。能这样运用，应归因于一定的有利情景来表达这两种不同的意思。

像这类例子，我们还能随手拿来很多：

拿破仑三世取得政权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攫取奥林

① 阿瑟·施尼茨勒本人也是医学博士。

② 施尼茨勒大夫是喉镜的发明者，德文词是：Kehlkopfspiegel，字面意思是：喉镜

斯家族的财产。当时针对此事流行着一个极好的文字游戏：“‘C’ 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 (这是雄鹰的第一 vol。)”其中，“vol”意味着“飞翔”，但也有“盗取”之意(费希尔, 1889)。

路易十五想验证他的一位大臣是否像其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位天才。当第一次机会来临时，国王就命令这位大臣制作一个以他国家为 sujet(主题)的诙谐。这位大臣立刻做了一个机敏的回答：“Le roi n’est pas - sujet. [国王不是一个 subject(“主题”或“臣民”)]”(费希尔)

当一位医生离开一位夫人的病床时，他摇着头对女上的丈夫说：“我不喜欢她的脸色。”(I don’t like her looks.)“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她的容貌。”(I’ve not liked her looks for a long time.)丈夫连忙附和说。

医生谈到的自然是女士的病情。然而医生用来表达对病人关切的话语，却被丈夫解释为他的令人厌倦的婚姻的一种证实。

海涅在谈到一部讽刺性的喜剧时说：“如果此喜剧的作者有更多的东西去(bite)讽刺，那么这部讽刺作品就不会如此尖刻了。”(This satire would not have been so biting if its author had had more to bite.)这一诙谐与其说是一个关于专有名词的文字游戏，不如说是一个隐喻的和文字双关意义的例子。但此处做出的这一明确的区分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专家们(海曼斯和李普斯)使用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讲述了另一个很好的文字游戏的例子。^①

① 在原文中，弗洛伊德插入了该轶事的这令人不满的形式作为此处的一个脚注。我们认为，如果该脚注换成弗洛伊德所述的该故事的正确版本的“目的”，对英语读者来说，将会更多理解些。

不久前,我在一部诙谐选集里偶然发现了该轶事的正确版本和背景材料。除此一点外,这部集子还没证明有更多的用处。^①

“一天,萨菲亚(Saphir)和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彼此相见了。他们闲聊一会后,萨菲亚说,‘喂,罗思柴尔德,我的钱快用完了,你或许能借给我一百杜卡特!’‘噢,可以。’罗思柴尔德说,‘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但条件是你得讲个笑话,’‘这对我来说,也不成问题,’萨菲亚回答道。‘好吧,那么你明天去我办公室吧。’第二天萨菲亚准时来到办公室。‘噢,’当罗思柴尔德看到他进来了,说道:‘你是为你的一百杜卡特而来的。’(Sie kommen um Ihre 100 Dukaten)‘不,’萨菲亚回答道,‘你将失去这 100 百杜卡特(Sie kommen um Ihre 100 Dukaten),因为,在世界末日审判之前我将想不到把钱还你’。”^②

① 海曼,1904。

② “Sie kommen um”的意思是可以是“你为……而来”或者是“你将失去”——海曼斯告诉我们说:“萨菲亚是被其拜访的富有的债主问道:‘Sie kommen wohl um die 300 Gulden?’(无疑,你是为那 300 弗洛林而来的了?)萨菲亚回答道:‘Nein, sie kommen um die 300 Gulden.’(不,你将会失去这 300 弗洛林。))在给出这样的回答时,他是以一种完全正确而又很平常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意思的。”事实的确如此,萨菲亚的回答,就其本义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回答。我们也知道,这正是他打算说的——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要还债的意思。但萨菲亚使用了其债主在前面已使用过的词语。因此,我们也不可避免从这层意义上理解这些被后者已使用过的词语。在那个事例中,萨菲亚的回答不再有其他意义了。债主根本就不会来要,他不会为这 300 弗洛林而来——即,他不可能来取这 300 弗洛林。而且,作为债主,他的职责不是给钱,而是要钱。因为萨菲亚的话就是在这种被认为是既有意义又无意义的方式下说出的,所以喜剧产生了。(李普斯,1898)

我所在上面完全地给出这个版本的文本,目的就是说明,诙谐的技巧要比李普斯所假定的要简单的多。萨菲亚并不是来借这 300 弗洛林而是来从这富人那里攫取它。同样,这个关于诙谐中“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议论变成了不相关的了。

“这些雕像(vorstellen)(代表或表现)是什么?”一位初到柏林的陌生人在公共广场看到一排纪念碑时问一位当地人。“噢,”回答道,“要么是其右腿,要么是其左腿。”^①

“现在,我不能回忆起所有学生的名字(names),以及那些直到现在还根本没名望(name)的教授”。(海涅,《哈尔茨山游记》)

如果在分辨差异这一方面,我们把另一个有关教授的著名的诙谐加进来,会给我们在分辨差异方面提供一个实践的机会。“普通的(ordentlich)教授和杰出的(ausserordentlich)^② 教授之间的区别是普通的教授没有做出什么杰出的事,而杰出的教授又做不来普通的事(ordentlich)。这,自然是在“ordentlich”(普通的)和“ausserordentlich”(杰出的)两个词的含义上玩文字游戏;即是说,一方面是 ordo 的“之内”(inside)和“之外”(outside),另一方面是“效率”(efficient)和“杰出的”(outstanding)。但,在此诙谐和其他的我们所提的诙谐之间的雷同使我们回想起在这里“多种运用”(multiple use)比“双重含义”更为引人注目,虽然我们没听到除不断出现的“ordentlich”之外的任何东西,有时是在其原有形式上,有时是在其否定意义的修改形式上(见第 28 页)。通过词语构成方法给概念下定义再一次获得诙谐的技巧(见第 30 页)。或者是更精确地说,是通过两个相互关联概念的巧妙的相互交织来定义,(即使是否定性)此相互关联的概念的方法而获得诙谐的技巧。最后,“统一性”(unification)的方面在这里也得强调——使在陈述的

① 这个文字游戏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没有进一步的讨论的迹象,似乎这脚注应该附加在前一段的末尾,因为萨菲亚——罗思柴尔德这个诙谐事实上又在下文再一次进行了讨论)。

② 例如:正教授和副教授。

各个成分之间显露亲密的联系要比那些一个人有权从其本性预期的更多。

教区助理员^① 谢弗(Schäfer)问候我时就如我的同事一样,因其也是个作家,他经常在每部完成的著作中提起我。除去那些 cited 引用我的话。“如果他在我家找不到我,他总是很友好地把溢美之词(citation)(褒扬;引用)用粉笔写在我的书房门上。”(海涅,《哈尔茨山游记》)

丹尼尔·斯皮策,在他的《漫步者维也纳》(*Wiener Spaziergänge*)一书中制作了一个一定也是好的诙谐的,一个简洁传记体的描述。这个描述是关于普法战争后(Following the Franco-Prussian War)突然发生的投机买卖这一种颇为盛行的社会势态:“Iron front^② —iron cash-box — Iron Crown”(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最后一个词是一个带有贵族职衔的阶层)。该诙谐是“统一性”(unification)明显的例子——每样东西,如其所是的那样,都由钢铁制成!这种描述形容词“iron”意义的变化——但不是很明显的对比,使这个“多种运用”成为可能。

另一文字游戏的事例,使转变到一种新的双重意义的技巧的子类(sub-species)变得更容易些。在上面已提到过的那位幽默的医生同事有责任来解释“德赖弗斯”(Dreyfus)诉讼案时的这个诙谐:“This girl reminds me of Dreyfus. The army doesn't believe in her innocence.”(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赖弗斯。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无辜。)

① 一位在大学里(哥廷根)负责大学本科生纪律的官员。

② 例如:属于一个铁面无情的商人的。

这个诙谐是建立在“innocence”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的。这个词在一定的语境一般的意义是作为“过失”和“犯罪”的反义词使用的；但在另一语境中，在“性”的意思上，其反义词则是“性经历”（sexual experience）这种双重含义的例子是有很多的，在上面的例子中，诙谐的效果的产生特别依赖于“性意义上”。所以这组我们也可保留“双关语”（Zweideutigkeit）的名字。

这种“双关语”的极好的例子便是在第28页中已提到过的斯皮策（Spitzer）的那个诙谐：“一些人认为丈夫赚了许多钱，所以他能存一点（sich etwas zurückgelegt）；其他人又认为妻子有靠山（sich etwas zurückgelegt），所以他能赚很多钱。”

如果把这种带有“双关语”的“双重意义”（double meaning accompanied by double entendre）的例子与其他的例子做一番比较，差别就变得明显了（并不是没有从技巧的观点来看）。在“innocence”诙谐中，词语的一个意义和另一个意义一样明显。它的确是很难决定是在其“性”的意义上或更普通、更熟悉的非性（non-sexual）的意义使用。但是在这种意义上，斯皮策的例子则完全不同。在此例中，词语“sich etwas zurückgelegt”在一般的情况，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而它的性方面的含义却是被掩盖和被隐藏着，甚至可以逃脱无猜忌之人的注意。让我们通过深刻的对比的方法看看其他的双重意义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没有做任何企图去隐藏性意思。例如，海涅对一位殷勤的夫人的描写：“She could abschlagen^① nothing except her own water.”（除了她自己的水以外，她再也尿不出任何东西。）这句听起来像一段淫秽的话，几乎不能

① 排出污秽（忌），“撒尿”

产生诙谐的印象。^① 然而,这种特殊性,在那种双重意义的例子——两种意义都不同样明显的例子中,也能在没有性指向的诙谐中出现,——或者因为一个意义比另一个意义更常用,或者因为通过句子与句子的其他部分的关联而被放在前面。(例如:‘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第一次“vol”的例子。’)我想将这些例子都描述为“带有隐喻的双重意义的例子”。

(四)

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诙谐的技巧了,我担心有丢失已经掌握的技巧的危险。所以让我试图概括一下它们。

I. 凝缩

(a)带有合词形成的凝缩

(b)带有修改性的凝缩

II. 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

(c)作为整体的运用和作为部分的运用

(d)以不同顺序的运用

(e)带有微小修改的运用

(f)同一词的“全部直接意义”和“空泛意义”

III. 双重意义

(g)作为名字和作为物的意义

(h)隐喻的和字面的意义

^① 参见费希尔(1889)关于这点的论述。他把那种具有双重意义,即两种含义并不同样显著,但一种含义却优于另一种含义的诙谐称之为双关语(Zweideutigkeit),我已在不同的地方用了此名字。这种术语是习俗问题。语言的使用方法至今还没有确定的方式。

(i)双重意义的专有词语(文字游戏)

(j)双关语

(k)带有隐喻的双重意义

技巧上的多变性和多样性会产生混乱的效果。它会使我们感到恼怒,因我们已专心致志地对诙谐的技巧方法进行考虑,它会使我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作为发现诙谐本质特征的方法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但这种便利的猜测遇到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当我们一清除在表达时的对这些技巧的运用,那么诙谐就恒久的消失了!所以,不管其他的事情,我首先要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找一致性。将所有这些技巧归结到一个单一标题下应该是可能的。就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把第二组和第三组统一起来并不困难,双重意义(文字游戏)的确是惟一的同一材料多重运用的理想事例。在所有的双重意义的概念中,文字游戏明显是更多广泛的概念,分成独立音节、对同一材料的重新组合和带有微小修改的多种运用的例子(c、d、e)——尽管有一些困难——都可以归纳到双重意义这一概念下。但,在第一组的技巧(带有替代形成的凝缩)和其他两组的技巧(多种运用这同一材料)之间,一般来说存在什么关系呢?

是的,我原以为其中的一些事情是简单的和明显的。毕竟,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只是凝缩的一个特例。文字游戏只不过是没有什么替代形成的凝缩而已。凝缩占有更为宽泛的范畴。所有这些技巧都被一种抑制倾向或经济原则所支配。所有这些好像都是一个经济性问题。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节俭,节俭,Horatio(霍雷肖)!”

让我们来检验一下在不同的例子中的经济性原则。“‘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是的,这的确是鹰

的第一次飞翔,但这是一个窃取的飞翔。对于这个诙谐存在有利的是,“vol”不仅是有“飞翔”(flight)之意,且还有“窃取”(theft)之意。那么,是否这里就没有凝缩和经济性原则的使用?答案是确定的。这里第二个思想的整体被保留了,并被没有留下任何替代物地放弃了。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vol”没有必要需要这样一个替代物。或者,以下这种说法也同样正确,单词“vol”包含着替代没有任何附加或必须被改变来适合第一个意思的被抑制的思想。这便是双重意义的优势所在。

另一个例子:“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此例子与那些表达同一思想却没有发挥作用的位置的结构相比,其巨大的经济性效果便产生了:“借助于必要的胆识和良心的缺乏,要聚敛大量的财富并不困难,而对于这种行为,一个头衔将是必要的合适回报。”

显然,凝缩和经济性原则的确毫无错误地出现在这些例子中。但其应该在每个例子中都如此。在像“卢梭——红头发傻小子”或“安提戈涅——古代风韵?”或“噢,没有”的诙谐中,经济性原则隐藏到哪里呢?而在这些例子中,我们首次注意到凝缩作用的缺失。而哪一个是我们提出同一材料重复运用的技巧的首要动机呢?的确,在这里,我们未发现凝缩出现在这些事例中。但,假如我们代替它以经济性原则这一更为广泛的概念,我们就能没有困难地进行操作了。指出在卢梭和安提戈涅事例中,什么是被我们所保留了是很容易的。我们省去了不得不做出的批评或给出判断的雏形这一工作,此二者都已包含在其名字本身之中了。在“Leidenschaft—Eifersucht”(情感——嫉妒)这一例子中,我们省去了建构定义之麻烦:“Eifersucht”(嫉妒)、“Leidenschaft”(情感)——“Eifer

sucht”(急切寻找),“Leiden schafft”(导致痛苦)。我只要加上连接词,我们就得到了定义。这一情况,在其他我们分析过的例子中是极其相似的。在像萨菲尔的文字游戏“Sie kommen um Ihre 100 Dukaten”(你是为你的一百杜卡特而来的)的例子中,进行最少的节省,不同程度的节省使形成一个新的词来回答成为必要:问题的构词方式足以作为回答。虽保留的不多,但诙谐在其中。对问题和回答多种运用同一词肯定是“经济性原则”。就像哈姆雷特看待他父亲的死所产生的迅速效果和其母亲的再婚的观点一样:

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

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

但在我们接受“经济性原则的趋向”作为诙谐技巧的最一般的特征之前,我们问一些问题:像其从何而来,意义何在以及诙谐怎样会从其中产生出诙谐的乐趣?我们必须为有权被听到的怀疑留有空间余地。或许是每一诙谐技巧显示了在表达中保留了什么的倾向。但这种关系是不可逆转的。并不是表述中的每一个诙谐的经济性原则和缩写都是一种诙谐。当我们在过去仍然希望从每一个诙谐中寻找凝缩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对此表示过正确的异议,认为精炼的话语并不足以构成诙谐。因此,诙谐的特征所依赖的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缩写和经济性原则。而且只有当我们发现这种特殊性——诙谐技巧中的普通因素后,我们才能接近于问题的解答。此外,让我们有勇气接受被诙谐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并没有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或许这种经济性原则使我们想起,许多家庭主妇因某个较远的市场的蔬菜相对便宜一些,而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而远道求购的情况。诙谐通过其技巧节省了什么?把几个新字母放在一起这并不困难。而偏要历尽困难寻找一

个能概括两种思想的词。的确,常常需要首先把一种思想转换为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则为它与第二种思想的合并提供了基础。当这两种思想碰巧出现,即使并不含有共同的表达方式时,要想表达此两种思想难道不更简单、更容易,事实上更经济吗?用词语经济性的表达不是比为此需要平衡的智力支出有更多的经济效果吗?通过它谁被节省了?谁有所收获?

如果我们把对它们的疑惑转移到另一个位置上去,我们就会暂时避开这些疑惑。我真的发现所有种类的诙谐技巧吗?在搜集新例子并把它作为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时,还是应该更慎重些。

(五)

事实上,我们至今尚未涉及到许多——或许最大数目的诙谐。这或许是受低估了这类诙谐的观点的影响所造成的。这类诙谐是那种一般地被认作是“Kalauer”(双关语),^①且是作为言语诙谐的最低等级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可能因其是“最廉价”的——编创起来只需克服最少的困难。事实上,它们在表达技巧上要求也最低,正如文字游戏本身对表达技巧要求高一样,而在后者,两种意思总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因此之故,此相同的词只说一次,这足以构成一个双关语——如果这两个词表达的两种意思使其通过两者之间模糊的相似性回忆起两者,是否它们有普遍相似的结构或同韵谐音、或者是否它们共有相同的头几个字母等等。像这样为数众多的并适合于被描述为“Klangwitze”(语音诙谐)的例子,在《华伦

① 德文词“kalauer”在此一直被译为“双关语”(pun)。正如我们所见,弗洛伊德是在比英文所具的意义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斯坦的营地》^① 有许多：

Kümmert sich mehr um den *Krug* als den *Krieg*,
Wetzt lieber den *Schnabel* als den *Sabel*

.

Frisst den *Ochsen* lieber als den *Oxenstirn*,
.

Der *Rheinstrom* ist worden zu einem *Peinstrom*,
Die *Klöster* sind ausgenommene *Nester*,
Die *Bistümer* sind verwandelt in *Wüsttümer*.
.

Und alle die gesegneten deutschen *Länder*
Sind verkehrt worden in *Elender*.^②

诙谐特别易于改变一个词里的元音。因此赫维希 (Hevesi, 1888) 记录了一位反帝国主义的意大利诗人, 这位诗人后来被迫颂扬一位德国皇帝, 在其诗行中写道: “Since he could not exterminate the Cäsaren (Caesars), he at least eliminated the Cäsuren (caesuras).” [因为他不能消灭 Cäsaren (凯撒); 他至少清除了 Cäsuren (停顿)。]

① 本书第 24 页已引过这样的例子。

② 根据字面意思译为：

他关心更多的是酒瓶而不是战争，
所磨砺的是鼻子而不是刀剑。
他不去吞奥克森施弟思 (敌将名)，
而宁愿去吃掉公牛。
莱茵河变成痛苦之河，
修道院变成了被掠夺的鸟巢，
主教辖区变成了一片荒漠。
所有被上帝祝福的德意志土地，
变成了悲惨的地方。

在供我们大量使用的例子中,拿出一个真正拙劣的例子或许会特别有趣,而这些拙劣的例子,海涅恐怕要承担一部罪责。^①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自己的情人面前冒充“印度王子”,当他扔掉面具并忏悔道:“Madame, I have deceived you... I have no more ever been in Kalkutta (Calcutta) than the Kalkuttenbraten (roast Calcutta fowl) that I ate for luncheon yesterday.”(夫人,我欺骗了你。我和昨天午餐吃的加尔各答烤鸡一样并未曾住在加尔各答。)这个诙谐中的差错明显地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其中的两个相似的单词不仅相似且确实相同。被吃掉的烤鸡被如此称呼,因为它来自,或者是假定来自相同的地点——加尔各答。

费希尔(1889)曾致力于这种形式的诙谐,并尝试着把它们从“文字游戏”中明显地区别出来。“双关语是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因为其未把词作为词来使用,而是作为语音来使用。”然而文字游戏却“把自己从词语的语音中传递到词本身”。另一方面他把像“famillionär”, “Antigone (antik? oh nee)”等等这样的诙谐归类到“语音诙谐”中。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追随他。据我们的看法,在一个文字游戏中,词语也只是“语音形象”(sound-image),对于它有一个或两个意义附属着。但在这里,语言的用法也没有明显的区分。如果以一种轻视的观点来对待“双关语”(Puns)而用尊敬的态度来对待“文字游戏”(play upon words),那么恐怕判断的价值标准是由考虑其他因素而不是技巧来决定的了。被说成是“双关语”(Puns)的那一类诙谐很值得我们注意。当有些人在精神高度兴奋时,他们能在很长时间里能用双关语回答他们所听到的

① 《赖泽比尔德》第二部分,第五章“思想”。

每一个谈话或评论。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位谨慎的人,他在科学上的重要成就与此点有关,所以他易于吹嘘这种能力。当他以其谨慎而使公司的人屏息静气时,对其忍耐力表示了尊敬。他回答说:“是的,我在这里注视着。”(I am lying here auf der Ka-lauer.)^①当人们最后恳求他停下来时,他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封他为“Poeta Ka-laureatus”(桂冠诗人)。然而,这两句话都是极好带有合成词形成的疑缩作用的诙谐[I am lying here auf der Lauer(on the look-out)for making Kalauer(puns).(我是躺在这里专注地制作双关语)]。

无论如何,总之我们已经能从界说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的争论中得出结论,那就是,前者不能帮助我们去发现一个完全的新诙谐技巧。在双关语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放弃在多种意义上使用同一材料的要求,那么重点就会落在重新发现在组成双关语的两个词之间的一致性的意义上,什么是熟悉的。所以双关语仅是这一组中的一个子类,而这一组就严格按文字游戏而言已达到了顶点。

(六)

确实还存在着一些诙谐,就其技巧而言,我们无法将它们归入迄今为止研究过的任何一组中去。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海涅在一天晚上,在巴黎的沙龙中与剧作家苏利埃^②正在交谈中,这时,巴黎的一个巨富走了进来,人们把

① “Kalauer”=“pun”(双关语)。“Auf der Lauer”=“on the look-out”。

② 弗雷德里克·苏利埃(Frédéric Soulié, (1800-1847), 法国戏剧作家和小说家。

他与迈达斯^① 相比——不仅因其财富。他立即被那些认为他最值得尊重的人围起来。苏利埃对海涅说：“看那里！看看 19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崇拜金牛犊的！”海涅瞥了一下那个被如此崇拜的对象，好像是以纠正的语气讲道：“噢，就现在来说，他必定比金牛犊老一点。”（费希尔，1889）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极好的诙谐的技巧呢？费希尔认为：在文字游戏里，例如，“金牛犊”这个词既指财富又指崇拜物，在一种情况下，黄金是主要所指的意思，在另一种情况下，指的是动物。用一种不十分精确的术语来说，它可以意味着这样的特征：一些人很有钱，但缺乏头脑。如果我们做个试验，把“金牛犊”在这个表达中去掉，同时我们肯定就取消了这一诙谐。如我们让苏利埃如此说：“看！看那些人围着那个仅仅因其有钱的傻瓜的态度。”这样就不再是诙谐了，而海涅就无话可说了。

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我们关心的不是苏利埃的微笑——它可能是个诙谐——而是海涅的回答——此回答肯定是一更好的诙谐。既然如此，我们无权去触动关于“金牛犊”的这个词组，它作为海涅回答的前提而保留，我们的还原必须只指向后者。如果我们扩展一下这些词：“噢，就现在来说，他一定比金牛犊老一点！”我们可以像以下这样替换它们：“噢，他不再是个小牛犊了，他变成一头完全长成的公牛了。”^② 对海涅的诙谐必需的是他不是在使用“金牛犊”的隐喻而是在人的意义上并应把其指向那个富人本身。这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费利治亚国王贪恋财富，曾求神赐给点物成金之术。

② 见第 21 页注①。

个双重意义甚至已经在苏利埃的评论中出现。

然而,还需稍等片刻!现在看来,好像这个还原还未完全地触动海涅的诙谐,相反却留下了本质的东西未动,现在的情况是:苏利埃说:“看!19世纪的人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崇拜金牛犊!”海涅回答道:“噢,他不再是小牛犊了,他已经是头公牛了!”在这种方式的还原中,回答依然还是诙谐。但再也不可能对海涅的诙谐给予还原了。

很遗憾这个好例子包含着如此复杂的技术条件。因我们不能使其清晰些,所以,我们只放弃它而寻找其他例子。或许在其中能使我们发现与前者的内在家族相似性。

这是一个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Galician Jews)厌恶洗澡的“洗澡诙谐”(bath jokes)。因为我们并不坚持一定要举什么高贵的文雅的例子,也不去探寻其来源,只关心其效率如何——是否能使我们发笑,是否值得我们理论兴趣的关注。而这两点要求都会被犹太人的诙谐所精确地满足。

两个犹太人在澡堂附近相遇了。其中一个人问道:“Have you taken a bath?”(你已洗过澡了?)“What?”(什么?),另一个反问道,“Is there one missing?”(难道那里少了一个澡盆吗?)

当一个人因听到诙谐而开心地大笑时,他并没有在探究诙谐技巧的最佳情绪状态中。因此在我们对其进行考察时,便会遇到些困难。我们倾向于说:“这是个喜剧性的错误理解”。是的,但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take”的缘故。对于一说话者来说,“take”只是毫无色彩的辅助动词,而对于另一个来说,“take”是具有“倒掉水”意义上的动词。因此,这是同一个词被用为“全意”和“空泛”的例子(见第39页二组f),如果我们用

更简单的同义词“bathed”来取代“taken a bath”,诙谐就消失了,回答也就文不对题了。因此,这一诙谐再一次属于“taken a bath”这个词的表达形式。

事实确实如此,但在这例子中似乎过度的还原用在错误的地方。此诙谐不在于问话句而在答句——第二个问题:“What? Is there one missing?”此回答不能被剥夺其作为诙谐,不管是通过扩展还是修改,只要其意义未被干扰。我还有个印象,即在第二句中,犹太人的回答中,对“洗澡”的忽视比对词“take”的误解更为重要。但在这里,我们再次不能清楚的看见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将寻找第三个例子。

这也是个犹太人的诙谐。但这一次的诙谐,其背景是犹太人,但其核心的东西却属于所有的人类。毫无疑问,这个例子也具有其不被人所需的复杂性。但幸运的是,它们不是那种以至于阻止我们看清的例子

一个穷人向一个富有的熟人借了 25 弗洛林,同时并提出了声明,说其是生活所必需。就在同一天,富人便在餐馆中遇到他,穷人面前放着一盘蛋黄酱鲑鱼。富人责备说:“什么?你向我借钱,而你又自己来点蛋黄酱鲑鱼吃?这就是你用我钱的目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穷人回答道:“如果我没钱,我就不能(can't)吃蛋黄酱鲑鱼,而如果我有钱,我又不该(mustn't)吃蛋黄酱鲑鱼。好了,那么,我什么时候吃蛋黄酱鲑鱼?”

在此,至少没有更多的双重意义的痕迹被找到。甚至“蛋黄酱鲑鱼”的反复使用也不包含着诙谐的技巧,因其不是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而是依据轶事的主题要求所做的真实的同一材料重复。我们有时会被此分析所难住,我们甚至会想以逃避来拒绝这个轶

事——虽然它使我们发笑——拥有诙谐的特征。

在这个穷人的回答中,还有什么更多的值得评论的东西吗?它被很明显地给出了逻辑证明形式。但是很不公平的是,此回答事实上是不合逻辑的。借钱人为其把借来的钱花在美味上而为自己辩护,带着蛮有理由的样子问道,什么时候他将能吃蛋黄酱鲑鱼。但这不是一个切题的回答。富人并不是因其是正在借钱的那一天,用其钱来吃鲑鱼而责备他,而是提醒他在其当时窘迫的状况下,他根本没有权利去享受这种美味奢侈品。这位俏皮的穷美食家无视责备中的惟一可能的意思,而是回答了另一问题,好像他误解了这个责备似的。

此诙谐的技巧是否正在于回答从其被责备的原意的偏离呢?如果如此,一个相似的基点的转变,一个相似的心理强调点的转化,也许可追溯到前两个例子,其使我们感到如此例子是相同性质的。

注意,这一建议很易于获得,事实上揭示了这些例子的技巧。苏利埃向海涅指出,19世纪的社会崇拜金牛犊,如同旷野中的犹太人一样。海涅所应当做的合适的回答应当是:“是的,这是人之本性;几千年来在这方面毫无改变。”或者诸如此类的表示赞同的话。但海涅的回答偏离了假设给他的思想,根本没有回答假设给他的回答。他利用了“金牛犊”的双重意义,沿着边缘来发挥这一词组,他抓住这一词组中的“Calf”(牛犊),回答道:就如苏利埃的话所强调的那样,“噢,他不再是只小牛犊了”……等等。^①

① 海涅的回答兼有两个诙谐的技巧:转移和引喻,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他是头公牛。”

洗澡诙谐中的转变更为平缓,这个例子需要一番像描述地理状况一样呈现出现。

第一个犹太人问:“Have you taken a *bath*?”(你洗过澡了吗?)强调是在“bath”这个成分上。

第二个犹太人回答的好像是“Have you *taken* a bath?”(你拿了一个澡盆吗?)其重点强调的是“taken”。

这个重点转移的例子只有通过“taken a bath”的构词才成为可能。假如是“have you bathed?”(你洗澡了吗?)转移作用就成为不可能了,那么这个不再诙谐的回答就会是:“Bathed? What d’you mean?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洗澡?你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重音转换从“bath”到“taken”。^①

让我们再转到“蛋黄酱鲑鱼”的例子上来。因为它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在其中的新东西值得我们不同的角度予以注意。首先,我们必须给在其中起作用的技巧一个名字。我乐意将其称为“移置”(displacement),因其本质在于思想序列的转移,在于心理强调重点转移到另一个与撇开主题不同的其他主题上去。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将是探究移置技巧与诙谐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们

① “take(nehmen)”一词非常适合构建文字游戏的基础,这应归因于其能被用不同的方法来使用。我将给出个平常的例子,作为上面记述的移置式诙谐的对比:一个著名的证券交易投机商和银行董事与一位朋友在维也纳环城路上散步,当他们经过一个咖啡室时,他说:“Let’s go inside and take something!”(让我们进去,喝点什么吧!)他的朋友拽回了他:“不要,赫夫拉特先生,这地方尽是人!”[可以指出的是这个诙谐和上个洗澡的诙谐,两个都在翻译中失去了它们的效果,因为在这两个情况下,那自然是“无意义”的词将不是英语中的“take”而是“have”:“Have you had a bath?”(你洗澡了吗?)and “Let’s have something.”(让我们喝点什么吧!)]

的例子(蛋黄酱鲑鱼)显示了移置式诙谐(displacement joke)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话语表达。它不依赖于词语,而是依赖于思想序列。只要回答的意义被保留,那么不进行词语置换将能使我们清除它。如果当我们改变了思想序列,并且让那位穷美食家直接回答他的诙谐中一直逃避不答的责备,那么,还原才有可能。还原后的文本可能如此:“我不能拒绝美味的诱惑,不管从哪里搞到钱来付账,对我都没什么不同,现在你该得到个解释了吧?为什么我在借你钱的当天就来此吃蛋黄酱鲑鱼了吧。”但这将不成其为诙谐了,只能算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了。

将这个诙谐与另一个在意思上和此诙谐相近的例子相比较,会是很有建设性的。

在一个小镇上,一个靠当私人教师来支撑其喝酒费用的男人,他的恶习渐为众人所知,结果他失去了许多学生。一个朋友肩负起劝其改过自新的使命,“你瞧你,如果你戒了酒的话,你将是本镇上的最好老师。所以按我说的做,戒掉酒吧!”酒鬼轻蔑地回答:“你以为你是谁?”“我干私人教师之职是为能喝酒,我能戒酒以换得私人教师的职位吗?”

此诙谐给我们以符合逻辑的外表,如同我们在诙谐“蛋黄酱鲑鱼”中所见一样。但它不是一个移置诙谐。这个回答是直接的回答。愤世嫉俗在前一个诙谐中是被隐藏着,而在此诙谐中被公开的承认:“对我来说,喝酒是最重要的事。”这个诙谐的技巧确实少到极点,并且,不能解释其所产生的深刻印象。它仅仅在于重新组织安排这同一材料,更精确地说,是在于颠倒了喝酒和教书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一旦我的还原停止强调在其表达方式中的这一因素,诙谐就隐退了。例如:“多么毫无意义的建议!对我最重要

的是喝酒,而不是当教师。毕竟,教师只是一个使我能继续喝酒的手段。”因而,此诙谐事实上依赖于其表达形式。

在洗澡诙谐中,诙谐对其构词的依赖不是错误的。Have you taken a bath? 若有点改变就会使诙谐消失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技巧是更复杂的东西——双重意义(子类 f)^① 和移置的联合体。问题的措词接受这个双重意义,且诙谐是被忽略了提问者想要的回答的意义和抓住次要的意义这种回答所产生的。我们能同样地在某个位置,发现某个还原,此还原允许因构词的双重意义存在并破坏了此诙谐。我们能如此做仅仅是通过不进行移置才能做到。

“Have you taken a bath?”——“What do you think I’ve taken? A bath? What’s that?”(“你洗澡了吗?”“你认为我拿什么了? 一个澡盆? 那么什么意思?”)但这不再是诙谐,而是一个存心不良的或挖苦的夸张。

在海涅关于“金牛犊”的诙谐中,双重含义起到了精确的相似作用,它使回答能够从假设的思想序列转移开(这种转移在“蛋黄酱鲑鱼”诙谐中未得到任何构词的帮助而发挥作用)。在还原中,苏利埃的评论和海涅的回答可能会是这样:“这里的人们仅因为其有钱而围到他身边的样子,使人们想起对‘金牛犊’的生动崇拜。”海涅的回答会是:“由于他有钱,他应该被人们尊敬,这倒不让我感到震惊。在你的评论中倒是不够强调这样的事实,即因为他的富有,人们原谅了他的愚蠢。”在这种方式下,双重意义将会被保留,

^① 例如:使用同一词的“全部意义”和“空泛”(第 39 页),子类 f 被包括在第二组(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不是在第三组(双重意义),但就如第 32 页所指出的那样,第二组和第三组相互融合在一起。

但移置作用的诙谐将被破坏。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准备处理一个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会认为这个很好的区分是想把属于整体的东西割裂开来。难道不是每一个双重含义都会为移置——为思想序列的一个意思转移的另一个意思提供机会吗?难道我们准备允许“双重意义”和“移置作用”被两种作用截然不同的诙谐技巧的代表使用吗?好吧!的确,双重意义和移置作用之间的关系的存在是真实的,但这与我们区分不同的诙谐技巧毫不相干。在双重含义的情况下,诙谐除包含一个能作多种解释的词以外,并不包含任何其他东西。它允许听者去发现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转变——一种扩展观点的转变,就可以等同于移置作用。然而在移置式诙谐中,诙谐本身包含着一个思想序列,在其中这种移置作用被完成。在这里,移置作用已成为促使诙谐产生的一部分,并不是理解这一诙谐是必要的一部分。如果这一区分尚对我们不够清晰,我们尚可以使用还原这一确证我们观点的方法。但这有一点,即在我们将拒绝的反对意见中,有一个可取之处,它使我们注意不能把构成诙谐(诙谐工作)^①的心理过程与包含在接受(理解工作)诙谐中的心理过程混为一谈。我们现在的研究只能是关于前者而进行。^②

① 这里所用的术语是用来强调产生诙谐的过程与上文中已暗示过的梦之间的类似性。整个问题将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进行全面讨论。

② 至于后者,可见此书后面的章节——在以一些解释的话多讲几句并非毫无必要。移置经常发生在评论与遵循思想线索进行的回答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原初评论开始之处,用来区分移置作用与双重含义的理由可通过实例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在这些实例中,移置作用和双重含义结合在一起,即评论的措辞给双重含义提供了机会。这个双重含义不是说话人的原意,但它为回答指明了进行移置的途径。

还有别的移置技巧吗？它们是不易被找到的。下面的诙谐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例子，因其不具有我们在范例中所过分强调符合逻辑性的特征：

一个马商在向其顾客推荐他的一匹马时说：“如果你买下这匹马，在早晨4点钟骑上它出发，你将会在6点半到达匹兹堡。”“早上6点半我在匹兹堡干什么呢？”

在此例子中，移置一眼就可看见。马商说骑上此马能尽早到达省城，只为显示此马的能力。这位顾客对这匹马的实力不加怀疑，但他对马的实力置之不理，而偏要进入被选择的例子中来。此诙谐的还原是能相对容易地被给出的。

另一个例子的困难要大一些，因其技巧异常模糊晦涩，但可以用双重含义和移置作用的联合来处理。此诙谐描述了一个犹太人婚姻介绍人的含糊其辞，所以，其将成为我们经常注意的一组中的一个例子。

媒人(Schadchen)向那位求婚者保证说：“那位姑娘的父亲活不长了。”在订婚之后，真相大白，姑娘的父亲仍然在世——并正在监狱里服刑。求婚人向媒人质问为何如此。媒人回答道：“好吧！我告诉你什么了？你把那(坐牢)也叫生活吗？”(Well, what did I tell you? You surely don't call that living?)

此双重意义在于词“living”移置作用被媒人转移出其的一般意义——作为“死”的反义词，用在句子“that's not living”中。如此做，尽管这词多种使用在此并不合适，但他借此而将前面的说法解释成了双重含义。就此而言，这一技巧很像“金牛犊”诙谐和“洗澡诙谐”的技巧。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要被考虑的因素，由于它强烈干扰了我们理解此技巧。我们可将其描述为“特征化”诙谐：它

寻找到一个例子来显示这位介绍人既厚颜无耻又巧言善辩的混合性格。我们将会发现这只是外壳,只是此诙谐的假面具。它的意义——就是说,它的目的——是另外的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必须推衍还原它的企图。^①

在这个被如此困难分析的复杂例子之后,我们将带着满意的神情,再一次能转向被认为是直接明了和典型移置作用的例子。

一个犹太乞丐(Schnorrer)乞求一位男爵赞助他到奥斯坦德(Ostend)去旅行。他说:医生建议他去洗海水浴来恢复他的健康。“非常好,”富人说道,“我将给你一些资助,难道你必须去奥斯坦德吗?那里是所有海滨疗养地中最昂贵的地方。”乞丐用责备的口气回答道:“男爵先生,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我的健康更值得花钱的了。”此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观点,但对于请求人来说就不太适合了。这个回答应是一位富翁以其观点的回答。这个乞丐的行为好像那是他自己的钱,他愿意为其健康而花费,好像钱和健康是属于同一个人似的。^②

(七)

让我再次从那个富有建设性的“蛋黄酱鲑鱼”的例子开始。它也向我们显现的是一个假面具。在这个假面具里,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惊人的逻辑思想,通过分析它,我们知道这些逻辑被用来隐藏一些错误的推理——换句话说,是思想序列的移置。这或许可以提醒我们,如果只通过对比方式来连结其他诙谐——以其他方

① 参见第三章。

② 此诙谐在第120页再次出现

法,没有掩饰地展示一系列的胡说或愚蠢。我们非常想知道,此种诙谐的技巧是什么。

我将以这一组中最具说服力,同时又最简单易懂的一个例子开始,它还是一个犹太人的诙谐。

艾茨格(Itzig)被认为适合当炮兵。他明显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他很固执,且对当兵没有任何兴趣。他的一位上司把他拉到一边,很友好地劝他说:“艾茨格,你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我给你一条建议,你自己买一个大炮,自己独立干吧!”

这个令我们大笑的建议显然是无稽之谈。一个人既买不到大炮,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军事单位独立出去——就像在经商中那样,自己去干。但这个建议,不能怀疑其是胡说,这个建议不仅是胡说,而且是诙谐的胡说——一个极好的诙谐。那么,这个胡说怎样变成一个诙谐呢?

不需更多的反思,我们能从本书序言权威们的评论中推论出,像这样的胡说的诙谐所暗示的意义,并且正是这个意义使胡说变成了诙谐。这个意义在我们的例子中很容易找到。给艾茨格提那个胡说式的建议的军官是装傻,以便让艾茨格明白自己的举动是多么愚蠢。他是在模仿艾茨格的样子说:“我将给你提出一些像你一样愚蠢的建议。”他深知艾茨格的愚蠢所在,并通过作为其满足艾茨格建议基础的愚蠢来使他明白。如果艾茨格拥有自己的大炮并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执行军事任务,他的聪明和抱负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怎样能得心应手地照料他的大炮并熟悉大炮的机械装置,以便来和其他的炮手相竞争呢?

我将暂停分析这个例子,转而指出在一个更短、更简单的胡说式的诙谐中的同样的意义,显然它更少被人们注意到。

“永远不要降生人世是必定要死的人的最好的事情”，^①《飞叶》(*Fliegende Blätter*)^②杂志上的哲学评论还补充说：“可是，10万人中很难有一个人会是这样。”

对这一古代人的看法所加的现代诠释显然是胡说，通过其假装的审慎的(*scarcely*, 几乎不, 很少)使其更加愚蠢。但这个附加补充作为不可争议的正确限制附加在原句上, 因此, 能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 即这一被接受的神圣智慧的名言并不比胡说好到哪里去。一个人不生, 他根本就是不死的人, 对其来说无所谓好与坏。因此, 这个诙谐中的胡说是揭示和证明另一个胡说的, 就像“炮兵艾茨格诙谐”一样。

我在此能附加第三个例子, 从其内容上看, 几乎不需长篇大论来描述, 但其再次成为一个在诙谐中特别清晰使用胡说以显示另一个胡说的例子。

一个必须外出旅行的人, 将其女儿托付给他的一个朋友, 并要求其朋友照顾好他女儿, 在他远行期间保护其纯洁。几个月后, 他回来了, 并发现他女儿怀孕了。自然就会责备其朋友, 其朋友好像是无法逃脱罪责的了。最后, 女儿的父亲问道: “好吧! 她睡在哪里?”——“和我儿子睡在一间屋子里。”——“你怎么能在我请求你照管好她的情况下, 还让她和你儿子睡在一个屋子里呢?”——“毕竟在他们之间有个屏风, 你女儿的床在这边, 我儿子的床在那边, 而屏风放在他们中间。”——“假如他绕过屏风会是怎样呢?”——“是的, 那就是那样了。”那位朋友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可能就是那

① 《霍默与赫西奥德的竞争》第316节。

② 著名喜剧周刊, 1844—1928年出版的一种幽默杂志。

样发生的。”

暂且不提此诙谐的性质,我们能很容易地对此诙谐进行还原。它很明显应是这样:“你无权责备我,你怎么就如此愚蠢,以至于将女儿留在一个她肯定会与其朝夕相处的年轻男人家里?在这种环境中,如何能让一位局外人来对你女儿的纯洁负责呢?”那么,在这里,朋友的表面愚蠢只是父亲愚蠢的反映。通过还原,去掉了诙谐中的愚蠢,但也同时去掉了诙谐本身。“愚蠢”这一成分本身并没有被去掉:在句子被还原为其原初意义之后,愚蠢可以在句子的前后情景中的某一点处被找到。

我们现在能试图还原关于大炮的诙谐了。那位军官应该说:“艾茨格,我知道你是个有经商才能的人,但我向你说明一点,如果你看不到在军队中不能像在商业中那样行事这一点的话,那么你是很愚蠢的。在商业生活中,人人为自己且反对与他的竞争;在军队生活中,服从与合作就是规则和命令。”

我们如此深入研究的胡说诙谐的技巧,实际上,就是显示某些无意义和愚蠢的东西,其意义就在于揭示和证明那另外一些东西是愚蠢和无意义的。

诙谐技巧中荒诞的使用总是具有同样的意义吗?下面还有另外的例子来给予肯定的回答。

当有一次福西昂(Phocion)^①在做完演讲后,听众报予热烈的掌声,他转身问其朋友:“怎么,我所说的是那么愚蠢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唐突,但我们立即明白它的意思:“那么,我所说的话能使这些愚蠢的群众高兴得这样吗?我应该为获得这些

① 雅典政治家。

掌声而感到羞愧。如果我所说的使愚蠢的人感到高兴,那么话本身就不能是很有意义了。”

而且,其他例子也能告诉我们,荒诞也常在其不是为显示其他胡说的目的的情况下被用于诙谐技巧中。

一位著名的大学教师经常习惯于在其讲授他那门枯燥乏味的专业课时用无数的诙谐来质问学生。他年近得子,许多人前来贺喜。“是啊,”他回答道,“人类之手所完成的真是壮举。”——这句回答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且不合场合。毕竟,孩子是被认为是上帝的恩赐,特别是相对于人类手工劳动来说。但毕竟,它不是个无意义的回答,它的意思很快就为我们所知,这是个猥亵的回答。无疑这位高兴的父亲是在装作愚蠢,为了显示其他人的愚蠢。这个明显的无意义的回答使我们感到惊奇和迷惑不解,就如权威们所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把如此的诙谐整个都归因于在“困惑和启示”之间的转换。在下文我们给其以判断。因为现在我们必须满足于这样的事实,即此诙谐的技巧是在其显现某些困惑和胡说式的东西之中。

下面的利希腾伯格(Lichtenberg)的诙谐在“愚蠢”式的诙谐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他感到惊奇的是怎么会有两个洞正好精确地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对一些只是同义反复的句子去猜想,无疑是愚蠢透顶之事。它使人想起米什莱特的一句极其严肃认真的宣称,^① 此句断言是我回忆起的极好断言之一:“大自然把一切安排得都是那么美好,当一个孩子一降生人世就有一位母亲来照料

^① 《论女性》(1860)。

他!”米什莱特的话是一个真正的愚蠢论断,但利希腾伯格的那个诙谐却在其背后隐藏着某些东西,它利用愚蠢来为某种目的服务。但在其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不能给予任何回答。

(八)

现在我们从上面两个例子中发现,诙谐起作用是利用从正常思维方式转移开——移置和荒诞——作为产生诙谐表达形式的技术方法。这无疑是正当的——希望发现其他类型的错误推理也是这样的相似使用。并且,实际上也可能产生几个这类的例子:

一位绅士进了一家糕点商店,他要了一块蛋糕,但他立即又把它退回去,并又要了一杯酒,他喝酒后,没有付钱就准备离开,店老板拦住了他。“你想干什么?”顾客问道,——“你没有付这杯酒的钱。”——“但我已经用那块蛋糕交换了酒了。”——“你也没有付那块蛋糕的钱呀”——“但我也并没有吃它呀!”

这个趣闻也具有合乎逻辑的表面特性,正如我们所知一样,此趣闻的合乎逻辑只是其错误推理的“合适”的假面具而已。这个错误明显在于,这位狡诈的顾客构建了一个连接,此连接是在退回蛋糕和以其换酒之间进行的,但这个连接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情节可分为两个过程,这两过程,就如读者认为它们是彼此独立一样,从买者的观点来说,他认为是可以互相代替的。首先他拿了蛋糕,接着又退回去,因此,他不欠拿蛋糕的钱,然后他拿了酒,因为他需付钱,在买酒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此顾客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交换”这一关系。但更为确切地说,他利用双重意义的方

法建立了一个无效的连接。^①

这是个注定不是不重要的坦白的机会,我们正致力于在实例中显示出诙谐技巧的研究。因此,我们应该肯定我们所选的例子是名符其实的诙谐例子。然而,我们经常处在怀疑特殊的例子是否应被称为诙谐的情况中。在我们的研究尚未给我们提供标准以前,我们没有标准来处理这些例子。语言的使用方法是不可信赖的,其本身尚需就其合理性做出验证。在即将到来的决定中,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感觉(feeling)而不是其他的東西,其可被解释为如下意义,即决定是在伴随着我们知识所不能达到的标准的判断中所做出的。在我们最后的例子的情况中,我们必定感到怀疑,是否它应作为诙谐出现,或者是作为一个“高深”的诙谐,或者简单的作为诡辩。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在何种特征意义上才能叫做诙谐。

另一方面,下面的例子所展示的错误推理类型可以说是和前一例是完全相同的,无疑是一个诙谐。它又是关于一个媒人的故事。

媒人准备和那个挑剔的小伙子辩论,来为其所推荐的姑娘辩护。“我不喜欢我岳母,”小伙子说,“她不可理喻,是个愚蠢的妇人”——“但毕竟你不是和你岳母结婚,你要娶的是她的女儿”——

① (1912年加的注)如果一个诙谐寻找保持一种被其内容所暗示的特殊条件排除在外的连接,就会出现一个相似的胡说式的技巧。例如:利希腾伯格那把不带刀片的刀没有刀柄[进一步的解释见《精神分析运动史》末尾(1914d)标准版,14,66]。这一诙谐也被冯·福尔克(Von Falke, 1897)重复过,“这就是威灵顿公爵讲那些话的地方”——是的,就是在这里,但他从未讲过那些话。参见《福尔克回忆录》第271页。

“是的,她一点也不年轻,并且,确切地说也不漂亮”——“没关系,如果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那么,她将会对你更加忠诚”——“但她也没有很多钱”——“谁还在谈钱?你和钱结婚吗?毕竟你想要的是个妻子”——“但,她还有点驼背”——“好吧,你还想要什么?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陷吗?”

成为问题的是,一个并不美丽的姑娘,不再年轻,且还有严重的缺陷和一位令人不快的母亲及很少的嫁妆——对于订婚来说可不是什么诱人的条件。这位媒人,能在具有的每个缺点的情况下,指出怎样能和其相处的可能性。他甚至能称那无法解释的驼背是惟一的缺点且是每个人都允许其拥有的。表面的合乎逻辑再一次成为诡辩的特征并试图隐藏这个错误的推理。很明显,这位姑娘有很多缺点——其中有些缺点是可以忽略的,但有一个缺点是不能不被考虑的,她是未婚的。媒人以好像每一个分离的缺点都可以通过其借口被除掉的态度来行事。而实际上每一个缺点都会造成对这位姑娘的一定程度的贬低,这种贬低会累加在一个顶点上。媒人坚持孤立地看待每个缺点,拒绝把它们累加成为一个整体。

同样的忽略也是引起人们大笑的另一个诡辩的核心。但其被称为诙谐是值得怀疑的。

A君从B君那里借了一个铜壶,当A君归还铜壶后,受到了B君的控告,因为现在那个铜壶有个大洞,使其不能再使用了。A君为自己辩护道:“首先,我根本从未借B君的壶。其次,这个壶在我借它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大洞。第三,我把壶完好无损地还给了他。”每个辩护就其自身来说是有效的,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互相排斥。A君是孤立地考虑本应作为联系整体的两个论据。正如媒人对待姑娘的缺点一样。我们也可以说:“A君是在只能用或者

……或者……(either — or)的地方用了一个和(and)。”^①

在下面这个又是关于媒人的故事里,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诡辩:

将要成为新郎的青年抱怨道,新娘是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的瘸子。媒人反驳他说:“你错了,孩子,假如你和一个健康的姑娘结婚了,直直的大腿,你能从其中得到什么?你不能确保某一天她不会摔倒,折断大腿,终生变成瘸子。你想想那忍受痛苦的情景,焦虑的心情和医生的账单!但如果你娶了这个瘸子,那么以上所说的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不幸。”

这例子的表面逻辑性很差,没有人准备去接受一个已经是“完成了的不幸”,而这对其来说,只是一种可能。在这个思想序列中的错误可以在另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一个我不能完全克服其方言的故事。

“在克拉科夫(Cracow)的寺庙中,大拉比(Great Rabbi)N正坐着和其教徒一起祈祷。突然,他发出一声大叫,他以如下的回答来答复教徒疑惑的询问。‘就在刚才,大拉比L在伦伯格(Lemberg)去世了。’于是,教区便为死者举行了哀悼仪式。在随后的几天里,从伦伯格来的人被问道,拉比L是怎么死的,他有什么病。但他们对此未听到任何消息,当他们离开拉比L时,他还是很健康呢。最后,确凿的事实证明,当拉比N通过心灵感应感觉到拉比L去世时,他并没有死,他依然健在。一个陌生人趁机抓住这件事来嘲笑克拉科夫拉比N的教徒道:‘当你们的拉比N看到伦伯格的拉比L死了的时候,他自己便出了大丑。那个人至今还活着。’‘那

① 此趣事在下文第212页进一步讨论。

有什么不同?’教徒回答道,‘不管你怎么说,从克拉科夫能看到(Kück)^① 伦伯格毕竟是个很了不起的事。’”

这两个例子中很普遍的逻辑推理错误在这里被无掩饰地接受了。幻想的价值与现实相比被不适合地提高了,一种可能性几乎等同于现实事件。越过克拉科夫和伦伯格那一大片乡村距离远眺,如果他真正发现什么,那么这将是巨大的心灵感应的成就。但这位教徒并不关心这个。伦伯格的拉比在克拉科夫的拉比 N 宣布他死了,他真死时,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但这位教徒便强调重点从附属于其师值得尊敬的成就的条件转移到无条件的成就尊敬上。“In magnis rebus voluisse sat est”^② 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对可能性的偏爱而不考虑现实,所以,在前一个例子中(关于媒人的例子),媒人向将要成为新郎的男人建议:一个女人因意外而成为瘸子的可能性,应该被看做比她是否是瘸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事情。

这组错误推理的诡辩例子和另一组有趣的例子相似,在这组有趣的例子中,错误推理能被描述为“自动的、无意的或不自觉的”。也许是出于某种巧合,我将要提出的这组新例子又是关于媒人的故事。

一个媒人带着助手去推荐其所介绍的新娘,让其助手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话。“她像松树一样笔直”媒人说,——“犹如青松”助

① 一个意地希语词,是从德语 gucken(“去看”或“凝视”)演变而来:“看,远眺”——这个故事在弗洛伊德死后发表的文章《精神分析和心灵感应》中曾提及[1941d(1921)]标准版,18,188。

② 这段引文出自蒲洛柏夏斯·塞克斯都的《哀歌》,大意为“对于伟大的事,想象到就足够了”。

手附和道。——“她有令人倾倒的眼睛”——“多么美丽的双眼”附和者证实道。——“她比任何人受的教育都好”——“多么有教养啊！”“不过，有一点是真的，”媒人承认道，“她有点驼背”——“多么好的驼背啊！”附和者再一次证实。其他几个故事和这个相类似，但更有意思。

在媒人的协助下，新郎第一次和媒人去看新娘，他把媒人拉到一边，带着惊讶的神情抗议道：“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呢？”他责备地问道：“她既丑又老，是个斜眼，还是个龅龇和烂眼睛……”——“你没有必要放低你的声音，”媒人打断道，“她还是个聋子。”

新郎在媒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去新娘家拜访，当他们在厅里等待其家人出来闲谈时，媒人注意到那个带有玻璃门的茶几里，有一套精致的银盘陈列在里面。“看，看那里！你可以从这些东西上看到这家是多么富有的人家！”——“但是，”小伙子充满疑虑地问道，“会不会是只为这种场合才准备的呢？——他们借来这些东西，为了给人富有的印象？”——“这是个什么想法呀？！”媒人反驳道，“你想想谁会借东西给这样的人家呢？”

在这三个例子中都有同一种情况出现，一个人连续几次以同一种方式做出反应，当在下一个场合或情况和其自己自相矛盾时，他依然以这种表达模式来行动。因服从于自动的习惯性行为，他忽视了根据情况需要来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第一个故事中，那位助手忘记了带他去的目的是为使未来的新郎对被推荐的新娘产生好感。在一开始时，他执行其任务，当每个优点被提出时，他都给以强调；当其应该把她的缺点——驼背说成是不很重要时，他继续强调夸大新娘羞于承认的驼背。在第二个故事中，媒人

被新娘的缺点和毛病搞糊涂了,以至于他并不确信是否列出了他所知的缺点,虽然,那不是他的任务和本意。最后,在第三个故事中,媒人迫切地想让青年人相信新娘的富有,以至于他被这种愿望冲昏了头,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论点,他竟说出一些使他以前所有努力的结果都被推翻的事情。在每个事例中,不自觉的行为压倒了思想的表达的有利及适当的形式。

这是容易被看出的,但当我们注意到这三个故事,像我们将其作为“诙谐”一样,其也有权被称做“喜剧”(comic),这必定使我们产生困惑。和任何揭示及自相矛盾一样,揭示心理上的不自觉性也是喜剧的技巧之一。谈及此点,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正面临着诙谐和喜剧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是我们开始时打算避开的问题。这些故事或许只是“喜剧”而不是“诙谐”?这里的喜剧是以和诙谐一样的方法起作用吗?再有,是什么构成了诙谐的独特特征?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研究的最后这组诙谐的技巧在于提供了“错误推理”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观点,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对它们的研究是那么深入,以至使我们费解多于理解。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期望——对诙谐的技巧的更全面的知识使我们取得作为我们进一步发现的出发点的成果。

(九)

下面这组诙谐的例子是我们希望 and 要求的,它们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特别是它们的技巧使我们回想起已经知道的东西。

首先,这是个利希腾伯格的一个诙谐:

“一月份是我们向我们亲爱的朋友表示良好祝愿的月份,而剩下的其他月份是愿望无法实现的月份。”

因为这些诙谐都被描述得精巧而不是臃肿,达到效果的方法不是很有说服力,我们将多提出几个例子以加强其效果。

“人生可分成两部分,在前半生,我们希望后半生早日到来;在后半生,我们期待前半生能够回来。”

“经验是由经历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所构成。”

(这后两个诙谐来自费希尔,1889)

这些例子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前面曾讨论的那一组诙谐——以“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予以辨别的例子。特别是最后的这一个例子会使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不把它包括在那一组,而是在这里以一种新连结观点来介绍它呢?犹如前面“嫉妒(jalousy)一样”,“经验”再次以其自己的术语来解释自己(见第31页)。我不应倾向于很认真地讨论此种归类,但是考虑到另外两个例子(它们具有相似的性质),我想,另外一个因素远比同一语词的多种使用更突出和更重要,在同一语词的多种使用中,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对这种双重含义予以辅助的东西。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在这里,一旦新的、未曾预想到的统一建立起来,观念之间相互的关系就要相互定义或通过参照一个一般的第三种成分。我想将其称为“统一化”(unification)。它明显地类似于压缩成同一个词语的凝缩作用。因此,人的生活的两半个部分是通过发现在其中存在的相互关系来描述的:在前半生中我们期望后半生的到来,在后半生中我们期望前半生返回。更精确地说,两个非常相似的相互关系被选择来表述。对于关系的相似,有词语的相似性来对应,这确实使我们想起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期望……到来”和“期望……回来。”在利希腾伯格的诙谐中,一月与其他月份和其的对比是被对于第三种成分的关系(重复,修正的)特征化了的。这就是良好的

祝愿在一月份被接受,在其他月份无法实现的祝愿。在此,这种与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约似双重意义)的区别是很清晰的。^①

① 为了给出比上一例中更好的“统一化”的描述,我将利用我上文所提到的材料。——即保持在诙谐和谜语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消极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一个掩盖了另一个所展示的东西。哲学家费克纳(G. T. Fechner)当其失明时,就是靠制作许多这样的谜语来度过其时间的。这些谜语是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的特征,这使其具有特别的魅力。例如一个简洁的例子,谜语 No. 203(米赛斯费克纳的笔名《谜语书》第四版,扩充版未注明日期)。

Die beiden ersten finden ihre Ruhestätte,

Im Paar der andern, und das Ganze macht ihr Bette.

[我的两个第一个字节(Toten,死者)在我的两个最后的字节(Gräber,坟墓)找到其藏身之处,而我的整体(Totengräber,掘墓者)给他们铺床。]

我们除了知道这两个音节之间的关系外,我们不知道任何事情,我们不得不去猜测,对于整体,我们也只知道其与第一对音节之间的关系。

下面是两个用同样的关系或稍做修改的第三成分来描述的例子。

Die erste Silb' hat Zähn' und Haare,

Die Zweite Zähne in den Haaren,

Wer auf den Zähnen nicht hat Haare,

Vom Ganzen kaufe keine Waren.

No. 170

第一个音节有牙齿和毛(Ross,马),第二个音节在其毛中有齿(Kamm,梳子)。没有无毛之齿的人(如,不能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应该从整体(Rosskamm,马贩子)那里买东西。

Die erste Silbe frisst,

Die andere Silbe isst,

Die dritte wird gefressen,

Das Ganze wird gegessen.

No. 168

第一个音节,狼吞虎咽(Sau,母猪),第二个音节,吃(Er,他),第三个音节,狼吞虎咽(Kraut,杂草),整体是吃(Sauerkraut)。注意,在德语中,根据过程的执行者是人或是动物,两个不同的但却相似的动词都可以表示“去吃”(to eat)。

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谜语里,我们发现一个理想的统一性的例子,而且其不能被否认具有诙谐的特征。

Von der Letzten umschlungen

Schwebt das vollendete Ganze

Zu den zwei ersten empor.

被我最后的(Strick 绳子)缠绕着,我完全整个的(Galgenstrick,流氓)摇摇摆摆向我第一个(Galgen,绞刑架)顶端靠近。

绝大部分的谜语都缺少统一性。那就是说,猜测第一个音节的线索完全不依赖于指明第二或第三个音节的线索,也与单独发现整个词的暗示无关。

这里有一个无需解释的、简洁的统一性诙谐。

法国诗人卢梭(J. B. Rousseau)写了一首《子孙颂》的诗。伏尔泰(Voltaire)认为此诗不能流传到后世,并诙谐地评注道:“这首诗将达不到其目的。”(费希尔,1889,123)

这个例子使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正是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构成了可以称之为“机敏回答”的基础。因为妙答在于以攻为守,扭转战局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见第29页)。这就是在攻击和反攻击之间建立一种意想不到的统一。例如:

一个小旅店的老板的手指上得了个脓疮,烤面包师傅对他说:“你一定是因为把手指头伸到你的啤酒里去了,所以才得了此病。”“并不是那样,”旅店老板回答道,“是你的一块面包钻到我的指甲缝里去了。”(选自于《滑稽者》,1900)

“Serenissimus”^① (殿下)在各省巡视时,发现人群中有一人与他自己这么尊贵的人长得极为相像,他就招手叫那个人过来并问道:“你母亲是否曾经在皇宫中服务?”——“不,阁下,”这个人回答道,“但我父亲曾在皇宫中干过活。”

符腾堡的查尔斯公爵在一次遛马的时候,偶然地遇到一位染匠正在干活。公爵指着他所骑的灰马喊道:“你能把它染成蓝色的吗?”“是的,当然能,阁下,”回答道,“如果他能受得了开水煮。”

在这个极好“也一样”(tu quoque)的回答里,一个无意义的问题遇到了一个同样不可能的条件。这里还有另一个技术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染匠这样回答:“不,阁下,我怕这马受不了开水煮。”那么这个技术因素就不存在了。

① 这是德意志帝国统治下的喜剧刊物结合王室要人起的方便的名字。

统一性还有另一个相当特别有趣的技术手段可供使用：用连词“and”(和)把事物捆在一起。如果事物被这样捆在一起，那就意味着它们是相联系的：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那样理解它。例如，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谈到哥廷根市评论道：“一般地来说，哥廷根市的市民成份可分成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我们能准确地知道，海涅强调的是其后面附加的句子：“这四种人如出一辙，只是被分开来说了。”或者再如其谈到学校时，他说他不得忍受“那么多的拉丁语，装罐头和地理课”。这个系列容易被转换，因为“装罐头”的位置正是在两个教育科目之间。这告诉我们，男生对装罐头的无误的看法也一定会扩展到拉丁语和地理课上。

在李普斯(1898)所给出的“诙谐的列举”(并列关系)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发现下面所援引的例子和海涅的“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是非常相似的：

Mit einer Gabel und mit Müh'

Zog ihn die Mutter aus der Brüh.

(用一把大叉子和费很大的力气

他母亲才把他从炖肉边捡出来了。)

李普斯评论说，这里好像 Müh(麻烦，费劲)被作为和叉子一样的工具。然而，我们有这种感觉——虽然此诗很富有喜剧性，但远不是个诙谐。然而海涅的列举却是个诙谐，当我们不在回避诙谐和喜剧的关系问题时，我们会在以后回想起这些例子。

(十)

我们在公爵和染匠的例子中观察到，如果染匠回答是“不，我怕这匹马不能忍受开水煮”，那么它将通过统一性得以保留的诙

谐。但他却是回答道：“是的，阁下，如果它能受得了开水煮”。用“是”来替换了那个实际上是很恰当合适的回答“不”构成了一个新的诙谐的技巧方法，我们将继续追究在其他例子中这一技巧的应用。

下面的一个例子非常相似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例子（也是费希尔援引的），这个例子也是很简单的：

弗雷德里克大帝听说在西里西亚有位传教士以其善于和神灵相接触而闻名。他便派人把这位传教士请来，在接见他时就问了一个问题：“你能用魔法招来神灵吗？”传教士说：“奉陛下之命，但他们不来。”很明显，在这里，诙谐中所使用的方法是用反义词替换了惟一可能的回答“不能”，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为了完成这种替换，就有必要在“是”上加上一个“但是”。这样“是”和“但是”就能在意义上相等于“不能”。

就如我们所称的那样，这个“相反表征”（representation by the opposite）以不同的方式来为诙谐服务。在下面的两个例子中，它表现得更纯粹。

“这位夫人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于米洛的维纳斯”（Venus of Milo）。她也是非常老，像维纳斯一样，她也没有牙齿，淡黄色的皮肤上也有白色的斑点。”（海涅）

在这里，我们得到了通过和极端美丽的相似性来表现的丑陋。确定这些相似性只能存在于用双重含义的术语所表达的性质或并不太重要的细节中。后一特征应用到我们第二个例子——利希腾伯格的《伟大的精神》：

“他集所有伟大的特征于一身。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歪着脑袋；他不得不像凯撒一样戴着假发；他能像莱布尼茨一样喝咖啡；而

且,一旦他舒适地坐在扶手椅上,他会像牛顿一样,忘记吃喝,且不得不像牛顿一样被叫醒,他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戴着假发,他总是像塞万提斯一样,总有一个裤子的扣子没扣上。”

冯·福尔克(Von Falke, 1897)从爱尔兰回来时带回来一个特别好、相反表征的例子,此例子中绝对没有使用任何双重意义的词语。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蜡像展览馆里[好像是图索德夫人的(Madame Tussaud's)],讲解员正向一个有老有小的参观团体讲评着:“这是威灵顿公爵和他的马,”他解释道,这时一位年轻的女人问道:“哪个是威灵顿公爵,哪个是他的马?”“看你喜欢了,我可爱的孩子,”讲解员回答道。“你是付你自己的钱,你是做出你自己的选择。”

这个爱尔兰诙谐的还原将是这样:“竟把这些蜡像拿出来提供给人们,真是无耻之极!人们根本不能分清马和骑马的人(玩笑式的夸张)!这就是人们花钱所得到的!”这愤怒的呼声通过一个小事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一位女性以所有参观者的形象出现,同时,骑上的现象也被特性化:他必定是威灵顿公爵,他在爱尔兰是如此深受爱戴。无耻的展览馆老板和讲解员只知道赚参观者的钱,而没有给公众任何回报,这一事实被以反语表现出来——通过他自己吹嘘其为有良心的商人的谈话——他最记在心的是尊重公众通过付钱而获得的权利这句反语表现出来。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诙谐的技巧并不是简单的技巧。就此诙谐能使骗子坚持他自己的良心来说,这是个相反表征的事例;就此诙谐的效果——在某个情况下骗子被迫说出某些不同的东西而言——以致他用了我们所期待可敬的生意人的同一性的形象来回答——它是移置作用的一个例子。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这两种方法的连结之中。

该例子与另一组可以称之为“夸大性”(overstatement)的诙谐非常接近。在还原中,这些适合的肯定词“是”被否定词“不”所取代了。然而,由于其内容的原因,这个否定词同样含有一种更强烈的肯定力量,反之亦然。否定可以代替一个被夸大的肯定。例如,在莱辛(Lessing)的讽刺短诗可以见此:^①

Die gute Galathee! Man sagt, sie schwärz' ihr Haar;
Da doch ihr Haar schon schwarz, als sie es kaufte, war.
(好个加拉蒂!人们说,她总是把头发染成黑色,
其实她的头发买来时就是黑色的。)

利希腾伯格对哲学的存心不良的防范也是如此:

“天上和地上的东西要比你在哲学里梦想得要多得多”,哈姆雷特王子轻蔑地说。利希腾伯格知道这一责难根本不够严厉,因为此责难没有完全考虑到并说出来对哲学的反对意见。所以他补加上被哪丢掉的:“但是在哲学中还有许多在天上和地上找不见的东西。”他的补充是在哈姆雷特的责难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谴责。他是在哲学因其不足而补偿给我们的方式上加以强调的。

下面这两个犹太人的诙谐,因其没有任何移置作用的痕象,虽然它们是粗俗一类的诙谐,但是更为清晰明白。

“两个犹太人在讨论洗澡的问题,其中的一个说:‘不管我是否需要,我每年都洗一次澡。’”

这个人自吹自擂,很明显是在其说坚持清洁时对其不干净的确证。

“一个犹太人注意到另一个人的胡须上有饭屑残渣。‘我能说

① 仿效《希腊名诗选集》中的一首创作而成。

‘出你昨天吃的是什么。’‘好吧，那你说出来’——‘是扁豆’——‘你错了，我是前天吃的。’”

下面是个极为精彩的“夸大性”诙谐，此诙谐很容易被追溯到相反表征一类：

“国王屈尊去参观一个外科诊所，正巧遇到医生给一个病人实行切除腿的手术。他看完所有步骤，并不时地以其皇家的满意，大声地称赞道：‘很好，很好！我亲爱的教授！’当手术完成后，教授走到国王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问道：‘陛下是否要我把他的另一条腿也切除了？’”

在国王赞许和夸奖时，教授的想法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他看上去，好像是按国王的命令先切除这个可怜家伙的坏腿，而这只是为了国王的满意。毕竟，我确实是有其他的理由来实行此手术的。但他还是走到国王面前说道：‘我只是奉陛下的旨意来实行这个手术，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理由。您的赞许令我深感荣幸，因此，我只等您的旨意，把他的另一条完好的腿也切除。’通过这种方式，他说出了他所想的意思的反语，但这个反语是他所理解的。”这种反语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

正像这些例子所显示的那样，相反表征是被经常使用且具有强大功能的诙谐技巧的工具。但问题的另一方面——还有其他的東西，我们不应该忽视：即，这个技巧不仅仅是诙谐所特有的。当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在论坛上做的长篇演讲扭转了听众对凯撒葬礼的激情后，他最后再一次大声宣称：

“布鲁特斯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知道听众将会在现在冲着他喊出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他们是叛徒：高尚的人！”

或者,当 Simplicissimus^① 用种种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愤世嫉俗来描写一些“善感的人”时,这也是一种相反表征。但是,我们把这个不再叫做诙谐,而是叫做“反语或反语法”(irony),反语的特征化技术是相反表征。另外,我们读过或听过“反语法诙谐”。所以,可以没有疑虑地认为,仅仅单独通过相反表征是不足以说明诙谐的特征的。我们还需要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去掉这一技巧,诙谐就会消失了,这是个并不矛盾的事实。目前,在怎样把我们解释诙谐时所获得的这两个固定的观点协调一致方面,我们会发现困难的存在。

(十一)

如果相反表征是诙谐的技巧之一,我们可以期望诙谐也可使用其相反的方面——通过相似或类似的某些东西来陈述。实际上,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的问题,其就会像我们显示一组新的而且特别广泛的“概念性诙谐的技巧”,^② 如果我们通过某些“相关的”或“相联的”某些东西来替代通过“类似的某些东西”的方式陈述,我们将会更能确切地描述这一技巧的特性。实际上,我们将会从这后一个特征开始并立即用一个例子来证明之。

这是一个美国的轶闻趣事。^③ 两个并不是特别审慎的商人,凭借一系列的冒险经营,取得了巨大的财富。现在,他们努力来铺

① 慕尼黑著名的喜剧周刊。

② 与言语诙谐相对照、比较。见第95页。

③ 在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所做演讲的第三讲中再次提到此故事(1910a,标准版,11)。

平通向上流社会的道路。他们采取了一个方法,是其认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去请全城最著名、费用最高的画家来为他们两个画像。当那昂贵的画布首次在一个盛大的晚会展出时,两个东道主亲自领着最有影响的鉴赏家兼艺术评论家来到那两张画并排悬挂的墙前,希望获得好评。鉴赏家在画前审视了良久,接着,他摇了摇头,好像那里有其未找到的东西。他指着两张画之间的间隙静静地问道:“那救世主在哪里呢?”(例如我并没有看到救世主的画像。)

这句评论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又是一个不能被直接表达出来的某种东西的陈述问题。这种“间接表征”(indirect representation, 或译为“间接陈述”)是怎样产生的呢?从诙谐中的陈述开始,让我们沿着一系列极易建立的联想和推断的道路向后追溯。

我们能从“救世主在哪儿? 救世主的画像在哪儿?”这个问题,猜测出这两个画像使评论者回想起一个相似的情景,就像对于我们一样对其也很熟悉。然而这一情景包括的一个成分在这被缺失了——两幅肖像之间的救世主画像。而这里只有两种情景中的一个:基督挂在两个窃贼之间。这个诙谐使缺失的这一成分突出出来。存在于救世主两侧悬挂的肖像之中的相似性被诙谐所越过了。它只能是这样的事,在墙上悬挂的肖像是盗贼的画像。批评家想说而不能说的是:“你俩是一对流氓,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我对你们的肖像还能诠释什么呢?你俩是一对流氓——我知道这一点!”他最终通过一些联想和推断的方法来说出了它,即用我们称其为“隐喻”(allusion)的方法。

在我们遇到隐喻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立即想起连接,即双重意义。当在一个词里表示两个意义、其中一个意义更经常和频繁

使用，这样，它就会立即使我们想起这个意义。而第二个意思是比较疏远，因此不是很突出，我们建议称此种情况为“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见第 41 页）。在我们研究过的所有例子中，我们已说过它们的技巧不是一简单的技巧。现在我们就意识到“隐喻”是其中的复杂因素。例如：参阅那个由于妻子有靠山，所以能赚很多钱的倒置诙谐（见第 28 页）。或者关于那个教授用人类之手如此神奇，竟能完成如此壮举的话来回答人们祝贺他喜得贵子的荒诞诙谐（见第 60 页）。

上面那则美国轶事趣闻就是一个不带双重意义的隐喻。我们看到其特点被在概念性连接的某些东西所替换。很容易猜想到，可利用的连接不止是这一种。为了不使我们在细节的迷宫中走失，我们将只在很少的例子中讨论那些最显著的变化。

用于移置作用的连接可能仅仅在语音上相似，所以这个子类就与语音诙谐（verbal jokes）中的双关语类似。然而，这里的连接不是两个词之间在语音方面的相似，只是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特征性的短语之间等方面相类似。

例如，利希腾伯格编造了这样的一个谚语：“New spas cure well.”（新矿泉水能治好了病）。立即使我们想起一句谚语：“New brooms sweep clean.”（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两句话的第一个单词和最后的词及整个句子的结构都相同。^①毫无疑问，那个新谚语是作为非常熟悉的谚语的亲近关系而进入这个机智的哲学家头脑中的。这样，利希腾伯格的说法就变成那条谚语的隐喻

① 在德文中“spas”（Bäder）的第一个音节与“brooms”（Besen）第一个音节听起来完全一样，在这条德国谚语中，最后一个词是“well”（gut，好）。

(或暗示)。通过这种隐喻的方法,某些东西能不被直接地说出来——换言之,矿泉水除去能有治疗作用以外,还能产生出其他的另外一些东西。

相似的技术解释也适用利希腾伯格另外的玩笑(Scherz)或诙谐(Witz)^①:“A girl Scarcely twelve Moden (modes) old.”(一个才12岁模样的女孩。)这句话听起来很像“twelve Monden (moons)”(12个月亮),比如说,12个月,这或许是由于笔误,或者在诗歌中允许这样表达。但是,用改变的模式来替代变化的月亮作为确定女性年龄的方法,也会产生好的效果。

除了“微小修改”外,这种联系也可能存在于相似性中。所以,这种技巧平行于语音技巧(见第28页)。虽然这两种诙谐使人产生几近相同的印象,但如果从诙谐的运作过程来考虑,我们就能很好地区别它们。

这里一个言语诙谐的例子或是双关语类的例子:玛丽·威尔特(Marie Wilt)这个著名的大歌星,她不仅以其声音而著名,她还承受着人们用著名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著名小说改编的剧本之名所起的绰号的侮辱,暗示其有着畸形的形体:“Round the Wilt in 80 Days.”^②(绕着威尔特走一圈需要80天。)

又如:“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后”(Every fathom a queen),它是莎士比亚的被人熟悉的名句“每一英寸都是一个国王”的变体(Every inch a king)。人们用它来暗指一个有贵族气派、体格大得出奇的夫人。有人想把这一诙谐归之为“伴随修改的凝缩作为替代”

① 这两词的差别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尽地阐述。

② 德文“世界”一词是 welt。

(Condensations accompanied by modifications as substitute)(见 tête-à-bête, 第 18 页)。

一个朋友曾提起一个具有极高目标且不懈追求其目标的人：“Er hat ein Ideal vor dem Kopf.”(他有一个理想在他的头前面)通俗的说法是：“Ein Brett vor dem Kopf haben”(字面意思为：某人的头前面有一块木板——即“愚钝的”)。这种修改隐喻着这个句子，并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使用那上句的意义。这里，再次可把这一技巧描述为“带有修改的凝缩”。

如果修改只限定在字母上的改变，那么几乎不可能区别“修改方法的隐喻”和“带有替代的凝缩”。例如“Dichteritis”。^① Diphtheritis 对“diphtheria”(白喉)这种痛苦的暗示代表着那不称职的作家的著述是另一种公害。

只要以微小的转换为代价，否定分词就能使简洁的隐喻变为可能。

海涅说：“我的不信教的同伴斯宾诺莎。”(My fellow-unbeliever Spinoza)“我们这些非受上帝荣耀的人，工人、农奴、黑人、佃农……”(We, by the ungrace of God, day-labourers, serfs, negroes, villeins...)利希腾伯格就是通过提到这些不幸的人们来开始他的宣言(他没有提到更多的人)——他们比那些不得不修改其形式的国王和王子更有利拥有此头衔。

最后，另一种的隐喻存在于“省略”(omission)之中，可以和没有替代形式的凝缩来对比。实际上，在每一个隐喻中都有些东西被省略，即导致这一隐喻的思想序列。它只取决于是否是更明显

① 一个不存在词，据“Dichter”(作家)一词，可以译为“authoritis”。

的东西,是隐喻措词的空白或部分地填补此空白的替代物。因此,一系列的例子将引导我们从明显的省略回到前面的隐喻。

在下面的例子中,显示的是没有替代物的省略:^① 在维也纳有位机智而好斗的记者,他的抨击和谩骂,多次使其受到他所评击的对象的人身攻击。有一次,在谈论其老对手的一个新的不道德行为时,有人声称:“如果 X 听到这些,他又会挨耳光。”^② 这个诙谐的技巧首先包括明显胡说中的困惑,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知道一记耳光是怎样成为听到某些东西的迅速、直接的后果。如果我们在这个空白处插入这样的句子:“他将写如此刻薄的关于这个男人的文章,那么……等等”这个评论的武断就会消失了。通过省略方法的隐喻,联合胡说,就成为该诙谐所使用的技巧。

“他如此地赞扬自己,以至于用于烟熏消毒的蜡烛的价格都在上涨。”(海涅)这个空白很容易填补。被省略的成分被一个推理所替换了,此推理是在隐喻的形式中引回被忽略的成分:“自我吹嘘惹人烦。”

现在我们再继续那两个犹太人的故事,两个犹太人再次在澡堂外相遇了:

其中的一个犹太人感叹道:“一年又已经过去了!”

这个例子无疑使我们认为,在这里省略是隐喻的一部分。

下面的例子中,更明显的空白会被看到,虽然它是个名符其

① 弗洛伊德在给《鼠人》(1909d)的分析作脚注时,曾引用此例来显明强迫性症状中类似技巧的使用(标准版 10,227 页注)。

② 引语中所说的 X 指上文提到的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1908d,标准版,9,200)中引用过他的另一诙谐。

实、正确的隐喻诙谐。在维也纳的一次艺术家宴会后,发行了一本笑话集(jest-book),其中最受高度赞扬的警句是下面的这句话: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会乘出租车的。”

一把伞不足以遮雨。“迟早”只能意味着“如果雨下大了”,和出租车是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因为我们在此只关心此种类似的形式,所以我们将推迟进一步研究这个诙谐的时刻。

海涅的《卢卡浴场》包含着—系列十分螫人的隐喻。真实地使用这一诙谐的形式来为辩论目的服务——反对普拉腾伯爵(Count Platen)。^① 远在读者能怀疑到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之前,通过多类材料的隐喻,就预示着一个特别的主题,特别是不适合直接表现的东西——例如,在赫希·海厄辛斯的绕口令里“You are too stout and I am too thin; you have a good deal of imagination and I have all the more business sense; I am a practicus and you are a *diarrheticus*; in short you are my complete *antipodex*.”(你太胖,我太瘦;你有很多的想象,我有的是更多的商业意识;我是个医生,你害腹泻;简而言之,你是我的死对头)——“Venus *Urinia*”(维纳斯的尿)——“the stout Gudel von *Dreckwall* of Hamburg, and so on.”^② (汉堡的那个胖子古德尔·冯·德雷克沃尔,等等)。在下面的段落

① 奥古斯特·冯·普拉腾伯爵(1796—1835)抒情诗人,因其对浪漫主义运动的讽刺而引起海涅的憎恨。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性恋者。

② 这些例子都涉及到有关肛门的资料。虽然 Venus“*Urinia*”表面上是意味着尿,是 *Urania* 的误用,更重的是,意味着同性恋,柏拉图专题论丛中的爱。古德尔(Gudel)则是个真人,她是一个贵族式的富有的汉堡夫人,在这里,海厄辛斯给其取了带有肛门意味的假名字: *Dreckwall* (*Dreck* = 排泄)。所有这些例子都可以在《卢卡浴场》(海涅的《赖泽比尔德》中第三部分)中找到那一章的。

中,事件的描述是被作者转了个弯,开始时,他似乎只是想显示其顽皮的精神,但立即暴露其与辩论目的关系的征兆和同时显示其本身是隐喻。最后对普拉腾伯爵的攻击愤然而出,而对伯爵对人类的爱的主题的暗示就如鼎沸之水冲了出来并过度充溢在每一个海涅攻击其对手的天才和性格的句子中。例如:

“即使缪斯女神(Muses)并不喜爱他,他还在其能力中有天才的演讲能力,或更进一步说,她知道如何冒犯他。因为她不拥有那种天才的爱的自由,她必须对这个年轻人穷追不舍,她也知道怎样只抓住外在形式,而不管其迂回从不以高贵的姿态说出来。

“他就像鸵鸟一样,相信如果他把头埋在沙子里,把屁股留在外面,便能很好地隐藏起来。而我们的这种尊贵的鸟该把屁股埋在沙子里面,把头露在外面给我们欣赏,这样它就会隐藏得更好些。”

隐喻可能是最普通的、最容易操作的诙谐方法,而且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大部分简短诙谐的基础。而这种简短诙谐是我们在交谈已习惯的一浪接一浪的内容,其不能忍受从其原始土壤中分离出来而孤立存在。但它的确使我们再次想起这样的事实,即它使我们在研究诙谐中使我们开始迷惑不解的事实。隐喻在其自身中并不构成诙谐,正确地构成隐喻不需要这样的特征。只有拥有此特征的隐喻才能被描述为诙谐。因此,我们已经探究其技巧的诙谐的标准,再一次从我们这里躲避开了。

我们有时把隐喻描绘为“间接表征”。现在我们注意到各种隐喻,与其在一起的相反表征,和其他将要提到的技巧,可以统一到一个单一的大组。可以取更容易理解的名字“间接表征”(或“间接陈述”)。“错误推理”、“统一性”、“间接表征”——那么,这些都归

类在我们已知道的那些概念性诙谐的技巧下。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我们的这些材料,好像就会认识一个新的间接表征的子类,此子类能被精确地特征化,但是其很少有例子能被举证。这是一个表征——通过小的东西或更小的东西^①——它通过用微小的细节来完成充分表达整个特征的任务。如果我们在头脑中记住这个细小的东西与要表达的东西有关,且还能从其过程发现它,那么,这组就可以被我们归类在“隐喻”一类之下。例如:

一个加利西亚犹太人正坐火车旅行。他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解开他的大衣扣子,并把他的脚放在座位上。正在这时,一位穿着时髦的绅士走进了包厢。犹太人迅速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并摆出了较为合适的姿势。这位绅士翻着手里的笔记本,计算着什么,沉思了一会,突然问犹太人道:“请问,什么时候是赎罪日?”“哦,嗨!”犹太人说,在其回答之前就再次把脚放在座位上。

不能否认,这种通过微小事物进行表征与“经济性倾向”(tendency to economy)有关,而此种“经济性倾向”是我们在研究语词技巧后作为最普遍的因素留下的。

这里有一个极其相似的例子:

一位被请来看护男爵夫人分娩的医生声称分娩的时候还未到来,并建议和男爵一起在此时去隔壁玩一会儿扑克牌游戏。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听见一声痛苦的喊叫:“啊,我的主啊,疼死我啦!”她丈夫马上跳了起来,但医生示意他坐下:“没关系,让我们继

^① 弗洛伊德后来承认极其微小的东西的移置是强迫性神经症的一个特征性的机智。参见《鼠人》病史(1990d),标准版,10,241、244。

续玩牌!”又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再次听到孕妇的声音:“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多么难以忍受的疼痛啊!”——“你还不进去,教授?”男爵问道。——“不,不,现在还不是时候。”——最后,从隔壁传来清楚的哭声:“啊唉,啊唉,啊唉!”医生扔掉他的扑克牌,叫道:“现在是时候了。”

这个成功的诙谐通过举例子方法来说明两个问题,而此例子是通过一个贵夫人在生孩子喊出的痛苦的叫声来逐渐改变对其性格看法的方式说明这两件事的。其一,它显示了疼痛怎样使男爵夫人的天性冲破她所受的一切教育;其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怎样能依靠一个明显的微不足道的现象而被做出。

(十二)

还有被诙谐所使用的另一类间接表征,即“类比”(analogy)。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来讨论它,因为,对其的研究将会遇到新的困难,或者说,将会使我们在别的连结中已经遇到的困难特别明显。我们已经承认,在我们许多研究过的例子中,我们尚不能清除是否它们被完全认作是诙谐的疑问。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我们认识到我们探究的基础已经严重地动摇了。但与其他材料相比,我们只在类比诙谐中更强烈地或更经常地意识到这种不肯定性。有一种感觉——这可能是大部分人在同种情景是同样的——它告诉我“这是个诙谐,即使在这种隐藏着的诙谐的本性被发现之前,我能断言它是个诙谐。”但这种感觉把我留在困惑之中,尤其经常是在诙谐的类比的事例上。如果一开始我就毫不犹豫地宣称此类比就是诙谐,片刻之后我就会发现它给我的乐趣与我习惯的从诙谐中获得的乐趣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许多诙谐性的类比很少有能像好

的诙谐那样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情况,使通过我平常的方法来清除这一疑虑,对于我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平常的方法即——把我自己限定在那些最好的和最有效的例子种类上。

很容易举出一些特别好且有效的类比的例子,但它们作为诙谐不能使我们产生印象。《奥蒂莉的日记》中的温柔和英国皇家舰队的红线之间的类比就是这样一个极好的类比。我禁不住又要引用在同一意义上的另一个例子,此例子,我从不厌倦对其的赞美和其所产生的效果。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就是这样以此类比来结束其著名的辩护演讲“科学与工人”(Science and the Workers):“就像我刚才所说明的那样,一个把自己生命奉献给这条‘科学与工人’的箴言的人,正在被指控有罪。如果这就是他的命运,这只能是化学家在其专注的实验中被曲颈瓶溅出物所伤害,一旦这种干扰消失,只是对其材料的反叛皱一皱眉,他将平静地继续追求他的研究。”

在利希腾伯格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贴切而诙谐的类比(1853年哥廷根版的第2卷),我正是从那里选用我们的研究材料的。

“举着真理的火炬从人群中走过而同时又不烧焦某些人的胡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疑,此句话好像是个诙谐。但当经过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其诙谐效果并不来自类比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次要的特征。“真理的火炬”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类比,只是一个长期被人广泛使用,并逐渐还原为“a cliché——作为总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当某一类比有幸被语言应用。虽然我们几乎不再去注意“真理的火炬”这句话中的类比,但利希腾伯格却使它恢复了原来的全部力量,因为他对此

类比做了补充且从其引出一个结果。但我们已经熟悉像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作为诙谐技巧的分节表达来给出其全部意义。它在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利希腾伯格这句话语所产生的诙谐印象很有可能就是由于它与这种诙谐技巧有关的缘故。

同一判断必定适用于同一作家的另一诙谐类比：

“确实，这个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灯(Licht)，但却是个伟大的烛台(Leuchter)……他是个哲学教授。”

把一个有学问的人描述成一盏伟大的灯(a Lumen mundi)，早已停止作为一个富有效率的类比，不管其原来是否有作为诙谐的效果。但如果进行修改，第二个新的类比就会从其中获得，此类比焕然一新，恢复其原有的力量。第二个类比从其中产生的方法好像是决定着这个诙谐的东西，并不是这两个类比本身。这将是和在火炬的例子中的同样的诙谐技巧例子。

下面的例子好像因为有另外的原因才具有诙谐的特征，但其必须被相似地判断：

“书评对我好像是一种儿童疾病，新出版的书或多或少地都患有这种病，有最健康的书死于它的例子，也有最虚弱的书却能通过它的例子。有些是联合起来一起逃脱它的检查。为对抗它，许多书以序言和献辞这个护身符来做这种努力，或者甚至用作家本人的评价来给它作预防注射，但这样做总是不能有所助益。”

在第一个例中，书评和儿童疾病的比较是建立在书籍问世后首先是暴露给批评家这样的事实之上。我不能冒昧地断定，就此点看，是否这种比较有诙谐的特征。但如继续比较就会证明，新书接下来的命运能在相同类比的框架中或者通过相关的类比表述出

来。像这个类比一样的延长无疑是在诙谐的本性之中,但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诙谐技巧是以统一化和一种出乎意料的连结作用来实现的。这种统一化的特征是并没有因为在这个例子里它是对第一个类比的补充这个事实而发生什么改变。

在另一组类比里,人们总想把具有诙谐特性这种印象归因于另一因素,即另一个本身与该类比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因素。有些类比包含着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并置(juxtaposition),常常是一种听起来很荒谬的组合,或者这些类比常常被作为该类比的结果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大多数利希腾伯格的例子均属此类。

“很遗憾,人们看不见作家们博学的肠子,否则就能发现他们都吃了些什么。”博学的“肠子”的确是一个困惑和荒谬绝伦的描述形容词,其只有通过这个类比才能被解释。如果把这个作为诙谐的类比的印象完全彻底地归因于这个并置的令人困惑的特征,情况该是怎么样?如果是这样,它将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一种诙谐方法——“荒谬表征”(representation by absurdity)。

利希腾伯格还曾在阅读和教育资料的吸收和物质营养的吸收之间使用此类比,制作了另一诙谐:

“他认为在家学习会效率很高,因此,他完全爱好博学的马厩喂养。”

由这同一位作家使用的类比展示了同样的荒谬,或者至少是醒目突出的形容词表述方式,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这正是诙谐的真正手段。

“那是我道德构成的抵挡风雨的那一面,我的那一面可以忍受一切。”

“每一个人都有其道德背面(backside)。除非需要,否则他绝

不会把这一面暴露出来。他总是用令人尊敬的马裤尽可能长久地把其掩盖起来。”

“道德的背面”(moral backside)——这个引人注目的表述形容词的指派物就是类比的结果。但附加的还有,此类比进一步带有文字游戏——“需要”——和第二个更不寻常的本身可能就有诙谐在其中的并置(令人尊敬的马裤),而得以继续进行。至于马裤,由于它们是令人尊敬的马裤,其本身就如其所示那样,变成一个诙谐。如果这整体给我们一个好诙谐的类比的印象,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们开始注意到,我们倾向于、可以说是很普遍地倾向于,把只附属于整体的一部分的特征,根据我们自己的估计,扩展到整体本身。这个“令人尊敬的马裤”偶然地使我们回忆起海涅的某些与此类似的令人困惑的诗行:

...Bis mir endlich,
endlich alle Knöpfe rissen
an der Hose der Geduld.
(……直到最后
最后每一个纽扣才迸发出去,
在忍耐的我的马裤上)^①

毫无疑问,最后两个类比都有我们在所有好的(也就是说,在所有适当)类比中找不到的特性。就如我们所搁置的位置一样,他们在很大程度具有“贬低意义”。它们并置一个很高范畴的东西,抽象的东西(在这个例子中,“令人尊敬的”和“忍耐的”)与一个非常具体和类属很低的东西(“马裤”)在一起。我们将在另一连结中

① 《罗曼采罗》第三卷(希伯来旋律),杰胡达·本·阿莱维四世。

来考虑是否这个特殊性与诙谐有关。在这里,我们将试着分析另一个在其中的贬低性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例子。温伯尔(Weinberl),这个内斯特雷的滑稽剧《他想狂欢》中的小职员,为自己勾画有那么一天,当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商人时,他将回顾他的年青岁月:“当记忆仓库前面的坚冰像这样在友好的谈话中一样被劈开,”他说,“当过去的时光的通道的拱门被再一次开启,想象的陈列橱被过去的商品所填满……”^①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是在抽象事物中和非常普遍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类比。但此诙谐依赖——或是全部或是部分——于这样的事实——一个小职员用从他日常生活中攫取的东西来进行类比,但把这些抽象概念与他生活中普遍充满的日常事物连结在一起,就是一个统一性的行动。

让我们回到利希腾伯格的类比:

“导致我们做任何事的动机可以像 32 种风(罗盘上的点)那样安排,且可以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名字:例如,“面包——面包——声誉”或者“声誉——声誉——面包”^② 利希腾伯格的诙谐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某些适合、机智和机敏的东西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对是什么构建此诙谐的性质的判断被引入歧途。如果某些诙谐的东西混合着绝妙的意义存在于一个这样的句子中,我们可能被引导去宣称整个叙述是一个极好的诙谐。而我宁愿冒险地宣称,存在于真正的诙谐本性的东西里的每样东西都是我们从我们对这种奇怪的组合“面包——面包——声誉”的惊异中产生出来的。

① 原文是用澳大利亚方言所写。

② 弗洛伊德在将近 30 年后,在他致爱因斯坦的公开信《为什么要战争》(1933b)中又讲过这个类比。

因此,就诙谐而言,它将是一种“荒谬化表征”(representation by absurdity)。

奇怪的并置或荒谬的表述的归因能通过其自己本身作为类比的结果而存在。

利希腾伯格曾说过:“A zweischläfrige woman.”(一个能睡两张床的女人)“An einschläfrige church-pew.”(一个能睡一个人的教堂长椅)^① 在这两个例子之后,都有一个床的类比。在这两者之中,除了“困惑”技巧以外,还有“隐喻”技巧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在令人瞌睡的布道效果中的隐喻,另一个是在取之不竭的性关系主题中的隐喻。

迄今为止,我们已发现,当某一类比作为诙谐的本性而使我们感到惊讶时,这种印象都归因于对我们已经熟悉的诙谐技巧的混和。但是,另外一些例子似乎能证明类比本身是诙谐。

利希腾伯格就是这样来描述某些可指明而未指明的颂歌的。

正如雅各布·博姆(Jakob Böhme)^② 不朽的著作中的东西,是用散文表达,颂歌是用诗歌体来表达的。散文表达是一种野餐,在这种形式中,作者提供词语,读者提供意义(sense)。

当他像哲学家那样辩论时,他通常总是给事物撒上一片宜人的月光,这种月光一般说来是令人感到愉悦的,但不会把任何单个事物显示清楚。

① 这两个德文词——字面意义“能睡两个人”和“能睡一个人”——通常指床。如“双人的”和“单人的”。然而,“Einschläfrig”也有“引起睡眠的,嗜睡的”之意。

② 雅各布·博姆(1575—1624),德国新教的神秘主义者。

下面是海涅的一段描写：

“她的脸酷似一张(将原有文字擦去后)重新书写的羊皮纸。在这张纸上,在刚用黑体字书写的神父经文的原稿下面,潜藏着一首被涂掉了一半的古希腊爱情诗。”(《哈尔茨山游记》)

或者让我们来看看《卢卡浴场》中带有贬低^①目的的兄长的类比：

“天主教的教士更像在一家大商行中供职的小职员。教堂,这个大公司,在教皇领导下的,给它提供固定的工作,并作回报给其固定的工资。他懒惰地工作,就像那些不为自己利益工作的人一样。他有大量的同事,其能在大家都在忙碌时逃脱注意。在其心中所有的只是这个商行的信誉和其还能更好的维持,因为如果它破产了,那么他也将丢掉其谋生手段。在另一方面,与此不同的是,一个新教的教士在某个事件中,自己是老板,他为他自己的利益而从事宗教生意,他不像他的天主教商人老兄那样进行大宗批发买卖,他只是零售生意。因为他必须独自来管理,所以他不能偷懒。他必须宣传其信仰教条,他必须诋毁其竞争者的信仰教条,他的确是个零售商,他站在其零售店内,对所有的大商行、特别是罗马的伟大的商行,它给那么多簿记员和包装工人——成千上万的人发工资,而且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工厂——充满了商业嫉妒之情。”

在面对此例子和很多其他的例子时,我们就不能再争论如下的特征了:一个类比在其本身中就拥有作为诙谐的特征了,而且没有这种印象——被具有熟悉的诙谐技巧的复杂性解释的印象。情

^① 见第208页注①。

况确实如此,但我们完全失去了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类比的诙谐特征的东西,因为此特征肯定既不存在于作为表达形式的类比中,也不存在于进行比较的作用中。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类比归入诙谐技巧所使的“间接表征”这一类,而且,我们解决的必定是我们在类比事例中所更为清晰地遇到的问题,而不是较早遇见的诙谐作用的方法中的问题。然而,无疑必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某些事物要么是诙谐要么不是诙谐的决定,在类比中比在其他的表达形式中提供更多的困难。

然而,理解中的空白并没有给我们抱怨前面的研究毫无结果的余地。在我们必须准备把这种内在联系归因于诙谐的不同特点的观点上,那么要求我们能完全地解释此问题仍一方面——在我们未能概观其他方面之前——这将是不审慎的。无疑,我们现在将从其他方向来攻克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肯定所有诙谐技巧的可能性都未能逃脱我们的研究吗?当然不能。但继续的新材料的研究能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进行(joke-work)的一些最普通的、最重要的技术方法——在所有尽可能多的事例中,对那些心理过程的性质的判断是被要求形成形式的。尽管迄今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判断,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还拥有此方面的指示,从其中我们可望得到的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解释。那个伴有令人感兴趣的替代词形式的凝缩过程,我们将其作为言语诙谐技巧的核心来看待。此过程指向梦的形成,在和梦的同样的心理机制中,其被发现。然而,概念诙谐的技巧是同样正确的——移置、错误推理、荒诞、间接表征和相反表征——这些技巧在梦进行的技巧中也一个或全部的出现。由于移置作用而使梦显得离奇古怪的外表现象阻止我们认识其为我

们醒时生活的继续。荒诞和无意义在梦中的使用,使其被认作是心理的产物为代价,并使权威们假定其为精神活动的分解、批评的中断、道德和逻辑都是梦的形成的必要条件。相反表征在梦中如此普通,以至于有关梦的解释的流行著作——其是完全错误的,也被推崇备至。间接表征——这个用一个隐喻,一些微小事物的取代,是一个近似于类比的象征主义——是精确地使梦的表达模式从我们醒时的生活中区分出来的东西。^① 在梦之进行和诙谐进行的方法之间如此广泛的一致性,不可能只是一个偶然。在细节上显示这些一致性和研究其基础将成为我们后面的工作之一(见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节 诙谐的目的

(一)

当我在上一章的末尾,写下海涅把天主教牧师比做一家大商行的雇员,把新教牧师比做零售商时,我就意识到一种抑制,此抑制使我趋向不做这种类比运用。我对自己说,在我的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人不但敬仰其宗教信仰且尊敬其领导和助手。这样的读者将受此类比的侮辱,并将进入一种感情状态——此状态将阻止他们在决定或者是类比,在关于自我描述就具有作为诙谐的外表,或作为某些另外的增添的东西,而使其具有诙谐的特征这一问题时的兴趣。通过其他类比——例如,如上面谈到的相邻的那个某

① 参见我的《梦的解析》的第六章“梦的工作”(The Dream-Work)

一特别的哲学遍撒宜人月光于事物的类比——似乎没有必要担心它们对我们的部分读者所产生的干扰。最虔诚的人将会持有冷静判断我们问题的情绪。

很容易区分诙谐的特征——此特征是听者对其产生不同反映所依赖的。在一种情况下,诙谐其本身就是目的,其并不为其他特殊目标服务,在另一种情况下,它的确服务于一种目标——它变成了倾向性(tendentious)。只有具备一种意图^①的诙谐才去冒险遇到那些不想听其的人。费希尔把没有倾向性的诙谐称为“抽象性”(abstract)诙谐。而我更喜欢把它们叫做“单纯性”(innocent)诙谐。

由于我们已根据诙谐技巧所使用的材料把诙谐分为言语诙谐(Verbal jokes)和概念诙谐(conceptual jokes),现在我们就该来考察那种分类和我们介绍的这种新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另一方面是抽象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此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它们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诙谐产品的分类。有些人会有这种印象——单纯性诙谐主要是言语诙谐,但概念诙谐更为复杂的技巧绝大多数服务于明确的意图。但单纯性诙谐是和文字游戏和语音相似共同起作用的,恰如单纯性诙谐利用概念诙谐的所有手段一样。就其技巧而言,要显示倾向性诙谐只需要言语诙谐,这是轻而易举之事。例如,那些以专有名词做游戏的诙谐经常带有侮辱和伤害的意图。不用说,虽然它们是言语诙谐,但是绝大部分单纯性诙谐都曾言语诙谐。例如,最

① 德文名词“Tendenz”在该书中被译为意图“Purpose”(参见“一种有意图的游戏”)。德文形容词(tendenziös)是从其衍生出来的,已自然地成为一个英语形容词,因此这里就译成了“有倾向性的”(tendentious)。

近变得很流行的“互换(的)叠韵”,^① 在其中的使用技巧是带有修改的同一材料的多种运用,是完全不同于其所构成的技巧。

Und weil er Geld in Menge hatte,

lag stets er in der Hängematte.

(因为他有钱在数量上,

所以他总是躺在吊床上。)

希望没有人对从此毫不装腔作势的韵律中获得的快乐——正好是和我们认为其是与诙谐的相同提出问题。

在利希腾伯格的类比中,能找到很多好的抽象性或单纯性概念诙谐的例子,其中有些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我再补充一些例子:

“They had sent a small octavo volume to Göttingen, and had got back something that was a quarto in body and soul.”

(他们已把一个小小的八开本寄到哥廷根,并回收到一些从形状和精神差不多的四开本的东西。)

“In order to erect this building properly, it is above all necessary that good foundations shall be laid; and I know of none firmer than if, upon every course of masonry *pro*, one promptly lays a course *contra*.”

(为了合适地使这座建筑物竖起,首要的是,必须有好的地基被放下,而且我知道没有比铺好前一层之后立刻铺上后一层更坚固的方法了。)

“One person procreates a thought, a second carries it to be bap-

① 字面意义,“摇摆韵律”,它将是我們知道的“首音互换”的一种韵律形式。

tized, a third begets children by it, a fourth visits it on its deathbed and a fifth buries it.” (Analogy with unification)

(—一个人生殖一种思想,第二个人拿它使之受洗,第三个人通过其生了孩子,第四个人在它临终的床前拜访它,第五个人埋葬它。)(带有“统一性”的类比)

“不仅他不相信鬼魂,他甚至也不惧怕鬼魂”。在这个诙谐中,诙谐完全在于这种表征的胡说形式(the nonsensical form of representation)。这种表征形式把通常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放在比较的位置上,把认为更重要的成分放在肯定的位置上。如果此诙谐的伪装被拿掉,那么我们将得到:“理智地清除对鬼魂的恐惧要比当这种恐惧的情况出现时而逃离它要容易得多。”这将不再是诙谐,虽然它是正确的,且还是个很小的心理发现——和莱辛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表现的是同样的东西:

“并非所有嘲弄他们锁链的人都是自由的。”^①

我想借此机会来澄清一个可能导致某种误解的问题。因为“单纯的”或“抽象的”诙谐远不是和“琐碎的”或“缺乏主旨”的诙谐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们仅是含有将要被讨论的倾向性诙谐相反的意义。就像我们的例子所显示的,单纯性——即没倾向性的——诙谐也可能有很丰富的主旨,它可能表达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诙谐的主旨是诙谐的独立成分,并是思想的主旨,其在这里,通过某种特殊的安排,作为诙谐表达出来。无疑,就如钟表制造商通常提供带有相似价值的事例的特别的好的运动时所做的一样,诙谐中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诙谐的路上所取得的最好的成就被用

① 《智者纳旦》第四幕第四场。

作最丰富、伟大主旨的发展。

如果我们在概念诙谐的事例中——在思想的主旨和诙谐的发展之间做个严格区分,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有助于使我们在判断诙谐的不确定性时的更清晰的发现。因为它证明——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得于诙谐的乐趣是基于其主旨和其作为诙谐的效果的联合印象,且我们让自己被一个因素盖过其他因素所欺骗。只有在这个诙谐被还原后,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个错误的判断。

而且,言语诙谐中也有同样的事情,当我们被告知:“经验是由经历其不想经历的东西而构成”时,我们被迷惑了,并且认为我们已经学到一条新的真理。片刻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在伪装下的陈词滥调:“受伤使人聪明。”(逆境是最好的老师)(费希尔(1889)。此诙谐成功地定义经验最适宜的方法,是通过利用词语“经验”来欺骗我们高估了句子的主旨。在利希腾伯格关于“一月”的统一性诙谐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它除去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以外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什么东西——新年的祝愿很少像其他祝愿那样变成现实。在许多相似的例子中,情况莫不如此。

我们在其他诙谐的例子中就发现相反的情况,在这些诙谐中,正是思想的正确和恰当使我们入迷,因而我们把整个句子叫做精彩的诙谐——而另一方面,只有思想是精彩的,而诙谐的成就经常是虚弱的。正是在利希腾伯格的诙谐中,思想的要点经常是比诙谐的外表更具有价值,而我们却极不公正地注意后者。例如,关于“真理的火炬”这个谈论是很难解释为诙谐的一个类比,但由于它如此恰当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坚持说它是个特别好的诙谐。

利希腾伯格的诙谐之所以著称,首要的是因其智力内容及它们确定无疑地击中要害。歌德在这一点上是很正确的:说这位作

家实际上在其诙谐和俏皮的观念下掩盖了某些问题。也许这样说更为正确：他们接触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例如，当他以诙谐方式评论时：他曾这样读《荷马史诗》很多遍，即他总是以读“angenommen”(假定)来替代读“Agamemnon”(阿伽门侬)——这里所使用的技巧是“愚蠢”加上“语言的相似”——利希腾伯格发现的只不过是误读的秘密。^①

下面这个诙谐——其技巧使我们很难满意的诙谐也具有相似的情况：“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有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这里所表现的愚蠢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在这个简单的评论背后有一个在动物结构中的重大的目的论问题。眼皮裂缝恰好开在显示角膜的地方，这一现象完全不是一件自然的事，除非进化论能给我们阐释这种巧合。

我们应该在头脑中记住这样的事实，即一句诙谐的话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整体的印象，在其中，我们是不能把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从诙谐之进行所起的作用区分出来的，或评价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且与此平行的例子。

(二)

从理论阐释诙谐的观点上来看，单纯性诙谐对我们来说肯定比倾向性诙谐更有价值，浅显诙谐比深奥诙谐也更有价值。单纯性诙谐和浅显诙谐可能会以最纯粹的形式来把诙谐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因为通过它们，我们能避免被其意图所迷惑的或被其良好

^① 参见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十章，也可见第六章(A)，例八(1910年增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1916-1917)的第二讲末尾也对这个诙谐进行了讨论。

的意义而误入歧途的判断的危险。基于这些材料,我们的发现能得到更新的发展。

我将挑选言语诙谐可能例子中的最单纯的一个例子:

当一个女孩子正在洗漱间梳妆打扮时,她被告知有一个来访者,她抱怨道:“噢,当一个人在 *anziehend*^① 时,她自己却不能被看见,这是多么惭愧的事啊!”[克莱恩保罗(Kleinpaul,1890)]

然而,因为对于我是否有权把这个诙谐描述为无倾向性诙谐这点,我不能不产生怀疑,所以,我将再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也不致遭到反对的事例来代替它。

在一次我被作为客人而邀请参加的宴会上,在宴会的最后,端上来一种被叫做“*Roulard*”^② 的布丁。因为制做这种布丁点心,厨师必须具有高超的技艺。所以一个客人问道:“它是在家里自制吗?”主人回答道,“是的,的确。是一个“*Ahome-roulard*”^③ [自制的肉卷,亦是“地方自治”(home-rule)的谐音]

这一次我们将不去研究此诙谐的技巧,我们的目标是把注意力转向另一因素,这一因素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兴编出来的诙谐使我大笑不止,给我们带来了乐趣。在这个例子中,就像在其他无数的例子中,听者的快乐感觉不可能从诙谐的目的或者从其智力内容中产生。这里除把快乐感觉和诙谐技巧连结起来以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见的东西。我们早些时候已描述过的那些诙谐技巧性的方法,诸如凝缩、移置、

① *anziehend* 既有“打扮”之意,又有“吸引人”之意。

② *Roulard* 也许应该拼写成 *Roulade*。

③ 在原文中,人们把“Home Rule”这几个词补进英语中。

间接表征等等,都有一种使听者产生快乐感觉的能力,虽然我们最后也无法得知它们是怎样获得这种能力的。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达到了在我们诙谐归类中的第二个论题。第一个论题主张诙谐的特点在于其表达形式。让我们进一步反思这个第二论题实际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东西。它仅仅是分离了我们前面早就注意到的研究中所已经包括在其中的东西。当我们已成功的还原诙谐时,它将被回忆起(此诙谐被其他的诙谐所取代其表现形式,而同时小心地保护了它的意义),它不仅将丢失其作为诙谐的特征,而且也丧失使我们发笑的能力,即丧失了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能力。

没有和我们哲学权威们的讨论,我们将在此点上不能进一步发展。

那些认为诙谐是喜剧的部分的哲学家和那些把喜剧本身归结在美学的标题下的哲学家,他们定义美学理念是通过这样的条件:在其中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事物中得到什么或用其做些什么,我们不需要事物来满足我们主要的实际需要,但我们只满足于对其进行沉思和从此观念中得到乐趣。“这种乐趣,这种观念,是纯粹美学的观念,它只存在于其自身中,它的目的只在其自身且它也不能实现生活中的其他目的。”(费希尔,1829)

我们的观点几乎不和费希尔的观点相矛盾。我们也许只是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传送其思想——如果我们仍坚持认为诙谐性活动毕竟不应被描述为无所指或无目的,因为它有在听者身上引起快乐的确定无误的目的。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在没有观念中无意图时做任何事情。如果我并不要求我们的心理器官在此时来满足我们必需的满足之一,我们将允许其为快乐服务,同时,我们设

法从其自身的活动中寻找快乐。我猜想这就是主宰所有审美观念的普遍条件。但由于我对美学知之太少而不能进一步扩充这个论断。不过,至于诙谐,我能断言,基于前面已经获得的两个发现,无论其是智力的因素或是其他的什么,它都是一种目的在于从心理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活动。无疑,还有其他的活动具有这相同的目的。但根据其设法得到的快乐的心理活动领域,或根据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它们或许有些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出决定。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诙谐技巧倾向经济性原则,且诙谐通过其部分被控制和快乐的产生连结在一起。

但是,在我们准备开始解决诙谐之进行的技巧方法是怎样在听者身上产生快乐之谜之前,我们不得不回忆这样的事实,即为了简单和更清晰的缘故,我们把倾向性诙谐放在一边。毕竟,我们还将试图解析诙谐的目的是什么和其怎样为此目的服务的问题。

首先,有一个研究已经警告我们不要在我们研究从诙谐中得到快乐的起源时把倾向性诙谐放在一边。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效果通常是适度的。它在听者身上所取得的全部效果也只是一种明显的满意感觉和轻轻的笑容。从几个适当的例子中,我们就能看到部分的效果归因于其智力内容。无倾向性诙谐很难取得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而这一效果使倾向性诙谐成为这样不可拒绝的。由于这两种诙谐的技巧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根据其目的和性质,必定有快乐的源泉供它们使用,而单纯性诙谐是接触不到这一源泉的。

诙谐的目的能被很容易地评论了。在诙谐的目的不在其本身的地方——即其不是个单纯性诙谐的地方,那么它可能只为两种目的服务,并且这两种目的本身就能被归结在单一的标题下。它

要么是敌意诙谐(hostil joke)(服务于攻击、讽刺、防御目的的诙谐),要么是淫秽诙谐(obscene joke)(服务于暴露目的)。必须进一步重申,诙谐技巧的种类——无论是言语诙谐或概念诙谐——和这两种目的无关。

要说明诙谐为这种目的服务的方法是更为困难的任务。在这项研究中,我将首先来处理的不是敌意诙谐而是暴露诙谐(exposing jokes)。的确,它们远不足以值得研究,仿佛人们对其本身的反感转移至对其进行讨论这方面来了。我们将不允许我们自己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遇到一个诙谐性的边缘事例,它允诺给我们启示的东西比模糊的东西多。

我们都知道“smut”(淫词秽语)意味着什么:通过言语来把性事情和性关系突出出来的倾向。然而,这个定义也并不比其他定义更有效性。尽管有这个定义,一次关于性器官解剖学或生殖生理学(physiology of procreation)的演讲也没有必要与猥亵话语联系起来。更进一步有关的事实是,猥亵话语指向一个特定的人,人们通过这个特定的人产生性兴奋,希望这个人在听笑话时意识到讲笑话者的性兴奋,并因此相应地也产生性兴奋。其他的人将可能导致羞愧或难取代这种兴奋,其只是对兴奋所产生的反应,也是对这种兴奋的转弯抹角的承认。因此,猥亵言语起初是指向女性的,类似于勾引。如果一个男人附和男人从说或听猥亵言语中得到乐趣,这种原初的情况,应归因于社会抑制不能被现实化,同时其是可被想象的。一个听了猥亵言语而大笑的人好像他是一个性攻击行为的旁观者似的。

组成猥亵言语内容的性材料不仅包括男女各自特有的东西而且也包括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东西和涉及羞涩情感的东西——这就

是说,在更为可理解的意义上说,包括排泄领域。然而,这是通过性涵盖儿童时代的意义,在儿童时代这个年龄阶段,就如其所是的那样,在泄殖腔其中有关性的东西和有关排泄的东西几乎不被或根本不被区分。^①在整个神经症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neuroses)的范围内,有关性的东西仍包括有关排泄的东西。从幼儿或婴儿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猥亵言语就像其所指向的异性的暴露状态,通过说出这些猥亵言语强迫被侮辱者想象身体的部分或问题中的程序并向她显示,这种侮辱他也自己正在想象着。渴望看见性暴露出的东西是猥亵言语的原始的动机。这一点是不能被怀疑的。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基本性的事实。渴望看见男女特有的性器官的暴露正是我们里比多(libido)的原始成分之一。其自身可能较早被其他东西所取代,并且又恢复到在设想中去触摸性器官的那个原始欲望。就如经常发生的一样,想见的欲望取代了触摸的欲望。^②里比多在每个人身上体现的看和触摸的欲望以两种形式存在,主动的和被动的,男性的和女性的。并且根据性欲特征所占的优势,总有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小孩身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自我暴露倾向。这种倾向的种子如果逃脱其通常被埋葬的或压制的命运,它就会发展成为我们熟悉的性变态行为,在男人身上的体现就是裸露癖。在女人身上被动的裸露癖倾向常常被一种性羞怯反应所掩盖,但从衣服中也

① 参见我的《性欲三论》(1905d),此书和这本书同时出版。

② 参见《肉体接触本能》(莫尔,1898)。弗洛伊德在《性欲三论》中(1905d,标准版,7,169)对此作了解释。

并不是没有遗留下漏洞。至于灵活多变的习俗和环境允许女人保留着那一点裸露癖这一问题,我则只需要些暗示。

男人身上的裸露倾向在很高的程度上是作为其里比多一部分而存在着,而且其服务于引起性行为。当这种冲动使其自身在第一次接触女人时被感觉到,他就必须利用词语。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向她表白他自己;第二,因为如果观念被话语所激起,这种观念会促使女性在她自身中产生相对应的性兴奋,且这种观念使在她身上的被动暴露倾向被唤醒。这种求爱的语言还不是猥亵的,但它可发展成猥亵言语。如果女人的情愿很快表现出来,淫秽言语的寿命就会很短暂。因为他很快就产生性行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的迅速的情愿不能被指望,且如果是被防御行为出现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引起性兴奋的语言就变成其自身的目的,以猥亵言语的形式出现。由于性攻击受到阻拦而不能付诸行动,它暂停在兴奋的唤起阶段,并从女人身上表现出的征兆中获得快感。在这样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无疑改变其特征,就像任何里比多冲动意志遇到阻碍一样。它明显地带有敌意和残酷,因此竭尽全力用性本能的那些施虐狂成分来帮助反对这种障碍。

因此,女人的不顺从就构成了猥亵言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虽然,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不顺从好像仅仅意味着稍许延迟,却并不表明进一步的努力将会是徒劳无益。这种抵抗的理想环境就是如有另一个男人同时在其中——第三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表现立即的服从。在猥亵言语的发展中这第三者立即占有最重要的位置。然而,女人的开始出现就是不可被忽视的。在乡下人中或在简陋的小旅店里,我们常常会注意到,只要女招待或老板娘一出现,就有猥亵言语源源不断地出来。只有在社

会较高的阶层,情况是恰好相反的,女人的出现使猥亵言语立即结束。男人们保留这种娱乐,即假定使感到羞涩的女人出现,直到他们能“单独相处”为止。所以,旁观者,亦即现在的听者就渐渐地取代了作为猥亵对象的女人的位置。而且由于这种转换,其就已经接近了假定的诙谐的特征。

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就可以集中到两个因素上:第三者即听者所起的作用和猥亵言语自身主题的限制条件。

一般说来,倾向性诙谐要求三个人:除了诙谐的制造者外,还必须要有作为敌意或性攻击对象的第二者及在其身上得以完成诙谐产生快乐目的的第三者。我们将在后面研究这种状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定位在这样的事实——即因某一诙谐而发笑并能欣赏其快乐效果的不是该诙谐的制造者,而是无所作为的听者。在这个猥亵情况中,这三个人处在相同的关系中。事件的发展过程可以这样被描述,当第一个人发现其里比多冲动被女人抑制时,他便对第二个人产生了一种敌意倾向,并且把最初介入的第三者作为同盟。通过第一个人的淫言秽语,该妇人被暴露在第三者面前。而第三者,作为听者,由于自己的里比多毫不费力地就得到了满足而被第一个人所收买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普通人中这种猥亵交流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并能确定无疑地使他们产生快乐的情绪。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包括如此之多的倾向性诙谐的特点之复杂的程序中,没有任何概括诙谐特征的正式要求由猥亵本身构成。毫无掩饰的淫词秽语的说出给第一个人带来乐趣,使第三者开怀大笑。

只有当我们上升到一个由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时,诙谐的形式化条件才会起作用。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猥亵言

语变成了诙谐,并且只有其具备诙谐的特征时,才能够被社会所容忍。其最常使用的技巧性方法是隐喻——即通过某个很小的东西,几乎没有联系的东西来替换,而这就能使听者在想象中重新构建一幅完全而且直观的淫秽图景。淫词秽语直接提供的东西和其在听者头脑中必然引起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越大,这个诙谐就越精炼,而且它为上层社会所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如能被从例子中很容易显示出来一样,猥亵言语也具有诙谐的特点——任其自己处置——除了使用粗俗亦或优雅的隐喻外,还有其他所有的使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的方法。

在此,我们终于能理解诙谐在服务其目的时所能取得的成就了。在其使一种本能(无论是淫秽的或是敌意的)得以满足的道路上,要面对障碍,其仍能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它们绕过这种障碍,并通过此种方法从障碍所未能接触到的源泉中引出乐趣。这种阻碍在道路上的障碍不是别的什么,就是女人所得到的那种更高级的教育及良好的社会地位,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相应地使她无法容忍毫无掩饰的性。在一开始就在想象中出现的女人后来仍被认为就在现场,或者说她对男人所起的威胁作用甚至在她不在场时依然存在其影响。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上层社会的男人是怎样受到一群社会下层的姑娘们的影响,诱使其把他们的猥亵诙谐还原为一种简单水准上的淫词秽语的。

这种使女人、同样在较少程度上也使男人使其很困难或不可能从赤裸裸的淫秽那里得到乐趣的力量,被我们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我们在严重的病历中,也发现了与这种压抑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严重的病历中,这一心理过程使所有的冲动情结(complexes of impulses)及其衍生物远离意识,其已被证明是我们

所常说的精神神经症的原因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文明和更好的教育对压抑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假想,在此种情况下,心理组织也遭受着某种改变(其甚至也可作为遗传性情而出现)。作为其结果,我们以前曾觉得令人愉快的东西,现在好像变得无法忍受,且被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所拒绝。文明的压抑活动使许多原始乐趣的可能性出现,然而,现在这种乐趣被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检查官所摒弃,并且永远失去了。但对于人的精神来说,要摒弃所有这些乐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发现倾向性诙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废除摒弃行为、并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乐趣的手段。当我们因一精炼的淫秽诙谐而发笑时,我们所笑的东西和使一个粗俗诙谐所产生乐趣的东西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乐趣从同一源泉所涌出。然而,我们永远不能使自己在这种粗俗的淫词秽语面前产生大笑。我们会感到羞愧或其好像使我们感到厌恶。我们只有借助于诙谐的帮助,才能笑起来。

因此,我们在先前表示怀疑的东西好像被证实:即倾向性诙谐除去那些向单纯性诙谐所敞开的快乐源泉外,还有其他的快乐源泉。在这种源泉中,所有的快乐以某一种方式与其技巧相连接。我们也可以再一次重申,对于倾向性诙谐,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感觉来区分哪部分快乐来自其技巧的源泉,哪部分快乐来自其目的。因此,严格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对什么发笑。^① 对于所有淫秽诙谐,我们服从于关于诙谐的“善”的判断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形式的决定因素,这种诙谐的技巧常常是很残忍的,但它们在激起发笑者的作用中却有巨大的成功。

^① 在1925年以前的所有版本里,此句是以斜体字印刷的

(三)

现在,我们将研究是否诙谐在服务于敌意目的时也起到相同的作用这一问题。

在这里,从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起,同样,人类的文明童年也具有相似性,对自己同类的敌意冲动就如我们的情欲一样屈服于同样的限制和同样与日俱增的压抑。然而,我们尚未走到爱我们的敌人这么远或者说是到右脸挨打把左脸也伸过去的程度。另外,所有限制主动仇恨的道德规范至今都被清楚地证明了——它们最初是为一个小氏族社会而制定的。只要我们能完全感觉到自己是某个族类的成员,我们就会允许我们自己忽略大部分限制,这种限制是存在于与外族的关系中的。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在控制敌意冲动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就如利希腾伯格把其置于下面的戏剧性的话一样:“在我们现在说‘对不起’的地方,我们过去常常都要给对方一耳光。”被法律所禁止的野蛮的敌意行为已被口头谩骂所取代。对人类种种冲动之间的相互连结的更好了解——通过始终如一的坚持“理解一切,原谅一切”,越来越剥夺了对妨碍我们行为的同伴感到愤慨的能力。虽然在儿童时代,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性情,但后来我们被高度的个人文明所告知,使用谩骂的语言是不值得做的事。甚至在格斗仍然被允许的场合里,那些可以用作格斗的种种手段亦明显受到了限制。因为我们被迫用行为来表达敌意——受到其利益旨在面对保护人安全的冷漠的第三者的阻碍——恰如性攻击案例中的情况一样,我们发展了一个新的谩骂技巧,即目的在于把这个第三者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技

巧。通过对敌人的贬低、鄙视,使低劣或使之喜剧化,我们通过转弯抹角的方法从对敌人的征服中获得乐趣,对于那个第三者,即那个毫不费力就获得了极大的乐趣的人,其笑声成为我们乐趣的见证。

现在,我们将准备观察现实化诙谐在敌意攻击性中所起的作用。诙谐允许我们使用那些在我们敌人中的阻碍我们公开或有意识地说出来的滑稽可笑的东西。那么,再言之,诙谐就会逃避种种限制并敞开那变得不可触及的快乐的源泉。它将以其所产生的快乐进一步的贿赂听者,使其不需更进一步的观察而站在我们这边说话。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我们自己被单纯性诙谐所迷惑而过高估计那句以诙谐形式表达出来的话的意义。这一点在下面这种普通的句子中被提到了完美的高度:“使笑者转变到我们这边来。”(die Lacher auf seine Seite ziehen)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N先生诙谐的例子,这些例子分散在前一章里。它们全部都是谩骂的话语。好像是N先生想要大声地宣布:“农业大臣本人就是头公牛!”“别跟我谈起×××!他太自负!”“我所读过的文章没有比这位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拿破仑在奥地利更令人厌烦的了!”但他所占有的很高的社会地位使其不可能以那种形式来说出这些判断。因此,他便利用诙谐的帮助,这就保证它们被听者所接受,它们不会被听者以非诙谐的形式所发现,尽管其中可能包含着真理。这些诙谐有一个特别富有建设意义——那个关于“红头发傻小子”(red Fadian)的诙谐,可能是它们全部中的最能给人留下印象的一个。但是什么使我们发笑并把我们的兴趣从这样做是否对这位可怜的作者太不公平这个问题上完全转移开?是诙谐形式,当然就是说,是诙谐。但诙谐又何以使我发

笑呢？无疑是笑那个人自己，他被作为“红头发傻小子”介绍给我们，特别是笑其有一头红头发。受过教育的人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习惯，况且他们也并不把长着一头红头发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是毫无疑问，他被学校里的男生及普通人很看重，甚至在受过一定教育水准的市政和议会代表中也是真实的。N先生用最富有天才的方式使其成为可能，使成年人和敏感的人能像学校男生一样取笑历史学家X的红头发。这肯定不是N先生的意图。但最令人怀疑的是，是否自由制作诙谐的人必然地要知道他的精确的意图。

如果在这些事例中诙谐帮助那个攻击性避开的障碍是一种内部障碍——一种对谩骂的反对——在其他地方，障碍就可能是纯粹的外部障碍。下述的事例的情形就是如此，殿下问那个酷似自己的陌生人：“你母亲曾在王宫里干过活吗？”他得到了令人极其震惊的回答：“没有，但我父亲曾在那里干过。”这样回答，被问者肯定会击败这个胆敢卑鄙地暗示他母亲轻浮的发问者。但这个无礼的人是殿下，他不仅不会被击败，甚至也不会遭到侮辱，除非某个人想豁出命来进行报复。因此，这个侮辱好像要被默默地吞下去。但幸运的是诙谐给其显示报复这种侮辱而又安全的方法——即通过利用统一化的技巧来使用隐喻，使攻击转回攻击者自身。此例中的诙谐印象完全是由其目的决定的。在反驳的诙谐特征方面，我倾向于忘记攻击者所问的问题本身就具有了那种使用隐喻技巧的诙谐的特征。

通过外部环境来阻止谩骂或侮辱性的反驳这种事例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倾向性诙谐被用来攻击或批评那些自称为权威的显贵们。因而诙谐就代表了对权威的反叛，一种来自压力的解放。漫

画的魅力就在于这相同的因素：我们对它而笑，即使它们被不成功地简单化了，因为我们认为对权威的反叛是一种美德。

如果我们在头脑中记住这样的事实，即倾向性诙谐是非常适合攻击那些被内部抑制和外部环境所保护而不受直接诋毁的有尊严、有势力的人人物，我们被迫地采取一种特别的观点，即某些确定的诙谐好像总被联系到社会下层、无权无势的人身上。我现在指的就是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其中有几个例子我们在概念诙谐中已经谈过了。在其中的一例，例如在“他还很聋呢？”和“谁会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的例子中，介绍人被当做头脑简单和粗心大意的人备受嘲笑，他变成了喜剧人物，因为事情的真相从他那里像自动地逃离出来一样。但是，一方面我们确已经知道倾向性诙谐的性质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从此故事中所得到的快乐是否适合这些诙谐所针对的那些人的无价值的境况呢？他们值得作为诙谐的对手吗？为了抨击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诙谐就把婚姻介绍人摆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是说这件事而意味着另一件事吗？要想拒绝这种观点确实是不可能的。

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趣闻的解释可以继续下去。但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再进入研究它们之中。只要把这些轶事趣闻当作有趣的故事(Schwänke)看待，且拒绝其具有诙谐的特性，我就心满意足了。因此，诙谐也有这种主观的决定因素。我们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这一种可能性，我们将在下文(第二章第七节)研究它。这就等于宣称只有我们允许其作为诙谐的东西才是诙谐。诙谐对于我所产生的对于他人可能仅仅是个喜剧性的故事。但是，如果一个诙谐接受这种怀疑，理由只可能是它有一个虚伪的外表(fa-

cade)——在这些例子中,其是喜剧性的外表——在对其沉思中,某人会感到满足,而另外的人会投之以一瞥。另外怀疑会从这个虚伪的外表试图使研究的目光晕眩中而产生,因此,这个故事里有某些东西被隐藏。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闻趣事是诙谐,那么它们肯定是比较好的诙谐,因为虚伪的外表处在不仅隐藏了必须说出的话,而且还隐藏了禁止说出的某些东西的位置上。进一步的解释——这种揭开其隐藏意义和揭露这些带有喜剧外表而作为倾向性诙谐的轶闻趣事——将是如下情形。任何一个允许真实情况在疏忽的时候而被说出的人,实际上都愿意从伪装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正确和深刻的心理学观察。没有这种内部的同意,任何人都不会让自己被这种自动现象所掌握。这种自动现象在这些案例中是使真实情况明朗的现象。^① 这种伤害的可笑的形式转换成一个同情的形式,值得怜悯的形式。那个婚姻介绍人必定是非常的高兴,他终于在最后能扔掉其伪装,因为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就把事实的最后一点真相大声说了出来。一旦他知道大势已去,即这位未来的新娘不会令这位年轻人满意,他就马上把逃过年轻人注意的隐藏着的缺点给揭露出来,或者,他就利用为表述其为别人服务的信念而在细节上进一步争论的机会:“我问你——谁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在这个故事中的全部荒唐性现在转移到姑娘的父母身上,赤裸裸地触摸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为了给女儿找个丈夫,这种欺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同时它还暗示着那些靠这种手段结

^① 它的机制与控制“口误”和其他自我暴露现象完全一样,参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五章。

婚的姑娘们的不幸处境,也影射着以此方式订婚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这个婚姻介绍人正是适合来表述这一批评的人,因为他知道关于这种谩骂的最多情况。但他没有必要大声说出这些,因为他是一个依赖那些人生活的穷人。在创造这些及其他相似故事的流行思想也被这种矛盾冲突所撕扯着,因为他们知道,神圣的婚姻在他们以某种方式撮合之后,被发生在他们安排的那个时刻的思想所严重地影响着。

让我们也回顾一下,在我们研究诙谐的技巧时所注意的东西:在诙谐中,胡说经常取代了存在于诙谐后面的思想中的嘲弄和批评。[在这一方面,碰巧,诙谐的进行(joke-work)是和梦之进行(dream-work)做同样的事]。在此,我们发现的事实再次证实了这个观点。那个嘲弄和批评并不直接反对婚姻介绍人的形象,他只是在我们的例子中作为替罪羊而被援引才出现的,在另一类诙谐中,相反,其代表着能应付任何困难富有辩论能力的人。它们是用逻辑性代替喜剧性虚伪外表的轶事趣闻——诡辩的概念诙谐。在其中的一个例子,婚姻介绍人成功地辩护了新娘的跛足之缺点。它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不幸”(fait accompli)。其他正常的生命,有着一对直腿的生命,相反,则将永远处在可能摔断的危险之中,这将伴随疾病、痛苦和高昂的医疗费用,所有这些麻烦,将在娶了这个已经跛足的女人之后得以避免。在另一个轶事趣闻之中,婚姻介绍人成功地反驳了求婚者对新娘的全部抱怨,只有在谈到新娘的最后一个缺点时,这个令其无法辩驳的缺点,他才辩解道:“你还想要什么?难道她不能有一个缺点吗?”似乎求婚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异议没有必然地留下什么痕迹。可以毫无困难地显示在这两个例子中的辩护的弱点。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技巧时就是这么

做的。但现在使我们感兴趣的都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事情。如果婚姻介绍人的话被给予如此显著的逻辑外表,此外表在进一步仔细研究中被认作只是一个外表,隐藏在其后是诙谐宣称此婚姻介绍人将是正确这一真实情况。此思想并不冒险去这么做,只是用诙谐表现的外表来取代这种严重性。但在此,就如经常发生的一样,俏皮话泄露的是某些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这些带有逻辑外表的轶事趣闻真正意味着它们有理由拥护的东西——有目的地使之错误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会出错。只是在为了掩盖给予其诙谐特征的真理的表征时才利用诡辩的方法。因为在此两个轶事趣闻中所暗示的东西是,当求婚者如此小心翼翼地收集新娘的不同优点,他真实地使自己被嘲弄,虽然所有这些弱点,当他如此做的时候,他忘记了他必须准备接受带有人类不可避免的缺点的人作为其新娘。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个使其或多或少具有不完满人性缺点的女人婚姻的容忍的特征——相互吸引和准备接受所有的后果——是在整个解释中根本没有提及的。

这个在此事例中直接指向求婚者的嘲弄,婚姻介绍人在其中扮演高人一等的角色,在另一个轶事中被更明白地表述。故事越平铺直叙,它们越包含更少的技巧。它们,如其所是的那样,只是诙谐的边缘事例,它们除只有构建一个虚伪的外表技巧外,再没有其他共同之处了。但归因于它们有相同的目的和在虚伪外表后面的被掩盖,它们产生了诙谐的全部效果。另外,其技巧方法的贫乏解释了其中许多诙谐不能没有损坏地依赖于产生和诙谐技巧相似效果的行话(dialect)的成分。

下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拥有倾向性诙谐的全部力量,没有展示其技巧的任何东西。“婚姻介绍人问道:“你对你的新娘有

何要求’——回答道：‘她必须是美丽的，她必须富有和受过教育’——‘很好’，婚姻介绍人说道，‘但我指望那些是作为促成婚姻的三个东西。’”在这里，斥责直接指向求婚者，而不是经诙谐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迄今为止我们考虑过的例子中，伪装的攻击被直接指向这些人——在婚姻介绍人的诙谐中指向每一个包括在安排这个婚姻中的人：新娘和新郎及他们的父母。但攻击对象同样可能是机构组织及作为机构的一部分行使权力的人，道德或宗教的信条，人生观，这些人生观如此受敬重，以至于仅在诙谐的面具下和被其虚伪的外表所掩盖的行为中才能被反对。虽然这些倾向性诙谐作为目标的主题可能很少，但其形式和外表却是多种多样。我认为，我们将会很好地通过取一个特殊的名字来区分这种倾向性诙谐。只有在我们解释几个这类例子之后才能给其取个合适的名字。

我们可以回忆那两个故事——“吃蛋黄酱鲑鱼”而又一文不名的美食家和那个嗜酒狂私人教师——这些我们已经知道是诡辩的移置式诙谐(sophistical displacement jokes)，我现在将继续对其解析。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这个故事的虚伪外表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想将会被严肃地说成“这个男人是对的”，但归因于那个相反的矛盾，这种思想却不敢冒险宣布这个男人是正确的，但除了在那个极容易显示他是错误的单一点上。这个被选择的“点”(point)是在其正确与错误之间一种妥协。的确，这不是一个决断。但它对应于我们身上的矛盾冲突。这两个轶闻趣事都是关于享乐的。他们说：“是的，这个人是对的，人生在世，没有比享乐更好的事了，一个人怎样获得它，或多或少是有些不同的。”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令人惊讶的不道德观点。无疑也不是更好的。但从本质

上讲,这与主张生活无常和赤裸裸地摒弃道德的诗人们的“及时行乐”并无多大区别。如果在“蛋黄酱鲑鱼”中的那个男人的观念正好令我们反感,这只是因为此真实的情况是通过低级的享乐这种方式被显明的,没有此种享受,我们好像也能很轻松地继续下去。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既承认这种生活哲学的正确性,又斥责我们的道德规范只知道怎样去下命令却不给我们任何补偿。因为我们已经停止相信来世的许诺——在来世,每一克制忍耐都会以满意作为回报——巧合的是,如果我们把克制作为信仰的信条,那么只有很少的虔诚的人——“及时行乐”就成了一个很严肃的劝诫。我会很愿意地推迟满意地回报:但我知道是否明天我还在这里吗?(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①

我将很高兴地弃绝所有这些被社会所排斥的满足的方法,但我能肯定社会还会通过给我提供一个允许的方法来作为克制的回报吗——即使在延长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诙谐在私下窃窃私语所说的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人类的愿望和渴望真正与严厉无情的道德一样使其自身得到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已被强有力且具能鼓舞人心的措词所说出。这种道德只是极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而不是推迟满足自己愿望的有钱有势的人制定的一项自私的规章制度。只要治疗的艺术还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安全保障,只要社会的安排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富有乐趣,我们内心反抗道德要求的呼声就永远不可能被镇压下去。每一个诚实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对这个矛盾冲突做出的

① “这里没有关于明天的确定性。”——洛伦佐·德·梅迪西(Lorenzo de' Medici)。

决定只能在走过迂回曲折的进一步的洞察道路之后才能被达到。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与他人建立一种更亲密的内在的同一关系,这样生命的短暂才能被克服。一个人不能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应当使需求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如此众多的未满足的需求的继续存在,才能发展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但并非每个人的要求都能够以这种方式被推延和转移到其他的人身上,所以,没有一种解决这种冲突的普遍和最后的解决方法。

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名字被给予像我们刚才解析过的一样的诙谐了。它们是愤世嫉俗的诙谐(cynical joke),而且它们所掩饰的也是愤世嫉俗。

在愤世嫉俗的诙谐惯常攻击的种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重要,或者说是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受到道德规范更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也正是婚姻制度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同样,绝大多数愤世嫉俗的诙谐都是针对它的。再也没有比性自由更多的个人要求更强的要求了。但文明对任何方面施加的抑制都没有比对性所施加的抑制更严厉了。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种种目的——我们在上文(见第82页)曾经提到,卡尼沃尔王子集锦簿里的一个条目: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早晚会乘出租车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例子的复杂技巧了,它是一个令人困惑且明显不可能的明喻,然而,就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其本身并不是一个诙谐,进一步说,它是一个隐喻(出租车是公共交通工具)。就如其最强有力的技巧方法一样,省略增加了其晦涩难懂的不可理解性。此明喻可以像以下这样理解。一个人结婚就是使其自己不

受性的诱惑,但其被证明是结婚并不能使在某种程度上比通常更强的需求得到满意。以同样的方法,一个人带着一把伞来使自己免遭雨淋,但却在雨中被弄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四处寻求更强有力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中,他必须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中,为钱而卖身的女人就是可用的。至此,这个诙谐几乎全部被愤世嫉俗所取代了。人们不愿冒险大声、公开地宣称婚姻非为满足男人的性欲而有目的地安排的,除非他可能是一个被真理的爱和渴望埃伦费尔^①的改革所驱赶才这样做的人。这种诙谐的力量在于这样的事实——尽管它采取迂迴曲折的方法——但它还是把这种思想表述出来了。

当有倾向的反抗性批评是直接反对主体自身,或者更谨慎地说,主体也是其中的一个人——一个集体的人——这就是说(例如,主体是自己的民族)时,就会出现特别有利于倾向性的机会。作为决定因素出现的自我批评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贴切的诙谐(我们在其中已选择了许多例子给出了),都生长在犹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土壤上。它们是犹太人创造的故事,而且针对的是犹太人自己的特点。由非犹太人创造的关于犹太人的诙谐大部分是残忍的喜剧,在其中,由于外国人把犹太人看做是喜剧性的对象,从而使诙谐变成了不必要的东西。由犹太人自己创造的有关他们自己的诙谐也承认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的真正的缺点就像知道在他们和他们好的品质之间的连接一样,也知道主体在个人之中的东西,也发现带有诙谐进行创造主观性决定因素的错误(通常是很

^① 参见他的文章(1903)、弗洛伊德后来的一部著作正是他关于《“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文章的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本人开始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难达到的)。顺便提一下,我确实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其他的民族拿本民族的特点取笑到如此程度的例子。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选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轶事趣闻为例。在此例中,那位火车上的犹太人一发现走进他包厢里的人是自己同样的信仰者,就马上摒弃了所有得体的行为举止。我们已知道此诙谐是通过细节来作为某些证明东西的证据的,通过某些非常小的细节来表征的。这就意味着描绘出犹太思想的民主模式,即不承认主仆之分,但同时也扰乱了秩序和合作。

另一组特别有趣的诙谐描述的是贫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主角是乞丐(Schnorrer)和仁爱的户主或男爵。

“一个乞丐,他被允许作为客人每周日在同一房间就餐。一天,他领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走进屋子,他示意年轻人坐在桌子旁边。房主问道:‘他是谁?’‘他已经是我女婿了’,回答道,‘从上周起。我许诺供给他第一年的伙食。’”

这些故事的目的总是相同的,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乞丐乞求男爵给一些去伊斯坦德旅行的钱,他的医生建议他用海水浴来治疗他的疾病。男爵想到伊斯坦德是一个花费特别昂贵的疗养地,一个更为便宜的疗养地也同样能做得很好。然而,乞丐以下面的话来拒绝这个建议:‘男爵先生,我认为对于我的健康而言,没有太费钱的东西’。”这是一个极好的移置作用的诙谐,此诙谐我们将作为这类中的一个样式。^① 男爵显然是为节省自己的

^① 事实上,该诙谐已作为一个移置式诙谐出现过参见第56页。弗洛伊德或许是把它作为一个事后的想法补充到前一章里的,可后来却忘了在本文中作必要的改动。

钱,但乞丐的回答好像男爵的钱是他的,因而他认为,与自己的健康的价值相比,钱是次要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嘲笑这个无私的要求。但很少有诙谐没有装备虚假的外表来误导我们的理解的。隐藏在背后的事实真相是,依照犹太人的神圣法律,这个想把男爵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的乞丐,实际上完全会犯这样的错误。由这个诙谐引起的愤慨理所当然地指向了那个连虔诚的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法律。

这里有另一则轶事:

“在一个有钱人家的楼梯间,一个正在上楼的乞丐遇到了一个同行,同行建议他不要再往上走了。‘今天别上去了,’他说,‘男爵今天情绪不好,他给每个人至多是一弗罗林。’——‘那我也上去,’第一个乞丐说。‘我为什么给他一个弗罗林?他给我什么东西了?’”

这个诙谐使用了荒谬技巧,因为它让这位乞丐确信,男爵并不会应他之乞求而给他任何礼物。但,这个荒谬只是表面的。此富人没有给他任何东西这一点也是真的,因为富人依据法律有义务救济他,严格的说,是富人应该感激他给其提供了一个行善的机会。一般地说来,中产阶级的慈爱的观点在这里是和宗教慈爱的观点相冲突的。在下面故事中则公开反对宗教观点。男爵深深地被一乞丐的悲惨遭遇所打动,男爵按铃叫仆人:“把他给我撵走,他使我心都碎了。”其目的的公开揭示再次构成一个诙谐的边缘性的例子。只有把问题放在单个事例中来考虑,最后的这些故事才不同于已不再是诙谐的抱怨:“如果是犹太人,你成为一个有钱的犹太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其他人的不幸使你享受自己的幸福成为不可能的事。”

其他的故事,即再次属于诙谐的技术性边缘性的例子,给予了极为深刻的悲剧性的愤世嫉俗的证明。例如:

“一个男人很困难地听医生说 he 可能是喝太多的白兰地而导致了耳聋。医生建议他戒掉白兰地,这个病人答应把医生的告诫记在心中。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在街上遇见这位病人,并大声地问他现在怎么样,‘谢谢你,’他回答道,‘医生你不必那么大声地喊着和我说话了,我已经戒酒了,并能再次听得很清楚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再次相遇了。医生以平常的语调来问他现在怎么样了,但发现其问题未被对方理会。‘嗯?你说什么?’——‘好像你又开始喝白兰地了,’医生对其耳朵大声地说,‘那是你为什么再次聋的原因?’‘可能你是对的,’聋子回答道,‘我又开始喝白兰地了,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只要我不喝酒,我就能听清楚,但我听到的任何事没有一件和白兰地一样好。’”从技术上讲,该诙谐只是一种客观教训(object-lesson):方言和技巧在叙述过程中是引起发笑必不可少的,但在其背景中,都存在着一个悲哀的问题:难道这个人做这种选择是不对的吗?

由于关于犹太人多种多样的和毫无希望的苦难的悲剧性故事所制作的隐喻的原因,我必须以倾向性诙谐来把它们归类。

其他诙谐,在此相同的意义上,也是愤世嫉俗的,也是不仅关于犹太人的轶事趣闻,是攻击宗教信条,甚至攻击信仰上帝的。那个关于“拉比心灵感应”的故事,其技巧存在于把幻想与现实相提并论的错误思维(另外可能的观点是认为它是移置作用),是一个这类的愤世嫉俗或批评性的诙谐,其直接指向奇迹的制造者,当然,也同样指向对奇迹的信仰。据说,海涅在弥留之际讲了一个亵渎神灵的诙谐。当一个友好的牧师使其想起上帝的怜悯和给其上

帝将要宽恕他的罪的希望时，海涅据说是如此回答的：“Bien sûr qu’il me pardonnera: c’est son métier!”(当然他会宽恕我：那是他的工作)这是一个诽谤性的比较(从技术上讲，可能只有隐喻的价值)，因为“métier”，一种贸易或职业，是工人或医生所从事的——且他只有这惟一的“métier”(职业或工作)。但此诙谐的力量在于其目的。它所意味的是：“当然他会宽恕我，都是他在那里等待的，那也是我雇用他的惟一原因(好像请医生或律师一样)”。所以，在这位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的将死的人身上，意识激励起他想，他已经创造了上帝，并赋予上帝力量，以至于当时机一到，就可利用他。被假定的是作为被造物在其作为创造者湮灭之前才能揭示自己。

(四)

除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研究过的三种倾向性诙谐——

裸露的或淫秽的诙谐，

攻击的(敌意的)诙谐，

愤世嫉俗的(批评的、亵渎神灵的)诙谐——

我愿意再加上另一种，第四种也是最不常见(稀少)的一种，其性质可能通过一个好例子来显明：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的火车站上的一列火车车厢内相遇了。‘你去哪里?’其中一个问道。‘去克拉科夫，’另一个回答。‘你真会撒谎!’第一个人叫道，‘如果你说你将要去克拉科夫，你是想要我相信你要去伦伯格。但是，我知道实际上你是要去克拉科夫。那么你为什么对我撒谎?’”

这个精彩的故事，给人的过度复杂的印象明显地是通过荒谬技巧来起作用。第二个犹太人因其撒谎而受到责备，因为他说他

要去克拉科夫,实际上那是他的目的地!但这强有力的荒谬技术方法在这里是和另一技术——相反表征连结在一起的,因为,根据第一个犹太人无矛盾冲突的声明,第二个犹太人讲实话时就是撒谎,通过撒谎的方法来说实话。但这个诙谐更重要的要义是什么决定事实真相的问题。这个诙谐再次指向一个问题且利用我们最普通的概念之一的不确定性。假如我们只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而不考虑我们的听者怎样理解我们所说的,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或这只是虚伪的真相?难道真实的事实真相不就在于把听者考虑进来并给其一个我们自己知识诚实的图画吗?我认为这种诙谐足以不同于其他那些被给予特殊地位的诙谐。他们所攻击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机构,面是我们自己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即,我们玄思的财富之一。因此,给其取个合适的名字将是“怀疑性”(sceptical)诙谐。

(五)

在我们讨论各种诙谐的目的的过程中,我们或许阐明了一些问题,我们肯定也遇到许多进一步探寻的假设。但本章的发现和联合前一章的发现给我们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诙谐所提供的快乐一方面依赖它们的技术,另一方面依赖它们的目的。那么,从什么样的共同点才能把诙谐中这样两种不同的快乐的源泉放在一起呢?

第二章 综合部分

第一节 快乐的机制和诙谐的心理起因

(一)

我们现在可以从诙谐给予我们的特别快乐的源泉的确定知识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被欺骗,使我们从所说的思想内容获得的乐趣与诙谐的真正的快乐混淆起来。但我们知道快乐本身在其基础上有两个源泉——技巧和诙谐的目的。我们现在想发现的是快乐从其源泉产生出来的方法,快乐效果的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应当从倾向性诙谐比单纯性诙谐更容易地找到我们想寻找的解释。因此,我们将从倾向性诙谐开始。

在倾向性诙谐案例中的快乐是从其是被满足的目的,否则其满足将不会实现的目的产生出来的。像这样的满足是快乐的一个根源,这一点无需进一步说明。但诙谐在其中导致这种满足的方式是和特殊的条件连结在一起的。从其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我们区分两种情况。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是目的的满足是被诙谐所避开的外在障碍所阻止的情况。例如,我们已经发现这种情况,在陛下得到的回答中——陛下对问他是否他母亲在皇宫里干过活的男人的回答,以及评论家对两个有钱的无

赖让其看他们的肖像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儿?”在前一种例子里,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回答另一个侮辱,在后一个例子中,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代替一个所想要的回答。阻碍目的是纯粹的外部因素——侮辱所针对的人的强有力的地位。然而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许多这样的和相似的倾向性诙谐可以使我們感到满足,但它们不能刺激我们产生更多的笑。

但是,当阻碍在直接目的的实现路上不是一个外在因素,而是一个内在障碍,当一个内在冲动来反抗这种目的时,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假想,好像在N先生的诙谐中被实现,在他身上的强烈的谩骂倾向被高度发达的审美文化所控制。通过诙谐的帮助,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内部阻力被克服了,抑制被解除了。通过那种方法,就像在外部障碍的例子中一样,目的的满足变成可能,及目的伴有“心理积郁”(psychical damming-up)^①的抑制被避免了。在那种程度上,快乐产生的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中将会是相同的。

在此,我们倾向于更进一步、更深入地了解在内部障碍和外部障碍的情况之中的心理情境之间的区分,因为我们怀疑,内部障碍的移走会对快乐产生更大的贡献。但我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实行中庸,并满足于建立保留对我们是本质的东西这一点。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之间的不同只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内部障碍中,已经存在的抑制被解除了,在外部障碍中,新的抑制的产生被避免了。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会太多地依赖于玄思,如果我们确信在形成和维持一个心理抑制的两个过程中需要某种

^① 引自李普斯(1898)。见下文第165页。

“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①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倾向性诙谐在两种情况下都能得到快乐,因此,似乎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快乐的结果对应于被节省的心理消耗。

那么,在此我们再次遇到在讨论言语诙谐技巧时所第一次遇到的经济性原则。但是在前面的例子里,我们好像发现经济性原则是利用尽可能少的词或尽可能相似的词,我们现在存在一个怀疑,即在普遍的更为容易理解意义的心理消耗之中的经济性原则的怀疑。我们必须认为进一步理解是什么使这个模糊的心理消耗概念可以带我们更接近诙谐的本性是可能的。

在我们研究在倾向性诙谐之中存在的快乐机制之中,有我们不能克服的一定的清晰性缺乏,这可以被作为我们试图弄清一个简单的问题之前而弄清更为复杂的问题的一个合适的惩罚,此简单的问题是单纯性诙谐,而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倾向性诙谐。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抑制或压抑的节省(economy in expenditure on inhibition or suppression)作为倾向性诙谐快乐效果的秘密出现,且对于单纯性诙谐快乐的机制就逝去了。

在合适的单纯性诙谐的样品的基础之上,在其中不会存在我们的判断被其目的或内容所干扰的恐惧,我们被引向决断诙谐的技巧是其自身快乐的源泉。现在,我们试图发现把那种快乐追溯回“心理消耗”的经济性原则这一行动是否可能。在这样一组诙谐(文字游戏)中,技巧存在于使我们的心理态度注意到词语的声音,而不是其意义上——使(听觉的)词语表现(word-presentation)本身来占有其作为其通过事物表现(thing-presentations)本身与其

^① 例如,心理能量的消耗。

关系而被给予的显著位置。^①

我们确实可以怀疑,这样做给我们心理过程中带来很大的减轻并当我们严格地使用词语时,我们被迫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这个方便的程序。我们能观察到思想活动的病理状态,在其中突出心理消耗在一个特殊处的可能性可能是被限制的,实际上,给予这种词语的语音表现的突出地位要高于其意义表现,且承受者在这种状态中行进在他们的线性表达的言语之中(就如公式一样行进),此种线性表达是词语表现的外部联想替代其内部联想的线性表达。我们也注意到,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儿童习惯于还把词语当作事物对待,^② 他们倾向于希望这些相同的或相似的语词都在其后面有相同的意义——这就是被成年人嘲笑的许多错误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从通过利用相同或相似语词从一个概念范围转到另一个概念范围——遥远的一个的被转换的诙谐中推导出确定不移的快乐。例如在“自制的肉卷”(Home - Roulard)的诙谐中从厨房转到政治,那么,这种快乐无疑应该归因于心理消耗中的经济性。像这样的从“短路”(short - circuit)中产生出来的诙谐的快乐好像很大,通过相同的语词联系到一起的两个范围的概念越多

① 直至 10 年后,弗洛伊德才在他的《心理学玄学》论文中详尽地论述“对象的意识表现可以分成语词表现和事物表现”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从心理病理学的观点详细阐明两者之间差别的重要(14,201),然而他对此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关于失语症(aphasia)专论的那个时期(1891d)。以那篇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中引用的一句话曾作为对《论潜意识》的附录被刊载过(标准版,14,209)。

② 参见《梦的解析》(1900a)中第六章第一节中的一段文章(标准版,4,303)。在小汉斯案例记录(1909b)里举了一个此现象的例子(此处同上,10,59)。

——它们相距越远,这样,在思想序列中提供的诙谐技巧的方法的经济节省就越大。我们也或许注意到,在这里,诙谐还利用一种被严肃思维所避而不用的连结方法把事物连结起来。^①

在诙谐使用的技巧方法的第二组之中——统一化,语音的相似性,多种运用,熟悉短语的修饰,援引的隐喻——我们可以指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这就是,在诙谐使用的每一种技巧方法中,我们不曾料想某些新的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一些熟悉的东西。这种熟悉的东西的重新发现是令人愉快的,对我们再次把这种快乐认作经济性之中的快乐,和把其与在心理消耗的经济节省相联系起来是不困难的。

熟悉的东西的重新发现好像被普遍的同意、“识别(认同)”(recognition)是令人快乐的。格鲁斯(Groos, 1899)写道:“识别(认同)总是和快乐相连结的,除非其太机械性化了(例如,像穿衣服

① 如果允许预期文章中的解释,我能阐明好像决定是否是被叫做好、坏诙谐的条件。通过有两个词义的词和被轻微修改的一个词的方法,如果我走近路从一个观念范围转向另一个观念范围,如果同时没有两个具有显著意义的观念范围之间的连结,那么,我将得到的是“拙劣”诙谐。其中存在一个拙劣诙谐(像这样的)中的,连结两个分离的观念的是一个词——诙谐的“关键点”部分。上面援引的“自制肉卷”(Home-Roulard)就是这样的诙谐的例子。另一方面,一个“杰出”的诙谐,发生在孩子们期望的东西是正确的时候,且词语之间的相似被作为真正的被另一个所伴随的所显示在它们意义上的重要性。例如,这样的例子是“翻译家——叛徒”(Traduttore-Traditore)。通过外部联想连结起来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观点,也统一在一个明显的预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本质地位的关系之中。这个外部联想仅仅是取代内部连结。它服务于指出了其或使其清晰,“翻译家”不仅听起来很像叛徒,而且他确定是一类叛徒,好像按理说,它该拥有此名字。这里显示出来的差别符合后面比较中将要产生的“俏皮话”(jest)和“诙谐”(joke)之间的差异。不过,如果要把诸如“Home-Roulard”这样的例子排除在关于诙谐性质的讨论之外,就不对了。一旦考虑到从诙谐中所获得的那种特殊快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拙劣”诙谐作为诙谐并不拙劣。也就是说它们并非绝对不适合产生快乐。

……)”。熟悉性的仅有性质总是易于被宁静的舒适感相伴随,这种舒适感是当浮士德(Faust)在一段神秘的经历之后,再次回到研究中时所感觉到的(《浮士德》第一幕第三场)。如果识别(认同)的行为这样使乐趣提高,那么我们就可期望人们为了这种能力的缘故而想方设法发挥这种能力——这即是说,将会在戏剧中试验它。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把识别(认同)中的乐趣作为艺术享受的基础,但不容争辩的是这个原则不能被忽视,即使它不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赋予的如此深远的意义。

格鲁斯继续讨论游戏(games),其特征是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它们通过在识别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方法来同一快乐于识别之中——那就是说,通过创造“心理积郁”,此心理积郁被识别的行动所清除的方法。然而,他试图如此解释,即放弃识别是在其自身中的快乐的假设,因为通过参考这些游戏,他追溯识别的乐趣到力量中的乐趣,一个征服困难的乐趣。我把后一因素作为第二位的,我看不到有理由从更为简单的识别其本身就是快乐的观点分离出来的观点。例如,通过减轻心理消耗——建立在利用心理积郁机制的快乐之上的游戏只是为了提高这种快乐的数量。

人们也普遍承认,韵脚、头韵、重叠句和其他的发生在诗句中的重复相似语音的形式,利用快乐的同一源泉——重新发现某些熟悉的东西。能力感(sense of power)在这些技巧中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表明这些技巧与在诙谐事例中的“多种运用”非常相似。

考虑到在识别和回忆之间的紧密的连结,假设在回忆之中也存在快乐——回忆行动在其自身之中就伴随着相似起源的乐趣的感觉,这并不鲁莽。格鲁斯好像并不反对这种假设,但他又从“能

力感”中推衍出这种假设,他把在几乎所有游戏中的快乐的主要原因都归因于“能力感”(以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种“熟悉的东西的重新发现”是在诙谐中使用另一种技巧资源的基础,这一点我们还没有提到。我指的是“时事性”(topicality)这个因素,其在许多诙谐中是快乐的丰饶的源泉,且它也解释了在诙谐生命史中存在的几个特殊性。有些诙谐完全独立于这种条件,在一部关于诙谐的专著里,我们被迫清除所有这类例子的运用。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这些经久不衰的诙谐相比,其他诙谐使我们可能会笑得更开心,这些其他的诙谐现在被运用是困难的,因为它们将要求长的评述,即使有此帮助,其也不会产生它们原始的效果。后来的诙谐包含着对人们和当时是“时事性”事件的暗示,其已经引起普遍的兴趣,依然保持其生动形象。当这种兴趣已经停止且在问题中被讨论的事物被解决时,这些诙谐也失去了它们部分的乐趣,且是相当一部分乐趣。例如,我那位友好的房主在把端上来的布丁叫做“Home-Roulard”时所做的诙谐好像对于今天的我们不像其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好,当时“Home-Rule”(地方自治)作为我们日常报纸的政治栏目的主要标题。我们试图估价我现在把其归因于以下事实的诙谐的优点。以下事实指一个词使我们带有在思想中的经济性节省过程,从厨房的观念的领域到遥远的政治领域的转换。但是在当时,我的叙述就会截然不同,我就会说这个词把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引领到了与此领域无关的但肯定会引起我们兴趣的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一直都关心政治。另一个诙谐,“这个姑娘使我想起了德赖弗斯,军队不相信她的贞洁”,今天也隐退了,虽然其技术方法一定会无改变地保留着,这个词“贞洁”中的双重含义和对比而引起的困惑不能补偿这样的事

实：在当时以极大兴奋触及到一个事件的暗示今天使我们回忆起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诙谐仍是时事性的：“路易丝王妃到哥达的火葬场，问火葬(Verbrennung)花多少钱。管理员答道：‘通常是 5000 马克，不过我们只收你 3000 马克，因为你已经 durchgebrannt 一次了。’”(字面意思“被烧过”；俚语意思“私奔过”。)这样的诙谐现在听起来很精彩，在很短的时间以后，它在我们的评价中的地位就会下降，接着，再过了一些时间，即便是很好的文字游戏，也将完全丢失其效果，因它如果不增加评论来解释谁是路易丝王妃和她私奔^① 的意义，那么它不可能被重复叙说。

因此，许多流行的诙谐都有一定的寿命，它们的生命过程由一个兴盛和衰退过程而构成，最后完全被遗忘而结束。因此，人们感到的那种从思维过程中获得乐趣的需要将会基于当时的兴趣不断创造出新的诙谐。这种时事性诙谐的生命力不是它们自己本身具有的，它是被借来的，通过暗示的方法从那些其他的兴趣借来的，其终结同样也决定着诙谐的命运。此时事性因素是快乐的源泉，尽管这种快乐是短暂的，但特别丰富，其补足了诙谐自身固有的源泉。我们不能把这种快乐与熟悉的東西的重新发现简单地等同起来，它只关心最熟悉的東西的特殊范畴。其附加的是拥有作为新颖的、最近的和尚未被人遗忘的特征。在梦的构造中，我们也遇到一个特别的对最新情况的偏爱，^② 且我们不能逃避一个怀疑，即关于最新情况的联想受到快乐的某种特殊奖励和回报。

① 必须相对应地解释路易丝王妃就是因为奇特的情况，在 1903 年那个离开其丈夫的萨克森王妃，见她的自传(1911)。

② 参见《梦的解析》标准版，4，179~181；5，562~564。

统一化,毕竟其在思想连结(thought - connections)领域中的重复并不比在题材(subject - matter)领域里的重复——被费克纳给予了作为诙谐中的快乐的源泉的成分多。他写道:“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考虑的领域中的主要部分是被多重化的统一性连接原则所运作(play);然而,其要求从辅助决断那里得的帮助,为了使从这些事例中获得的乐趣和特殊的特征可以跨越心理阈限。”(费克纳,1897)

在所有这些重复相同的连结或在词语中的相同题材或重新发现熟悉的東西的事例或新近的事例,要避免从心理消耗的经济性里获得在它们之中的快乐感觉好像是不可能的——假设这种方法被证明在解释那些细节上富有成效和达到了一个新的一般化。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弄清楚经济性原则怎样产生的和什么是这个“心理消耗”表达的意义。

诙谐技巧的第三组——因为大部分概念诙谐——其包括错误思想、移置、荒诞、相反表征等等,乍一看好像具有特殊的印象,而与熟悉的東西的重新发现的技巧或通过词语联想(word - associations)而对对象联想(object - associations)的取代并无亲缘关系。然而,在这里要运用心理消耗的经济性或减少这理论是特别容易的。

这一点是不能被怀疑的,即背离我们已经开始的思想系列比坚持这一思想系列更容易,更方便,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比把它们进行对比更容易和更方便——而且,确实,特别方便的是承认逻辑所反对的各种有效的推理方法,最后,把词语或思想放在一起而不考虑这种连结也应该具有意义这一条件尤为方便,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能被怀疑的;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诙谐的技巧却更能

说明这一点。通过诙谐进行提供一个快乐的源泉的假设将作为奇怪的假设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除去诙谐外所有这样无效率的智力功能提供给我们只是令人不愉快的防御感(defensive feelings),而没有其他东西。

“胡说的快乐”(Pleasure in nonsense),就像我们简称其一样,被隐藏在严肃生活之中,现在却已经快要消失为一点了。为了说明它,我们必须研究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中,它还是可以看见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再次变成可见的:指在学习中的儿童的行为和成年人在由中毒被改变的心理状态中的行为。

儿童在学习怎样掌握母语词汇期间,用格鲁斯的话来说,显然是从“在游戏中用词汇做试验”中得到快乐。他把词语联在一起而不管其应该有意义,为了从其中得到节奏或韵律这种乏人的效果,渐渐地,他被禁止获得这种乐趣,直到他把这些词进行有意义的结合。但在他年龄更大一些时,他仍会忽视在使用词语上学到的限制。词语被通过特别小的扩充而变形,它们的形式被一定的多种用法而改变[例如:被重叠或颤抖语言(Zittersprache)^①],或在游戏同伴中建立一种私人语言。这种企图可以被再次在某种类的精神病人中发现。

不管导致儿童开始这种游戏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在他的后期成长中,他仍然屈服于它们,且其意识到它们是胡说性的,而且他在被理性所禁止的东西的吸引中发现乐趣。现在,他利用游戏,为了从批判的理性的压力中退出来。但,在这种限制——其必须

①: 这是“zitter”(颤抖)这个音在其中起作用的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1900a,标准版,4,303)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论及此问题。

把它们自己在儿童的逻辑思考的教育和在现实中区分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东西的教育过程中,在这种限制中还有更多的能力。因为这个原因,对逻辑和现实的强迫的反抗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连想象这样的现象也包括在这个(反抗)的范畴之中。在儿童的后期和扩展到青春期的学习期间,批评的力量极大的发展,以至于“自由的胡说”(liberated nonsense)中的快乐只是在很小时候才敢于直接显示其自身。故人们不敢说任何荒诞的话语。但我认为,男孩子们做荒诞的事和傻事的典型倾向好像直接引申于胡说中的快乐。在许多病理学案例中,我们经常看见这种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再次主宰了男同学的谈话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经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能使自己确信,在他们产生的胡说中的快乐的潜意识的作用并不比在他们的无知中所产生的低效率少。

在后来,大学生也没有停止过反对逻辑和现象中的这种强迫行为,这种强迫行为的控制,他感到越来越不可忍受,限制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恶作剧”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反抗的组成部分。因为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快乐的寻求者”——我忘记在哪里遇到这种乐观的表达——而且要他放弃所享受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例如,用令人欢心鼓舞的“Bierschwefel”^① 的胡说,学生们试图努力挽救他的自由思想的乐趣,他作为自由思想乐趣获得者,越来越被学院教育的学校所剥夺。的确,直到很久以后,当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学术会议上遇到其他的同学和再次感觉他自己是个学习者时,在会议结束后,就是开始“Kneipzeitung”,^② 这把新发现扭曲成胡

① 在啤酒会上所做的滑稽有趣的演讲。

② 短暂的喜剧性场景,字面意思:“小酒店的报纸”。

说,且给他提供一个补偿,因为这是个新的对其智力限制的附加。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通过其名字为这样的事实提供了证据,即压抑胡说中的快乐的批评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毒物”的帮助,它不能被放在一边,甚至是暂时的也不能。情绪上的变化是酒精在人类身上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根据此种考虑,这种“毒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东西。快乐的情绪,它是否是内生的或中毒以后产生的,都能减弱抑制力,在其中的批评,且能使处在重压下的快乐的源泉再次变得可触及。观察诙谐的标准是怎样随精神的高涨而下降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高涨的情绪取代诙谐,就像诙谐必须努力去取代高涨的精神,在其中的在其他方面受压抑的快乐的种种可能性——在它们之中的胡说的快乐——就会回到其自身“Mit wenig Witz und viel Behagen”^① (妙语甚少,快乐极多)。在酒精的影响下,成年人又变成了孩子,他在不注意逻辑的强迫的情况下自由思想,他从其中发现快乐。

我希望我现在也显示了诙谐的荒诞技巧是快乐的一个源泉。只需要重复的是,这种快乐是来自心理消耗的经济性原则,或是一种来自批评的强迫作用的减轻。

如果我们再回顾这分离的三组诙谐的技巧,我们就会见到,第一组和第三组——用语词联想替代事物联想和荒诞的使用——能被作为昔日的自由和智力培养的重担的清除而被放在一起。它们是心理解脱(psychical reliefs),其能在某种意义上与构成第二组技

① 即“With little wit and much enjoyment”,妙语甚少,快乐极多。见摩菲斯特《浮士德》第一幕第五场。

巧的经济性相对比。减轻已经存在的心理消耗和节省将要准备被要求的心理消耗——从这两个原则——所有的诙谐技巧,和相应的全部快乐被从这些技巧中引申出来。这两种技巧和两种获得快乐的途径同一协调——在主要的所有的事件上——用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区分。

(二)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入了我们现在将要进一步考察的诙谐的发展或心理起因。我们已经了解诙谐的初级阶段,它们发展成为倾向性诙谐将有可能揭示在各种不同诙谐特点之间的新关系。在这些东西作为诙谐之前,有某些东西可以被描述为“游戏”(play)或“俏皮话”(jest)。

游戏——让我们就使用这个名字——出现在孩子们学习使用词语和把思想放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游戏可能服从于强迫儿童实践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鲁斯,189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体验到那些由相似的东西的重复,熟悉的事物的重新发现,语音相似等等所产生的快乐效果,这些效果可以被解释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经济性节省,^①不必惊奇于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儿童进行游戏且使他们继续这种游戏而忽略词语意思或句子的连贯性。这样,用词语和思想进行游戏,是被一定的经济性原则所产

^① 儿童在重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快乐[下文中将进一步论及此事,见第234页;弗洛伊德在给《梦的解析》(1900a,标准版,4,268)做的脚注中对此做了评价]是弗洛伊德后来在讨论《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g,标准版,18,35)里的“强迫重复的行为”(compulsion to repeat)这种假设中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

生的快乐效果所促使,将成为诙谐的第一阶段。

应该被称为批判能力或理智这一因素的不断加强使游戏结束了。这种游戏作为无意义或荒谬的东西而被拒绝,因为批评的结果,它变得不可能了。现在人们已不再有能力从重新发现熟悉的事物等等方法中得到快乐的可能了,除非在偶然的情况下,除非其正巧在成年的个体被像儿童那样的欢快情绪所占据,且处在清除批评性抑制的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快乐的过去的游戏才再次变得可能。但个体不想等待其发生,也不想放弃这种其熟悉的快乐。因此,他寻找使自己独立于这种情绪的方法,而进一步地向诙谐的发展是受两种尝试所控制的:避免批评和找到快乐情绪的替代物。

这样就产生了诙谐的第二个初级阶段——俏皮话。现在的问题是延长从游戏中产生的快乐效果,同时,使不允许快乐情绪产生的批评的反对保持沉默。这样只有一种方法可达到这种目的:词语的无意义组合成思想的荒谬集中必须有一个意义。整个诙谐进行的全部才智被搜集起来,为了能找到在其中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词语和思想的聚合体。诙谐所有的技巧方法已经被应用在这里——在俏皮话中,而且语言的使用也没使诙谐和俏皮话一致起来。使俏皮话从诙谐中区别出的是逃脱了批评的那句话的意义没有必要是有价值的、新颖的,甚至是好的,它只需要被允许以这种方法说出那事物,即使用这种方法说出它是不寻常的,没必要的或无用的。在俏皮话之中最显著的东西是把批评禁止的东西变成可能的那种满足感。

例如,当施莱尔马厄把 Eifersucht(嫉妒)定义为 mit Eifersucht(急切寻找)Leiden schafft(导致痛苦)的东西的那种 Leiden

schaft(情感)时,这只不过是个俏皮话而已。18世纪^①在哥廷根教授物理(和制作诙谐)的卡斯特纳(Kästner)教授当学生请他讲演时,问一个名叫克里克(Kriegk)的学生,问其多大年龄了。回答说:“30岁,”卡斯特纳教授随即评论道:“噢,这么说我有幸遇到‘30年战争’(Krieg)了。”(克莱茵保罗,1890),这也仅仅是个俏皮话。当有人问伟大的罗基塔斯基,^②他的4个儿子从事什么职业时,他回答道:“两个治病(heilen),两个号叫(heulen)。”(两个是医生,两个是歌手)这也仅仅是个俏皮话。信息是正确的,因此,也是无法批评的。可他给括号里的语词表达的东西并没有添加任何东西。这个毫无错误的事实是,只是根据通过统一性和两个词的语音的相似性所产生的快乐的原因,回答被以另一种形式给予了。

我想,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我们的研究道路了。通过我们全部仔细考虑诙谐的技巧,我们被这样的事实所困扰,即它们不仅仅适合诙谐,且诙谐的本质好像是依赖它们,自从它们被还原清除了特征和诙谐的乐趣失去之后。我们现在见到被我们描述为诙谐技巧的东西——且我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继续这样做——更确切地说是诙谐提供乐趣的源泉。同时,为同一目的从同一资源中引出的其他程序并无丝毫令人奇怪之处。作为诙谐特征的技巧,对于诙谐本身特别的东西,其存在于它们的程序中。此程序为了保护运用这些产生乐趣的方法时免遭使乐趣结束的批评所产生的拒绝。关于这个程序,一般说来,是不能说些什么的。诙谐的进行,就像我们已经评论的那样,在言语材料和允许昔日的用语言和思

① 仅在1905年印刷的那个版本里,这是被误印成16世纪。

② 卡尔·罗基塔斯基(1804-1878)是维也纳病理解剖学派的创始人

想来进行的游戏能经得住批评考验的概念情境(conceptual situations)的选择中显示自己,但要达到所说的目的,就必须用最天才的方法来使用词语的每一特性和思想顺序的每一组合。我们将在以后的适当的位置来用特殊的材料来特征化诙谐的进行(joke-work)。但在现在,我们不能解释怎样才能做出有利于诙谐的选择、诙谐的目的和功能,然而——换句话说,具有保护思想和词语的序列不受批评的作用——这已经能在其作为俏皮话的本质特征的俏皮话中被发现。从一开始,它们的功能就存在于解除内部限制,并使那些由于抑制已经变得不可触及的乐趣的丰富源泉富足起来。我们将发现,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始终保持这一特征。

现在,我们来重新给予“胡说的意义”(sense in nonsense)的因素以正确的位置,这一因素,权威们把对于区别诙谐和解释其快乐效果有很重大的作用的东西归因于此因素。在决定诙谐的本性的东西已建立两个牢固的观点——它们继续快乐的游戏的目的和它们保护其免于理智的批评的努力——立即能解释为什么每个诙谐,虽然它从一个角度的观点看是无意义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必然表现为有意义或至少是可以允许存在的。它是怎样使诙谐发生作用的呢?如果它没有能做到这些,它将被作为“胡说”(nonsense)而被简单地拒绝。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从在诙谐的同时有意义和无意义中产生的情感(或是直接的或是沿着“困惑与启示”这条途径中的矛盾之中衍生出诙谐的快乐效果。我们也没有必要更深一步地进入快乐是怎样从“认为它是缺少意义的”(thinking it senseless)和“把它看做是有意义的”之间的转换产生的问题之中。诙谐的心理起因(psychogenesis)已经告诉我们,诙谐中的快乐是

从语词游戏或胡说的自由中衍生出来的,诙谐的意义仅仅是企图保护这种快乐被批评所抛弃。

用这种方法,诙谐本质的特征的问题就已经在俏皮话中被解释了。我们现在可以转向俏皮话的更进一步的发展,研究它们怎样在倾向性诙谐中达到最高点这一问题。如果俏皮话它们所说的不是表现为无意义或完全无内容,俏皮话就在给予我们乐趣中仍占有显著位置,且其也满足于这一点。如果俏皮话所说的拥有内容和价值,它就变成了诙谐。思想值得我们感兴趣,即使它过去以最谦虚的形式表达而现在根据其意愿用必然给我们乐趣的形式来表达。^① 我们应该假定,像这样的联合肯定不是偶然产生的,我们必须试着发现作为诙谐构造基础的意向(intention)。我们早些时候所做的观察好像已经过去了,将使我们走上正轨。我们在前面说了:好的诙谐或(杰出的诙谐),如其所是那样,使我们形成一个快乐的整体印象,且不需要让我们立即决定哪一部分快乐产生于它的诙谐性,哪一部分产生于恰当的思想内容。有时因我们敬重其所包含的思想而过度估计了它的“杰出性”。相反,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又因诙谐的外表给予我们的乐趣而过度估计了它的思想价值。我不知道是什么给我们乐趣,和我们在笑什么。这种在

① 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极好的诙谐例子来说明俏皮话和诙谐本身之间的差别。奥地利“Bürger”Ministry(中产阶级内阁)一成员这样回答关于内阁的团结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相互忍让(ausstehen),那么我们怎能相互支持(einstehen)呢?”技巧在于:运用微小修改的同一材料。其合乎逻辑和比较恰当的思想应是:没有相互理解就不可能有团结。这种修改变更的相反性质[ein(在…里)——aus(从…出来)]与该思想所主张的不一致是完全符合的,同时,也是用来阐述这种思想的——[1867年奥地利的新宪法制定后,The Bürger(中产阶级)内阁由于内部不和谐,所以仅持续了几年时间就宣布辞职了。参见《梦的解析》标准版,4,193]。

我们判断中的不确定性,其必须被假定为事实,其可能会提供在词语的专有意义中的诙谐结构的动机。思想寻求和诙谐缠绕在一起,因为以这种方式使其自身使我们注意,好像能更显著和更有价值,但首先因为这种缠绕贿赂了我们的批判能力和使我们迷惑。我们倾向于把由诙谐的形式所产生的快乐归因于思想,我们不再试图查找给我们乐趣的任何错误的东西,以至于破坏一个快乐的源泉。如果此诙谐使我们发笑,在我们自身之中会建立一种极不利于批评的倾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某些东西会强迫我们进入一种游戏很早以前就能产生的情绪之中,且因为诙谐努力通过每种可能的方法使自己被取代。即使我们早些时候坚持认为,这种诙谐应被描述为单纯性的,而不是倾向性,我们必须不能忘记,严格来说,只有俏皮话是无倾向性的——这就是说单独服务于产生快乐这一目的。俏皮话,即使包含在其中的思想是无倾向性且这样只服务于理论上的智力兴趣,实际上是并不总是没有倾向性的。它们追求第二个目的:通过扩大思想和保护它不被批评来提高思想。在这里,它们再次通过坚决反对抑制和限制力量——现在是批评性判断来表达它们的原始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超出产生快乐的用法指出了通向它们进一步利用的道路。现在,诙谐好像是作为心理因素而拥有力量:如果把它放在天平的这一侧或另一侧,其重量就显而易见了。精神生活的大部分主要目的和本能为它们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它。最初的无倾向诙谐开始是作为游戏,其次才是把它与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东西都离不开目的相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已知道,在服从于裸露的目的、敌意的目的、愤世嫉俗的目的和怀疑的目的所得到的成绩,在从淫词秽语中衍生出来的猥亵诙谐的情况下,它使最初介入

的第三者成为同盟。在其面前,这个女人必然感到羞愧,通过使产生乐趣的礼物来贿赂他,使他成为同盟者。在攻击性目的中,诙谐用同一种方法把开始时并不关心的听者变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视者,创造出原来只有一个反对敌人者,现在有一群反对敌人者。在第一种情况下,诙谐通过其提供的额外乐趣克服了羞怯和尊敬的抑制。在第二种情况下,通过颠覆,否则将会检查它的批判性判断来实现这一目的。在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中,即在服务于愤世嫉俗和怀疑的目的中,诙谐一方面加强辩论证明,使听者相信的真理和组织机构的尊严被粉碎。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一个新的攻击来达到这一点。在使听者的批评站在自己一边辩论的地方,诙谐把批评赶出视线之外。无疑,诙谐选择了在心理学上更为有效的方法。

在这种概述倾向性诙谐所取得的成就中,更为容易看到的东西,被诙谐在听者身上产生效果假设为最突出的地位上。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我们所理解的观点来看,这种更为重要的是在产生诙谐的人的头脑中被诙谐所完成的功能或把它使用在正确的方法中的它们在其中产生的人。我们已经在前面已经提到——现在我们借此机会来重复一下——我们应该努力研究涉及两个人之间的区分的诙谐的心理现象。我将做个暂时的假定:诙谐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过程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在诙谐创造者身上的东西的模仿。在听者身上将要被克服的外部障碍对应于诙谐创造者之中的一个内部抑制。克服外部障碍的这个期望至少作为一个抑制观念出现在创造者身上。在某些情况下,被倾向性诙谐所克服的内部障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N先生的诙谐中,我们能假定,不仅诙谐能使听者在侮辱的形式中享受攻击的乐趣成为可能,

而且首先最重要的是对于他来说,是能制作出它们。在各种不同的内在抑制或压制中,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最具深远影响的。它被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它的功能被认为是阻止冲动,使冲动服从于它,及冲动的衍生物被阻止变成意识。倾向性诙谐就如我们所见,甚至能从被压抑的源泉中释放出快乐。如果像上面所假定的那样,对外部障碍的征服能通过这条道路追溯到克服内部抑制和压抑,我们就可以说,倾向性诙谐展示了诙谐进行的主要特征——通过清除抑制来解放快乐——比其他的诙谐发展阶段更为清晰。诙谐要么加强其所服务的目的,通过从被压制的冲动那里汲取帮助;要么它们使自己完全地服务于压制的目的。

我们可以承认,这就是倾向性诙谐所取得的东西,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并不懂得它们怎样把这些成就放入其效果中的。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从文字游戏和被解放的胡说的源泉中所获得的快乐的成果之中。但如果我们根据从无倾向性诙谐的俏皮话中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我们就不可能会认为这种快乐的力量大得足以除去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压抑。事实上,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不是力量的简单效果,而是更为复杂的释放的条件。现在,我不想讲我在理解这种条件时所走的漫长的道路,代替它的是,我将试图对这一情况做出一个简短的综合性说明。

费克纳(1897)已经提出了“美学辅助或增强的原则”,他的表达如下:如果在其自身中产生很少效果的快乐判断没有相互冲突地集中起来,就会产生比对应的分离判断的快乐价值巨大的甚至常常更为巨大的快乐结果——比一个不能被作为分离结果的总和解释的快乐。的确,这种集中甚至能导致积极主动的快乐结果和跨越快乐的阈限,而在那些地方,分离的因素由于太虚弱而不能做

到这一点；和其他因素相比，虽然它们必须在享受乐趣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诙谐的主题，我认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验证这条原则正确性的机会，而它能被在许多美学结构体系中显示为是很好的起作用的。当考虑我们已经学到另外某些东西的诙谐时，其至少已接近这个原则；换句话说，在几个给予乐趣的因素共同作用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它实际上已带来的结果分而归之于其每个部分。然而，我们能改变“辅助原则”中所假设的情况，作为这种新条件的结果，能够得到值得回答的一些问题。如果，在某种合作状态中，即快乐的决定因素和不快乐的决定因素同时出现，那么通常会发生什么呢？这种结果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决定了结果是快乐或不快乐呢？

倾向性诙谐在这些可能性中是一个特殊情况。有一种冲动或欲望总是在尽力把乐趣从某种特殊根源中解放出来，如果其被允许自由活动，其将会做到这一点。除此以外，另一种反对这种快乐的产生的欲望也存在着——抑制它或者说是压制它。正如其结果所显示的，这种压制的冲动应该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比被压制的要强些，但被压制的冲动并没有因此而被废除。现在，让我们假定，另一种欲望出现，其将通过这同一过程释放出快乐，虽然是从其他源泉中，且其在作为被压制的欲望的同样意义上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会是什么呢？

实例会给我提供比这种纲要式的讨论更好的研究方式。让我们假定有一个侮辱某个人的欲望，但这种欲望被礼貌或审美文化所强烈反对。例如，如果它能作为情感状态或情绪的某些改变的结果而能脱口而出，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这种由侮辱性目的所引

起的突破就会带来不愉快的感觉。这样,这个欲望就等于没有发生。然而,现在让我假定,这种可能性是为了侮辱而使用的语言和思想材料中所产生出来的好的诙谐的表现——换句话说,这种可能是从未被同一压制所阻碍的另外的源泉所释放出来的快乐。但这个快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并不能出现,除非这种侮辱是允许的。但当侮辱一被允许,这种新的快乐就会融入其中。倾向性诙谐的经验表明,在这种环境中,被压制的目的能借助于从诙谐中产生的快乐来获得充足的力量克服抑制,否则,这种抑制就会比它更强大。因为这样,诙谐成为可能,那么侮辱就发生了。但获得的乐趣不仅是通过诙谐所产生的,它无比强大。它比诙谐所产生的乐趣要大得多,以至于我们必须假定,这个迄今为止被压抑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冲破一切阻碍,而且可能是毫无损伤。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倾向性诙谐才能使人开怀大笑。^①

研究使人发笑的决定因素将能使我们得到更清晰的当诙谐提供反对压制时会发生什么的概念。然而,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能见到:倾向性诙谐的情况是“辅助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产生乐趣的某种可能性总是在另一种乐趣的可能性被阻碍时意外产生的,所以,以至于尽管后者被单独考虑也不会产生任何乐趣。这种结果产生的乐趣比附带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以这样说,就如其所是的那样,其作为“激励的额外补贴”(incentive bonus)而起作用,借助于少量乐趣提供的帮助,就可使大量的乐趣被获得,否则,

^① 弗洛伊德曾在《梦的解析》(1900a)第六章,第二节,标准版,5,478页以下,提出过一个类似的理论以解释梦中所体验的那种常被夸大的经验。

其会很难得到的,我有充足理由认为,这一原则是与适用于心理生活中许多大相径庭的活动领域中的那种安排相对应,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有助于释放大量快乐的快乐称之为前期快乐(fore-pleasure),这种原则称做“前期快乐原则”(fore-pleasure principle)。^①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倾向性诙谐的操作模式的公式了。它们尽力为倾向性诙谐的目的服务,以使用诙谐中获得的快乐作为前期快乐,通过解除压制和压抑从而产生新的快乐。现在如果我们来概观一下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从开始到完美,都保持其本质特征。它以游戏开始,为了是从词语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获得乐趣。一旦理性的不断加强把其作为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荒谬的思想游戏而结束,它就转变成为俏皮话,目的是为了保留这种快乐的资料并能从胡说的解放中取得新的快乐。下一步,就其本身来讲,诙谐还只是个无倾向性的诙谐,它给予思想以帮助并加强它们反对理性判断挑战的力量,一个在“快乐源泉的混淆原则”进行的过程仍对诙谐有用。最后,它又去帮助与压抑在作斗争的大部分目的,为了通过“前期快乐原则”来解除它们的内部抑制。理性,批判性判断,压制——这些都是诙谐要连续地反对的力量,然而它不紧紧抓住那些言语乐趣的源泉,并从俏皮话开始,通过解除抑制为自我敞开一个新的快乐源泉,所产生的快乐,无论在其在游戏中的快乐亦或解除抑制的快乐,都能被不变地追溯回心理消耗

① 弗洛伊德在他的可以算是当代的《性欲三论》中的第三篇论文的第一节里,极详尽地讨论了在性行为中起作用的前期快乐机制这一问题。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a)一文末尾的美学创造里,在他早期完成,死后出版的关于《舞台上的精神变态角色》(1942a)一文以及在其《自传研究》(1925d)里再次指出了这种前期快乐机制的应用。

的经济性原则,假设这个观点不与快乐的本质特性相矛盾冲突,它就能证明自己在其他方向上同样是富有成效的。^①

① 在我的叙述中一直没有给予注意的胡说式诙谐,值得我们进一步补充地考虑它。

我们的观点附加于“胡说中的意义”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导致每个诙谐必须是胡说式诙谐的要求。但这并非是必需的,因为它只是同思想进行游戏中不可避免地导致胡说。在诙谐中快乐的另外源泉,用词语进行游戏,只偶然给人留下那种印象,却不经常引起暗示的批评。诙谐乐趣的双重根源——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其对应言语诙谐和概念性诙谐之间的重要区分——使得对诙谐做出一个概括性陈述的简明公式显得困难些。文字游戏(playing with words)常常会产生明显的快乐,其是作为上述列举因素的结果(再认等等),所以,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压制。思想游戏(playing with thoughts)不能有这种快乐的动机,它常常遇到很强的能量压制它所产生的快乐(只是那种解除抑制的快乐)。因此,人们可以说诙谐中的快乐展示了在游戏中的原初快乐的内核,并是在解除抑制的快乐的一个外壳。——我们自然而然地不去构想,我们的在胡说式的诙谐中所获得的快乐是从我们不管其的压制而使其成功地解放出来的一个胡说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直接地看到,文字游戏可以给我们快乐。——还保留在概念性诙谐中的胡说拥有次要的通过使我们迷惑而引起我们注意的功能。它作为诙谐高度集中效果的方法而服务,但只有当它起阻碍作用时,所以,迷惑能通过短暂的时间来破坏理解的前期部分,在第56页以下的例子中,已经显示这种附加情况,诙谐中的胡说能被用于表征包含在思想中的判断。但这并不是诙谐中的胡说的原始意义。

(1912增补)许多类似于诙谐的产物都可能被归成胡说式的诙谐。没有适合它们的名字,但它们将被作为“诙谐的愚蠢的伪装”(idiocy masquerading as a joke)而进行描述。有无数这样的它们,我只选两个例子:

“一个坐在餐桌旁的人接别人递给他的鱼时,两次把手浸在蛋黄酱之中,接着,就把手伸入头发里。当他的邻座以惊异的眼光看他时,他好像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并道歉道:‘对不起,我以为它是菠菜呢。’或‘生活就是一座吊桥’,一个人说道。——‘为什么是那样?’另一个问道。——‘我怎么能知道?’回答道。”

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均有一种作用,因为它们都能成为诙谐的可能,所以人们努力去寻找在胡说背后的一种被隐藏的意义。但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它们实际上是真正的胡说。这种伪装能使在短时间的释放在胡说中存在的乐趣成为可能。这些诙谐并非完全没有目的,它们是“骗子”,在使其听者误解和激怒中给予说者某种快乐。乃是听者通过下决心自己说出它们来平息的恼怒。

第二节 诙谐的动机——作为 社交过程的诙谐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谈论诙谐的动机,因为获得快乐的目标必须被看做诙谐进行的充足动机。但是一方面,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即别的动机也参与了诙谐的产生,另一方面,考虑某些熟悉的经验,我们必须提出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这个普遍性问题。

两个特殊的事实使这种做法成为必然。虽然诙谐进行是从心理过程获得快乐的极好的方法,但是很明显,并非是所有的人都能使用这种方法,诙谐进行不是应每个人的要求,总的来说,只有少数的人才能拥有大量的它,他们被说成是“机智的”(Witz)面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在这个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力的连结中出现的机智——确切地说是在于过去心理“能力”中。同时它仿佛完全独立于诸如智力、想象、记忆等其他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假定在这些“机智的”人们身上出现的是一种特殊的遗传特质或者是一种允许或喜爱诙谐进行的心理决定因素。

我担心我们不能在探索这个问题上能走得很远。我们只能间或成功地发展,从理解一个特殊的诙谐到在其头脑中创造此诙谐的人的主观决定因素的知识。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用来研究诙谐技巧的事例才能使我们了解此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我这里指的是海涅的那个曾经引起海曼斯和李普斯注意的诙谐(见第8页)。

“……我和萨洛蒙·罗思柴尔德并肩而坐,他完全把我当同等人看待——相当地‘famillionairely’。”(《卢卡浴场》)

海涅借一个喜剧性的角色赫希·海厄辛斯之口说出此事，海厄辛斯是汉堡的彩票捐客、爆米花制造商、职业的评估员、贵族克里斯托福罗·岗普利内罗（原名岗普尔）男爵的贴身男仆。很明显，诗人在创作此诙谐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因为他让赫希·海厄辛斯成为一个能吹的人，且给予他最有趣且最坦率的语言，甚至让他展现了桑丘·潘沙的实践的哲学。可惜的是，海涅这位好像对戏剧创作不感兴趣的人，很快地就放弃了这位讨人喜欢的角色，只有在很少的段落中，诗人自己好像在一层薄薄的伪装下，通过赫希·海厄辛斯之口在说，且这很快就成为了确定的：这个角色只是自我嘲弄而已。赫希解释其放弃他先前的名字和为什么他现在叫自己为“海厄辛斯”的理由。他继续说：“因为在我的印章上，已有一字母‘H’，所以我无需再另刻一个‘H’字母了”。但是海涅自己在其受洗时，出于同样经济性效果的考虑，把自己的名字从“Harry”变成“Heinrich”。每个熟悉海涅自传的人，都会回忆起，海涅有个相同名字的叔叔在汉堡（Hamburg）（一个提供与赫尔·海厄辛斯这个人物形象另一种连结的地方）。他作为这个家族中富有的人，对海涅一生影响很大。他的这位叔叔也被叫做“萨洛蒙”，就像在罗思柴尔德非常“famillionairely”对待赫希一样对待海涅。如果我们把在赫希·海厄辛斯嘴里所说的仅是俏皮话的这句话认为是他侄子哈里·赫海因里希（Harry-Heinrich）所说的，那么它立即展示了一个极度辛酸的背景。毕竟，他也是家族中的一员，且我们知道他非常想和这位叔叔的一个女儿结婚，但他的表妹拒绝了他，他的叔叔又总是把他作为一个穷亲戚有点“famillionairely”地对待他，他在汉堡的富有的表妹从不把他当回事。我回忆起我的一个嫁给海涅

家族的人的一个老姑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当她年轻漂亮、极富吸引力的时候，在一次家庭宴会上，坐在自己旁边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且其他的人也都同样鄙视这个人。她自己也觉得没有理由对他更好些。只是在很多年以后，她在认识到那个曾经被忽视的不拘小节的人是其堂兄弟，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并不是没有一些证据来证明，海涅在当年和随后的岁月中是多少次被其富有的亲戚所拒绝。“famillionairely”这个诙谐正是从这个主观性情绪的土壤中涌现出来的。

相似的主观决定因素的出现可以被设想也存在于另外一些这个伟大嘲弄者的诙谐里，但我所知道的，再没有另一个例子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因为这个原因，要想试图对这个人的决定因素的性质进行确切地定义是很不容易的。的确，我们一般说来无意于给每个诙谐的起源都规定如此复杂的决定因素，而且其他名人所制作的诙谐也不是容易地被我们的检查所接触到。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诙谐进行的主观决定因素并非总是远离神经病的主观决定因素——例如，当我们了解到利希腾伯格是一个具有严重癔病的人（hypochondriacal），且他具有种种怪癖，绝大部分诙谐，特别是那些新产生的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关联的诙谐，都是不知作者名的情况下流行开来的诙谐。人们都想知道是哪种人创造的这样的诙谐。如果有人能有机会作为医生结识这些人，这些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出色，但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却以诙谐闻名，而被公认是创造了许多绝妙诙谐的人，那么他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诙谐制造者是一个分裂人格的人（disunited personality），并有神经症的倾向。然而，文字案例的证据不充足将定会阻止我们开始这样的假设：这种精神神经病的性情是否是诙谐形成的一个常见的或

必要的主观条件。

再次,有一个更为显然的犹太人制作的诙谐,其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见第 119 页),通常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而来源于其他源泉的关于他们的轶事趣闻很少能超出喜剧故事或辛辣嘲讽这一水平。决定他们加入这些诙谐本身的东西好像是和在海涅的“famillionairely”诙谐中同样的东西。且其明显好像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诙谐的创造者发现批评或攻击性很难以直接的方式表达,那么可能性就存在于迂回的途径之中。

决定或偏爱诙谐进行的其他主观因素很少陷入模糊之中。产生单纯性诙谐的动机力量经常不是为显示自己聪明的强烈的欲望,展示自己的欲望——一种与性领域里的露阴癖几近相同的本能。存在着许多其抑制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的遗传这一事实,这将为有倾向性诙谐的产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个人性欲结构中某种单个成分特别在特殊情况下能作为诙谐创建的动机而表现出来。整个淫秽这类诙谐使人推论出,在其创造者身上有某种露阴癖倾向的存在,他们的那些性欲里明显存在着强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受到抑制的人们,才能成功地把其展示为富有攻击性的有倾向性的诙谐。

使研究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成为必要的^①的第二个事实是,一般的经验认为,没有人能满足于只为其独自制作诙谐。想告诉别人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常常在忽略严重的误传的情况下成功地传达了诙谐。在滑稽的事例中情况也一样,把它告诉给他人也能产生乐趣。但这个要求不是不可违反的。如果一个人

^① 见上文第 149 页。

碰巧偶然地遇到某些滑稽的事情,他也能自己享受它的乐趣。相反,诙谐必须被告诉给其他的人。构建诙谐的心理过程好像并没有完成——当诙谐发生在某人身上:这里还存在着某个试图通过传达这个观念来结束构建该诙谐有未知过程的东西。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猜测出什么可能是传达这一诙谐的欲望的基础。但我们能在诙谐中发现另一种特殊性,是其把诙谐从滑稽中区别出来。如果我偶然遇到某种滑稽的事情,我自己能开心地大笑。虽然,事实确如此,如果我能以告诉他人而使他人大笑,我也能很高兴这样做。但我不能在遇到一个诙谐时自己发笑,尽管此诙谐肯定会给我乐趣,或创作一个诙谐这样做。很可能是我需要把这诙谐传达给其他的人,以某种方式与那些通过诙谐而笑的笑者相联系,这种笑拒绝在我身上出现,但却在其他的人身上很明显。

那么,为什么我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先开始第二个问题。在滑稽的情况下,通常两个人是相关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我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的东西的人。如果无生命的东西对我好像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像拟人化的原因。这个滑稽过程满足于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人。可能有第三者出现在其中,但这不重要。诙谐作为用某人自己的词语和思想进行的游戏,是在没有作为对象的人的情况下开始的,但已经处在俏皮话的初级阶段,如果它能成功地使游戏和胡说从理性的反对中解放出来。它要求另外的人,对其他可传达其结果。但这个在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对应于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但对应第三者——那个另外的在滑稽

的事例中出现的人。这好像在俏皮话的事例中,诙谐进行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好像自我感觉在这点上不能确定自己的判断。单纯性诙谐,即那些服务于加强一个思想的诙谐,也要求另一个人来测试是否它们达到了它们的目标。如果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的服务,正如在滑稽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诙谐的这种心理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滑稽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在第三者的事例中,诙谐遇到主观决定因素,这主观决定因素会使产生乐趣兴奋的目标无法达到。恰似莎士比亚在《空爱一场》(第五幕,第二场)中所说的那样:

俏皮话的繁荣在于耳朵
听者听到它的耳朵,绝不在于舌头
说者说其舌头……

一个被严肃思想控制的人是不适合证实这样的事实,即俏皮话成功地拯救了言语表达的快乐。为了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必须使自己处在快乐之中或至少在与其原来思想状态不同的感觉中。应用于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的是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之中,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障碍存在于诙谐试图服务的目的的相反的形式之中。如果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就不能因听了这个极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在一群教士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愿意冒险把海涅那个把天主教和新教比做是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和零售商的对比讲出来(见第92页)。如果听众中有我的反对者的忠实的朋友,将会听到的是我用来攻击其的最成功

的痛骂诙谐,但是作为痛骂而不是作为诙谐被听到的。在他们之中产生的是侮辱而不是乐趣。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一种能产生反对这个诙谐目的情感的因素的缺失,是必须的条件——如果第三者参与完成制作这个诙谐的整个过程。

在诙谐的运作中没有这样障碍的地方,就会出现我们现在所探究的主题的现象:诙谐产生的快乐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诙谐创作者身上更为明显。我们必须满足于,在我们应该倾向于问是否听者的快乐并不比诙谐制作者更强烈的地方说得更明显些。这自然是因为我们没有测量和比较的方法。然而我们知道,在第一个入通常以一种紧张严肃的神态制作此诙谐之后,听者用其大笑来给出其快乐的证明。如果我重复一个我自己听到的诙谐,如果我不损坏它的效果,我必须像第一个人那样具有同样的行为举止。现在问题出现了,我们是否能够从因诙谐而笑这个因素中引出任何关于构建诙谐的心理程序的结论。

我们不能把所有已经提出过的和发表的关于笑的本性这样的观点都考虑进来。这很可能是由于李博(Ribot)的一位学生杜加斯(Dugas)在为其书《笑的心理》(1902)作序时所说的评论而阻碍我们提出任何计划,他写道:“Il n'est pas de fait plus banal et plus étudié que le rire; il n'en est pas qui ait eu le don d'exciter davantage la curiosité du vulgaire et celle des philosophes; il n'en est pas sur lequel on ait recueilli plus d'observations et bâti plus de théories, et avec cela il n'en est pas qui demeure plus inexpliqué. On serait tenté de dire avec les sceptiques qu'il faut être content de rire et de ne pas chercher à savoir pourquoi on rit, d'autant que peut-être la réflexion tue le rire, et qu'il serait alors contradictoire qu'elle

en découvrit les causes.”^①

另一方面,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应错过利用一种与我们思想序列极相适合的笑的机制的机会。我记得,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关于《笑的心理学》(1860)的文章中曾试图对此做出解释。根据斯潘塞所说,笑是精神兴奋的释放现象,同时也是这种兴奋的心理使用中突然遇到障碍的证据。他用下述的话来描述在笑中结束的心理状态:“只有当意识不知不觉由大事转向小事时——只有还存在着我们称之为下降的不协调时,笑自然而然就会产生。”^②

从某种极其相似的意义上讲,法国作家们(例如杜加斯)把笑描述成是“放松”,即一种紧张感的放松的现象。贝恩(Bain,1865)提出的那个公式原则——“笑是紧张感的解除”——对我来说好像也是某些权威们让我们相信的观点更接近斯潘塞的观点。

然而,我感觉有必要修改斯潘塞提出的概念,部分是为了给予

① 没有一种行为比笑更普遍,或者得到更广泛的研究,也没有一种行为比笑更能激起普通人和哲学家的好奇心。没有一种行为能使我更多地对其观察使我搜集更多的资源和建立更多的理论。但同时笑比任何行为都更无法解释,因此,我们必须以笑为满足,不要去试图知道我们为什么笑,这一点将是我们带有怀疑的目光,被诱惑这样说的。因为反思会扼杀笑,从而能发现笑之原因也是其自相矛盾的想法。

② 在研究滑稽乐趣中,定义的诸多方面将要求我们去详细研究。这已被其他作家做了,并无论怎样,在此它始终未关涉到我们——我认为斯潘塞在解释为什么“释放”会选择特殊途径来释放对笑的情景的生理兴奋时,他自己并不高兴。笑的心理学解释的主题——即是说,追溯或阐释笑的肌肉运动特点——在达尔文之前或之后,至少就已被研究,但至今仍未能最后解释清楚,我对这一主题有一个贡献,据我所知,以抽动嘴角为微笑特征的怪相首先出现在婴儿吃饱奶、松开奶头之后满足地睡去的时候。这里,它确定是情绪的表现,因为它对应着一个不再吃的决定,且其作为“足够了”或“确实是太多了”的表征。这种最初的愉快的满足感的意义可能带来这种微笑,它毕竟是笑的现象的基础,进入它的后来的与释放的快乐过程的关系之中。

包含在此概念中的观念一个更确定的形式,部分是为了改变它们。我们应该说,如果先前为特殊心理途径欲力投入(cathexis of particular psychical paths)所使用的心理能量的限额现在变得毫无用处了,以至于其能寻到自由释放的途径,那么笑就会产生。我们知道引入这样的假设会招致什么样的“憎恶面孔”。但我们将冒险在我们的反对敌对意见的句子里引用李普斯的《滑稽与幽默》(1898)一书中的一句很恰当的句子,从此书中的句子中得到比关于滑稽和幽默更多的关于主题的启示:“最后,特殊的心理学问题总是导致相当的深入心理学之中,以至于在基础上来说,没有任何心理学问题能被孤立地处理”,自从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来整理这些心理学事实以来,我在思想中就已习惯把“心理能量”和“释放”这些概念及心理能量的处理作为一种数量来对待。在《梦的解析》(1900a)里,我已经(和李普斯在同样的意义上)试图建立这样的事实:“真正产生心理效果的”的东西是在其自身中的潜意识的心理过程,而不是意识内容。^① 只有当我说到“心理途径的欲力投入”(cathexis of psychical paths)时,我们似乎才从被李普斯所使用的一般性类比中分离出来。我所得到的沿着某种联想途径进行移置的心理能量和心理过程的种种几乎坚不可摧的存在的经验,实际上,建议我去试图勾画在某些方法中未知的东西。为避免误解,

① 参见上面引用的李普斯的那本书中的第八章“论心理力量的某些段落。因此,下面的一般性陈述仍有用处:心理生活的种种因素不是意识的内容,而是在其本身之中的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如果不仅仅希望描述意识的内容,就必须从这些意识的内容的特征及瞬间连结的特征中,推论出潜意识过程的性质。心理学必须作为这种过程的理论而存在。但这种心理学将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过程还具有许多并不是由种种对应的意识内容所表征的这些过程的特征。亦参见我《梦的解析》,标准版,5,611—614中的第七章。

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现在不想声明:细胞和神经纤维,或目前已有自己位置的神经系统就是这些心理途径,^①即使以某种仍未被证明的方式通过神经系统的有机元素来表征这种途径也不可能。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在笑中,在允许自由释放的为欲力投入而被迄今为止还利用的某些心理能量之下仍存在着某种条件。但是,由于笑——并不是所有的笑,其是真实的,但由诙谐引起的笑——肯定意味着快乐。我们应倾向于把先前出现的欲力投入的解除和这种笑关联起来。如果我们发现诙谐的听者发笑,而其制造者却不笑,这可能归因于在听者身上欲力投入消耗已解除和释放,而在诙谐建构过程中,无论是解除还是释放都存在着种种障碍。只能通过强调听者只有了极少的消耗就获得了诙谐的快乐这个事实,才能更恰当地描述听者,也即诙谐的第三者的心理过程。他可能会被说成是和诙谐一起出现的。他所听到的诙谐的词语必然会在其身上产生一种观念和思想序列,而这种观念和思想序列的构建是受到内部抑制强烈反对的。为了使该观念和思想能够像第一个人身上那样自然地产生,他将不得不做了一番努力,最后至少他不得不使用了与这种想法的抑制(inhibition)、压制(suppression)或压抑(repression)的力量相对应更多的心理消耗。他节省了这种心理消耗。依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应该说,他的快乐与他的节省相对应。我们对笑的机制的深入研究导致我们更想说:由于通过听觉方法描绘观念的引领,用于抑制的欲力投入能量(cathectic energy)现在突然变得多余了且被解除了,因此它通过

① 约10年前,弗洛伊德实际上曾煞费苦心地试图确认这一问题,但没有成功。关于此点可见弗洛伊德去世后才出版的《科学心理学的设计》(1950a)。

笑而释放出来。根据在本质上相同的意义讲,这两种方法,表达同样的事实,因为节省的消耗正对应着抑制,那么抑制就变得多余了。但第二种表达方法更富有启发性,因为它允许我们说,诙谐的听者是通过抑制欲力投入的解除而变得自由的心理能量的配额而发笑的,我们可以说,他是用笑消耗掉这些心理能量的配额的。

假如制造诙谐的那个人不能发笑,正如我们所说的一样,这指出了与或者存在于抑制欲力投入的解除或存在于其释放的可能性之中的在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东西的差异——就像我们立即将要看到的那样,前一种转换的情况将不符合我们所谈的事例。在第一个人身上的抑制欲力投入必须解除一样,否则,没有任何诙谐会因此而产生,因为诙谐的形成正是为了克服这种阻力。因此,第一个人也不可能感受到诙谐中的快乐,而这个诙谐快乐正是我们被迫去追溯的抑制的解除。那么所有剩下的东西就是另一种转换,换句话说,虽然第一个人感觉到快乐,但他不能笑,因为这里存在着释放的可能性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笑的必要前提,它能从作为适用于某些内在心理应用中的解放的心理欲力投入能量中产生出来。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到这种可能性上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我们将会对其产生兴趣。然而,另一种导致同样结果的条件将会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实现。尽管解除了欲力投入抑制,没有任何能被证明的能量配额会释放出来这一点也是可能的。在诙谐进行所作用的第一个人身上,诙谐进行必须对应于某种新的心理消耗的配额。因此,第一个人自己产生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时作为这种力量的结果无疑会给他带来极大乐趣,甚至,在倾向性诙谐中,这也会引起相当大的快乐,因为诙谐进行自身所获得的前期快乐接管了进一步抑制的解除——一个与诙谐的听者所避免的相同的消耗。我刚

才所说的可由下述观察的事实得到进一步的确定：一旦第三者被要求在与诙谐相联的智力工作中消耗，那么即使在他身上，该诙谐也会丧失令人发笑的效果。诙谐中的隐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省略掉的东西也很容易被补上。一旦有意识的智力兴趣恢复意识，就使诙谐的效果成为不可能。在诙谐和谜语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总的来说，在诙谐进行期间的心理丛(psychical constellation)可能对已经获得的東西的自由释放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好像还未处在进一步观察此点的地位上，我们已经能更成功地阐释我们问题的一部分——第三者依据什么来发笑——不能同样说清楚根据其他部分——第一个人根据什么而不发笑。

然而，如果我们执意要接受关于笑的决定因素以及在第三者身上产生的心理过程这些观点，那么我们就处在给予诙谐已被知道拥有的全部特殊性但尚未被理解的满意解释的位置上。如果一个能在第三者身上的能释放的欲力投入能量的配额被释放出来，那么就有几个条件必须被满足，或作为刺激行动的条件值得被拥有：1)必须确保第三者确确实实做这种欲力投入的心理消耗。2)当欲力投入消耗被释放时，有必要防止它去寻找某些其他的心理应用而代替为其自身提供释放动力。3)如果第三者身上打算被释放的欲力投入事先被加强，提高到更高的高度。那么其不得不作为有利之处来利用。诙谐进行的某些方法是服务于所有这些目的的，而且我们可以把这种特殊的方法作为次要的或辅助的技巧归类在一起：

1. 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陈列出作为诙谐听者的第三者必要的资格之一，就是诙谐进行在第一者之中存在的已经克服掉的那种相同的内部抑制，这一点是本质的东西，他必须和第一者处

在充足的心理状态和谐之中,对猥亵言语很敏感的人不可能从机智的裸露诙谐中得到任何快乐。N先生的攻击将不会被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习惯于自由使用欲望和侮辱做游戏的人所理解。因此,每个诙谐都要求其自己的观众,对同一诙谐的发笑是深度的心理一致的证明。而且,在这里,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点,即使我们能更准确地猜测出发生在第三者身上的东西。通常,第三者必须能习惯于在自己身上建立起第一个人的诙谐已经克服了的同一抑制,以便于一旦他听到这个诙谐,这种为这种抑制的准备状态将会强迫或自动地觉醒。这种为抑制而进行的准备,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真正的消耗,类似于军事动员一样看待,而且就在同一时刻,它就被作为多余的或太晚的而看待,因此它常常还在萌芽状态就被笑释放出来了。^①

2. 使自由释放成为可能的第二个条件——被释放的能量将被阻止应用于其他方式——似乎更为重要。当在诙谐中的思想强有力地使听者产生兴奋的观念时,此条件提供了诙谐效果的不确定性的理论解释,在此种情况中,问题是,通过其听者被控制的思想范围是否与诙谐相同——或相矛盾的目的将决定是否其注意力将保留在诙谐过程中或是从其中退出来。然而,作为依然是更广泛的理论爱好的事物是一类辅助技巧,这种辅助技巧能服务于完全从诙谐过程中出来,捆绑在听者注意力上的目的,且作为允许的过程,过程能自动地行进。我特意说是“自动地”而不是“潜意识地”,因为后者的描述将会是误导。这只是阻止提高的注意欲力投入(cathexis of attention)从心理过程中出来,当诙谐被听到时,且这

^① 萌芽状态这个概念被海曼斯(1896)在某些不同的连结中所使用。

种辅助技巧使用立即引领我们怀疑精确的注意欲力投入在监督和在新的释放欲力投入能量的应用中具有很大的作用。

似乎很难避免在心理内部应用这些早改变得多余的欲力投入，因为在我们的思想过程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在不失去它们能力的情况下，通过释放来把这些欲力投入从一条途径转换到另一条途径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诙谐使用了下列方法。首先，它们试图尽量使其表达尽可能地简短，目的是给注意力提供较少的攻击点。其次，它们观察易于理解的条件，一旦它们要求其在两个不同思想途径进行选择智力工作，它们就会由于通过不可避免的思维消耗和通过注意力的唤醒来危及它们所产生的效果。但除去这些，它们使用分散注意力的方法，通过提出存在于依赖于它的表达形式中的某些东西，以至于同时抑制欲力投入的解放和释放能被没有打断地完成。这个目的是已经通过在诙谐词语中的省略来完成了，它们还促使我们去补充这些空白，这样就能成功地从注意中退出诙谐过程。在这里是谜语的技巧吸引了注意力，且此技巧如其所是那样，是被拿进诙谐进行的服务之中的。我们发现特别在某些组倾向性诙谐中，那些被用作面具的东西在这方面效果更好。那些三段论式的面具通过分配其任务的方式令人尊敬地完成了保持注意力的任务。当我们开始猜想回答中有什么错误时，我们已经开始笑了，我们的注意力被不知不觉地抓住了，且解放的抑制欲力投入已经被完成。那些带着滑稽的面具的诙谐也是相同的，在这些诙谐中，滑稽逐渐变成了诙谐技巧的帮助。滑稽面具用不只一种方法来促进诙谐的效果，它不仅通过吸引注意力来使诙谐过程的自动性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滑稽的释放先发送出来来促进通过诙谐的释放。在这里，滑稽所起的作用

与行贿的前期快乐的作用十分相似，我们能通过这种方法理解某些诙谐怎样能完全放弃通过诙谐的普通方法所产生的前期快乐，而只是把滑稽用作前期快乐了。在诙谐专用技巧中，特别是在移置和通过某些荒诞的东西的表征中，除了它们的其他限制条件之外，它们也常常导致渴望诙谐过程自动实现的注意力的分散。^①

就如我们已经猜测的及在后面将要更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我们已经发现在注意力分散的条件下，在诙谐的听者身上有一个心

① 我想联系一个移置的诙谐的例子来讨论诙谐技巧的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有一次，当盖尔梅耶这位天才女演员被问到（在一次官方的检查中）这个不受欢迎的问题：“你的年龄？”据说她羞怯地垂下目光，以格雷琴那样的声音回答道：“在布鲁恩”。这是一个典型的移置。当她被问到其年龄，她以其出生地作为回答。因此，她期待下一个问题，她将很高兴知道这个问题被跨越过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感觉此例中的诙谐特征并没有被以其纯粹的形式被表述。很清楚问题被回避了，移置太明显了。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在问题中的是一个明显的故意移置。在其他的移置诙谐中，移置是隐藏的。我们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注意到这个移置，在前面（见第55页）提到那个诙谐中，在对一个骑马进行推荐的答复中“6点半我在匹兹堡干什么？”移置是很突出的。为弥补这一点移置作用通过胡说的性质来使我们产生迷惑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对那个女演员的检查中，我们还是能马上意识到她的移置的回答——（1912增注）通常被叫做“Scherzfragen”（滑稽问题）的东西往往在另一方面背离诙谐。不过，除此以外，它们也可使用最好的技巧。这里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利用移置技巧：“吃掉他母亲和他父亲的人食者是什么？”——“孤儿”——“如果他吃掉他所有其他的亲属呢？”——“惟一的继承人”——“这种怪物在哪找到他的同情（sympathy）呢？”——“在词典‘S’字母下。”这种“滑稽问题”（Facetious questions）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诙谐，因为诙谐地回答要求不能以诙谐的隐喻、忽略等等同样的方法来被猜测（约瑟芬·盖尔梅耶是位女高音演员，在维也纳特别受欢迎）。

理过程的重要特征。^① 联系这一点,仍然存在着其他的我们能理解的东西,首先,虽然我们能通过分析研究发现使我们笑的原因,但我们为什么很少知道在诙谐中使我们笑的是什么东西。实际上是自动过程的产物,这个自动过程只有通过我们的意识注意力远离它才能成为可能。其次,我们能理解关于诙谐的特殊事实:诙谐如果它们作为对听者是一个惊奇而到来,只能在对听者是新的情况下才产生它们全部的效果。诙谐的这种特征(决定它们的短命和刺激不断产生新诙谐)明显的是归因于这样的事实:正是这个使人惊讶或使人出乎意料的性质意味其不能第二次成功。当一个诙谐被重复时,诙谐作为记忆就会将注意力引回到首次听到这个诙谐时的情境中去。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人们总想把其听到的诙谐告诉给还没有听到过它的人来实现其理解的欲望。因为他或许能够从这个诙谐给新来者留下的印象中发现由于缺乏新奇性而丢失乐趣。也可能是驱使创造者在第一次例子中的相类似的动机而把这个诙谐告诉给其他的人。

3. 在第三个条件里,我将提出——这次不是作为必要的条件,而是作为对诙谐过程的促进作用——增加获得的释放配额的诙谐进行的辅助性技巧方法,且通过这条途径来加强诙谐的效果,的确,很大部分也是为了提高对诙谐的注意力,但它们又通过既保

^① 弗洛伊德后来指出,分散注意力方法也是在催眠术中应用的一个技巧。参见他的《群体心理学》(1921c)第十章。在其去世后出版的文章《精神分析与通灵术》(1941d)一文中,同样的程序在某些读心术中(thought-reading)的事例中也同样起作用。在弗洛伊德对《癔症研究》(1895d)的技术性贡献中,在他的对他自己“压力”(pressure)技术的机制的解释中,这种方法的观念的初次暗示将可能被看到。

持它又抑制其活动来减弱这种效果。任何引起兴趣和产生困惑的事物在这两方面都发生作用——这样,特别是胡说和矛盾冲突的说法,也有“观念的对比”(contrast of ideas),其曾被一些权威们试图放入在诙谐的本质特征之中,但我认为,它只是加强诙谐效果的一种手段。所有在听者身上引起迷惑的东西都在听者身上产生一种被李普斯称之为“心理郁积”(psychical damming up)(见第126页)的能量分布状态,且毫无疑问他还可正确地假定这种释放越是有力量,精神郁积就越高。确实,李普斯的解释并不是和诙谐特别相关,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滑稽。这种抑制欲力投入的释放是通过郁积增高来相似地提高的。

现在,我们开始知道,诙谐的技巧被一般地来说是由两种目的来决定的——它们是在第一个人身上使诙谐的建构成为可能和试图保证诙谐在第三个人身上产生最大可能的效果。诙谐这一似贾纳斯(Janus)^① 的双面特征,保护它们的原初的快乐的领域免受批判性理性的攻击,和前期快乐机制同属于这些目的一种。通过本章所列举的条件所产生的技巧的更复杂之处,其要从诙谐第三者身上产生。因此,这样诙谐就是同时服务于两个主人的两面派无赖。诙谐中的每一件旨在获得快乐的东西都是为第三者服务的,仿佛在第一个人身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部抑制。因此,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完全印象:第三者对于诙谐过程的完成是多么地不可缺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能够获得(对于在第三者身上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性质)相当深入的理解,而在第一者身上发生的

① 贾纳斯(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又称双面神,可守护门户和万物的始末之神。

相对应的过程仍然是处在模糊的面纱之中。在我们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因我们制作的诙谐而发笑?”和“为什么我们总想把我们的诙谐告诉别人?”第一个问题远离我们能回答之处,我们只能猜测在这两个有待解释的事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连结:我们被迫把我们的诙谐告诉给他人是因为我们不能自己因其而发笑。从我们对第三者身上获得和释放的快乐的条件的深入了解,使我们能推断出,在第一个人身上的释放的条件是缺乏的,且获得快乐的条件是不完全地满足的。既然如此,不可争议的是,我们通过对我们使其产生笑的人的印象,这种迂回途径来补充我们不可能获得的笑的快乐。正如杜加斯(Dugas)所说,我们像“笑被弹回来”(par ricochet)一样笑了。笑是心理状态的极富感染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当我通过给他人讲述诙谐而使其发笑时,我确实是利用他来使我自己笑。人们实际上能观察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一开始以严肃面孔来讲述诙谐的人,随后带着温和的笑加入其他人的笑声中。因此,给他人讲述我的诙谐好像将可服务于几个目的:首先,给我以此诙谐成功的客观确定性;其次,通过其他人对我的反应来实现我自己的快乐;第三——在重复一个不是自己制作的诙谐时,弥补了由于诙谐缺乏新奇感而失去的快乐。

在总结关于诙谐的心理过程的讨论时,就它们在两个人之间发生而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经济性因素,这个经济性因素自我们首次解释诙谐的技巧时,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到达诙谐的心理学观点的途径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放弃这明显但却最简单的关于这个经济性原则的观点——这是一个一般来说是避免心理消耗的问题,如此将被包括在最大可能地限制词语的使用和建立思想链条之中。即使在那个阶段,我们对自己说,精

简或简洁不足以制作诙谐。诙谐的简洁是特殊的一种简洁——“诙谐地”简洁。确实,通过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所产生的快乐的原初结果是从仅是消耗的经济性中衍生出来的。但随着游戏的发展成诙谐,倾向于经济性原则也必然改变其目标了,因为通过利用相同词或连接观念于一起的新方法的避免而将被节省的数量,与在智力活动上的巨大消耗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冒险地把这种心理节省和一个商业企业相比较,只有后者的交易额很小,一般地说,重要的就是其消耗将保持低水平,并且管理费用限制到最低。节省就只考虑消耗的绝对高度。随后,当商业范围扩大,管理的重要性就会降低。消耗数量所达到的高度不再很重要,假设交易额和利润能被有效地提高。减少管理费用将会是积极的决定因素,且其也是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不过,假定认为当消耗是绝对地巨大时,那么就没有节省的余地了,这也是错误的。管理精神,如果其倾向于节省,那么现在将转向节省更细节的东西。如果一项工作能用比以前更少的花费来完成,那么他将会满意于此,然而,且不管节省的钱和总消耗相比起来是多么地微小。在非常类似的情形中,在我们复杂的心理事务(psychical business)中,也存在着细节上的节省,也保留着快乐的源泉,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日常发生的事中看出来。一个过去常用煤气灯照明的人,现在改用电灯照明了,他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当他开灯时,他都会体验到一种快乐的感觉。只有其回忆起点燃煤气灯时所做的那些复杂的却是必要的工作,他就会感觉到这一点。相似地情况是,由诙谐所带来的心理抑制消耗的节省——虽然与我们全部的心理消耗相比是很小的——将为我们保留一个快乐的源泉。因为它们使我们节省了一个我们习惯做的且我们已经准备在此种情况中去

做的特殊消耗。这个消耗的因素正是作为被期待和准备要确定无误地进入突出地位的那个因素。

内部性节省,就如我们刚才考虑的那样,将会成功地给予我们带来瞬间的快乐,但只要在此点上被节省的东西能被应用到其他地方。它不会带来持久性的减轻。只有在这种应用于其他地方上面,这种情况才能被避免,即这种特殊的节省被转移到心理消耗的普遍减轻之中。这样,由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诙谐的心理过程,减轻因素就取代了经济性原则,显然是前者给我们提供了快乐感,第一者身上的诙谐过程通过减轻抑制和减少局部消耗来产生快乐。不过直到通过最初介入的第三者帮助,直到它通过释放而得到普遍的减轻时,这种快乐才会停止。

第三章 理论部分

第一节 诙谐和梦及无意识的关系

在我讨论有关诙谐技巧的那一章末尾,我曾断定,那些参与诙谐形成的种种技巧的凝缩过程,无论是否具备替代形成、移位、荒诞性表达、对立面表达和间接表达等等,均显示出与“梦工作”过程间具有一种深远的一致性。我曾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我们应该相当仔细地研究这些相似之点;另一方面,我们应检查诙谐和梦二者所具有的共同因素。假如读者已对其中之一“梦工作”比较熟悉,那么,我将很容易地开展这项比较研究。但是,更明智的办法是抛开这种假设。我有这样的印象,我那本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在我的同行专家们中间引起的“困惑”,远远大于所引起的“启发作用”,并且我知道,在更大的读者群中,我书中的所有论点被总结为一句时髦语——“愿望实现”,这样可以很容易地记住,同时也被方便地误用。

对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并没有使我碰到任何可以让我改变或改进思路的东西,虽然我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有大量的临床机会。因此,我现在可以静静地等待,直到我的读者的理解跟上我,或者有见地地批评指出我的观点中的根本错误。为了达到与诙谐进行比较的目的,我现在要简明扼要地指出关于梦和梦工作的最基本的情

况。

我们是通过醒后对梦的片断记忆来认识梦的。梦看起来是感觉印象的一个网络,大多数是视觉印象,也有别的感觉印象。梦类似于某种亲身体验,思维的过程(梦中的知识)和感受的表达可能交织在一起。我们由此而记住梦,我称这为“梦的显意”。它往往是荒诞的和混乱的,有时只具备两个特点中的一个。即使它是前后连贯的——比如在某些焦虑的梦里,它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也表现为某种怪异的东西,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说明它的根源。人们直到最近仍在做出就梦本身而寻找这些梦的显示特征的解释,只是认为是某些神经因素的混乱、无关的、抑或是“昏昏然”的活动。

我已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奇怪的“明显的”梦的内容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合理的心理结构被毁坏、被改变的模本,也就是被贯之以“潜在的梦思想”名字的东西。我们通过把显梦的内容分割成它的组成部分而无需考虑它可能具有任何表面的意思,从而根据每一个被刚刚分割的因素而带来的联想线索,我们最终可以理解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最终会导致一系列不但完全合理而且很容易符合我们心理过程的熟悉这些线索的思想结构。在这种分析的过程中,梦困惑着我们的内容将会失去所有的古怪特点。但是若这些分析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在它继续的时候,坚决反对那些抵制复制不同联想的批评观点。

在记忆中的显梦和由此发现的潜梦的比较中产生了“梦工作”这个概念。梦工作的意思是把潜梦转换成显梦的转换过程的总和。现在我们可以把先前对梦产生的惊奇感归功于梦工作。

无论如何,梦工作的成绩可描述如下,通常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思想,在白天形成,但没有完全建构成——它是一天的残留物,在

夜间仍保留着一定的能量——由它形成的兴奋点,并且扰乱着睡眠。这种白天的残留物被梦工作转化为梦从而无碍于睡眠。为了使梦工作实现转化,还必须附加上一个不难实现的条件,也就是白天残留物被加上一个希望形式。这种希望来自梦思想形成梦的第一步而且后来成为梦的中心。来自分析的经验——不是有关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孩童身上遗留下来的任何有关清醒生活的希望足以形成一个梦,它出现得连贯、有意义但通常短暂,这很容易地被认为是“愿望实现”。而在成人中间,产生梦的希望似乎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条件应当来自清醒意识之外——一种受压抑的欲望——或者至少应该是有意识的思维所未知的一种强制力量。假若没有上面解释过的那种意义上的无意识的存在,我将不能更进一步发展梦的理论或者说明在梦解析中得到的经验材料。这种无意识的希望活动对梦思想的合理的加工就产生了梦。这样,梦就被牵到无意识之中去,或者更确切地说,受到了无意识思想过程水平上的待遇并且具有那种水平的特征。

至今我们只是实际上熟悉无意识思想的特征来自梦工作的结果以及无意识思想与能够变为意识行为,即“前意识”的差别。

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相反的小说和深奥的理论很难通过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而清晰起来。我所能达到的成绩就是这些,因此,还是将注意力转向我在《梦的解析》一书和李普斯著作中对于无意识的全面论述,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是最重要的。我认识到任何受过良好的古典哲学教育的人或者在所谓的哲学系统中能独占一席之地的人,将会反对我和李普斯关于“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并且极力从心理学的定义上来证明它的不可能性。但是定义是传统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我经常发现那些认为无意识是荒唐的和不可

能的人们并没有从那些来源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而从这些来源中我至少有必要去认识它。这些无意识的反对者们从来没有亲眼目睹催眠术所带来的效果。但是当我把从催眠术精神分析中获取的例证告诉他们时,他们感到极为震惊。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无意识是人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已被强有力的证据迫使承认;借助无意识的东西来理解有意识的东西,而且通过人们目前没有想到过、没有处于他们注意力中心的东西迫使人们承认这个观点。他们也不努力通过对自己许多梦之中一个梦的分析来使自己确信头脑中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存在,当我试图和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时,他们在惊奇和困惑的同时才表示自己的赞同观点。我还发现这些人是我们接受“无意识”这一概念过程中的根本的情绪阻力,而且基于没有人想认识自己的无意识而轻而易举地否认它存在的可能性。离题的话之后我应再次转向梦工作了,梦工作把由希求心情引出的思想材料归为一种很特别的努力。首先,它从希求心情发展到陈述心情;它用“是”代替“或许是”,这种“是”的说法于是就成为幻觉的一种代表;而这正是被我在梦工作中称为“复归”的东西。这种复归正是从思想到感性表象的道路,或者利用人们尚未理解的精神结构,这种复归就是从思想领域向感性理解领域的复归。沿着这条与心理复杂化发展方向相反的道路,梦思想就会被赋予一种愈来愈清晰的图画:最后就达到了“梦图画”明显的核心也就是一种可塑造的情形。为了使梦思想的感性象征成为可能,梦思想的表达必须要经历一系列深远的变化。但是,当梦思想又变回到精神表象时在其中仍要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看起来是必要的,而另一些变化则令人感到意外。我们可以理解,在显明的梦里,作为复归而产生的次要结果,那些将思想连

结在一起的内部关系几乎要全部丢失。“梦工作”，对之我们可以如是说，它只能描绘出思想的原始材料，而不是互相支撑的逻辑关系，或者说梦工作至少有把这些逻辑关系排除在外的自由。另一方面，“梦工作”还有另一部分我们不能归之于复归、归之于改回到精神表象，而正是这一部分与我们关于诙谐形成的类推有重要关系。在梦工作过程中，梦思想的原料要经历一种极度的压缩或凝缩，梦思想中的共同因素提供了这种压缩或凝缩的起点，或是出于偶然，或是出于本性。由于这些通常不足以产生丰富的凝缩，所以梦工作自身又产生出新的人为的共同因素，为达此目的，人们就倾向于使用一些包含不同意思的词。新产生的凝缩的共同因素作为各种梦思想的代表进入到梦内容之中，这样，梦的一个因素就和梦思想的一个连结点或交叉点相对应，与后者相对照，梦的这个因素就通常应被描述为“超限定的”。凝缩是梦工作中最易辨认的那一部分，为了得到一个梦的凝缩的广泛性的良好印象，有必要将记录下的梦的本文和分析后得到的梦思想的记录进行比较。

要使人们相信由梦工作引起的梦思想的第二个变化不是件易事，这个变化过程我曾称之为梦的移位。它在以下事实中得以呈现：即那些在梦思想中处于一个边缘地位的事物，在显梦里却占据着中心地位并具有极鲜明的感觉强度，反之亦然。这个事实使梦在和梦思想进行比较时明显地处于被取代的地位，同时正是由于这种移位，梦对苏醒状态才显得是奇怪的，不可理解的。为了使这种移位得以发生，就必须使之有可能不受限制地从重要的观点通往不重要的观点——在正常的清醒思维中，这只会给人一种“错误推理”的印象。

表现可能性的转化、凝缩和移位可归结为梦工作的三项主要

功能。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很少予以注意的第四个功能,和我们当前的目的没有关系。如果“心理机构地形学”和复归的思想总是一贯前后相继(也只是在这一点上这些工作性假设才表现出一定的价值),我们一定要设法确定梦思想得以产生各种转变的复归阶段。在这方面我们还未做过认真的努力,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地说移位必定发生在思想材料之中,当后者是处在无意识过程的水平时,而凝缩则应被描述为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之上扩展到理解所能达到限度的一个过程。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必须假设参与梦的形成的所有力量在同时活动。尽管在处理这种问题时,我们往往持较保守的态度,而且有很多根本性的疑点在这里不能探究,我还是愿冒险断定,作为梦的准备的梦工作过程,存在于无意识领域。因此,不严密地说,人们可以区分出梦的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首先是白天残留的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在此过程中,必须具备控制睡眠状态的各种条件;其次是完全无意识中的梦工作;第三,梦材料向知觉领域的复归,在这过程中梦变成了意识。

以下力量可以被认为是参与了梦的形成:睡眠的愿望,被睡眠状态压抑之后依然附着于种种白天残留物的贯注能量;形成梦的那种无意识愿望的心理能量;以及那种在苏醒状态里占支配地位、在睡眠时也没有完全消失的理智审查的反对力量。梦的形成的首要任务是要摆脱理智审查的约束,这一任务正是靠梦思想中心理能量的移位才得以完成。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在研究诙谐时想到了梦。我们发现诙谐的特点和结果都被局限在一定的表达形式和技术手段之内了,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凝缩、移位和间接表达。我们已开始认识到那些同样导致凝缩、移位和间接表达结果的种种过程,

都是梦工作的特殊现象。难道这一点不正向我们表明诙谐工作和梦工作至少在某些基本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吗？我认为，梦工作已经向我们显示出了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特性。至于诙谐的精神过程，其中可以和梦工作进行比较的那一部分，即在某一个人身上形成的诙谐过程，反而晦暗不明。我们不会根据梦的形成而推理构造出诙谐的过程吗？梦的一些特点与诙谐是如此毫不相干，这就使得与之对应的梦工作也不能转移到诙谐的形成上去。毫无疑问，思想流向知觉的复归在诙谐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梦形成的另外两个阶段，前意识陷落为无意识及其无意识修正，如果可以假定在诙谐形成中同样发生，将正好提供了我们在诙谐中可以观察到的那种确切结果。让我们假定，第一个人这样形成诙谐的方式：前意识思想暂时转交给无意识修正，其结果即刻被意识知觉所把握。

在仔细考察这个假设之前，我们来考虑一个可能对我们的前提构成威胁的反对意见。我们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诙谐的技巧表明了我们所知的和梦工作特点相似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轻易地反驳这种观点，我们不该把诙谐的技巧描述为凝缩、移位等，也不该在诙谐和梦的表达方式间形成这样影响深远的一致性，如果我们先前关于梦工作的知识没有使我们对诙谐的技巧产生偏见。这样，我们实质上只是在诙谐中发现了一个期待的证据，我们据此从梦中对之做了探讨。如果这就是一致性的基础，那么除了我们的偏见之外，它的存在将没有任何确定的保证。凝缩、移位和间接表达也就不会被任何其他作者用来作为诙谐表达形式的解释。这是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但在这一点上却不是公正的反对意见。同样可能的是，在我们认识到真正的一致性之前，它也是使我们的

观点被梦工作的知识加强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决定毕竟只能取决于某项批判性考察能否在个别案例的基础上得以证实。然而,关于诙谐技巧的观点却是强加的,由此其他似乎更合理和深刻的观点却被压制下了,或者这种考察是否必须承认,从梦中获得的期待,能够在诙谐中得到证实。依我所见,我们根本不必惧怕这种批评,我们的“还原”程序向我们可靠地展示了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来寻找诙谐的技巧。如果我们要给那些已经预先发现了诙谐技巧和梦的工作之间一致性的技巧命名,我们是完全有权力这么做的,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极合理的简化过程。

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它不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论题,但也不能当作根本性的反证来接受。或许可以这样说,和我们的图式如此相适合的那些诙谐技巧的确应该被认识到,但它们既非惟一可能的技巧,也非惟一被运用的技巧。或许存在这种争论,即在梦工作模式的影响下,我们只是寻找那些与之相适合的诙谐技巧,而被我们忽视的那些技巧,恰恰能证明这种一致性并不永远存在。我的确不敢妄称自己在阐明每一种流行的诙谐技巧方面均已获得了成功,我坦率承认我对诙谐技巧的列举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并非将自己所熟知的任何一种诙谐技巧都排除在争论之外,我可以宣布,那些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典型的诙谐方法并未逃出我的注意。

诙谐还具有另外一个特点,它和我们从梦中获得的诙谐工作有着令人满意的一致。我们说,那的确是在“开玩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或提出反对意见时的行为是不同的。一种诙谐行为具有明显的成为一种观念的特点,这已经“不自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情况并非我

们不久前知道我们要开个什么玩笑,以及它需要用什么样的词语装扮起来。我们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对此我愿将之比做“失神”,一瞬间智力紧张的突然放松,而诙谐就在这一刻出现了——一般是被词语巧妙装扮起来的。有些诙谐技巧可以被用于表达思想之外的领域,比如类比或暗示的技巧。我可以有意地决定做一个引喻。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在内耳中直接表达我心灵中的思想;由于对外部条件的疑惑顾虑,我阻止了自己如实表述这思想,而以另一种间接表达的形式取而代之;这样我就给出了一个暗示。但是,在这种方式下产生的暗示,它自始至终有我的持续监督,因此绝不是一种诙谐,无论它在其他方面是多么适合。一种诙谐的暗示出现时,我的思想根本不能遵循这些准备阶段。我不想将这种行为看得太重,它极少是决定性的,虽然它和我们的假设是如此适合,即在诙谐的形成中,我们暂时失却了一个思想序列,而诙谐就在这无意识中突然产生。

在联想方面,诙谐也只有独特的行为方式。在我们需要时,它们常常不受记忆的支配;在其他的时候,作为补充,它们的出现也非出于自愿,在我们思想链条的关节点上,我们根本看不出它们的关系。这些虽只是微不足道的特征,却透露出它们的无意识根源。

现在让我们把那些在无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特点集合在一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诙谐的简洁性——虽然不是最根本的,却是极其鲜明的一个特征。在初次碰到它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具有节省倾向的表达,但因为明显的反对意见,我们放弃了这个看法。现在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统驭诙谐思想的无意识修正的标志。因为我们不能把梦中与之对应的东西,即凝缩作用,与无意识中定位之外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假定,凝缩作用中的决定

因素,尽管在前意识中不存在,却存在于无意识的思维过程中。^[1]可以预料,在凝缩过程中,少数依附于它的因素将会消失,而接受了前者贯注能量的其他因素则将通过凝缩作用而得到加强或过度加强。因此,和梦的简洁性一样,诙谐的简洁性也是凝缩作用的必然伴随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凝缩过程的结果。这个起源也能解释诙谐简洁性的特点,这是无法进一步定义但却令人深感惊奇的那种特点。

在稍前的一页中,我们将凝缩作用的结果之一——同一材料的多种应用,语词和语音相似性上的游戏——看做一个有定位的节省,把一个由单纯性诙谐中产生的快乐看做从该节省中获得。而后我们推断,诙谐的最初意图是从这种语词中获得大量这样的快乐——在游戏的阶段这是允许的,但在智力发展过程中,它便被理性批评所禁止。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了这种假设,即这种服务于诙谐技巧的凝缩作用,是在无意识的思维过程中自动产生的,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图。在此,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不就有两种关于同一事实的不能相容的意见吗?我并不这么认为。的确,这是两种不同意见,它们需要相互协调,但是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其中一种意见和另一种无关;当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时,我们或许能够推动知识的进步。凝缩作用是快乐的源泉这个事实和其产生的条件源于无意识这个假设绝非不能相容,相反,我们可以为在这

[1] 在梦工作和诙谐技巧之外,还有一种心理过程,我能在此事件中说明凝缩是一个有规律而又重要的过程,即正常的遗忘机制(非有意的)。独特的印象给遗忘带来了困难;那些在任何方面都很相似的东西由于凝缩作用而使这相似的部分被遗忘。相似印象间的混淆是遗忘的最初阶段之一(弗洛伊德在1907年《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一书第七章中的一个脚注里详述了这一观点)。

种情形下陷落到无意识找到一个理由,即需要诙谐的协助快乐的凝缩作用才能产生在那里是容易发生的。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它们乍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而且似乎因为某个极偶然的机会会合到一起,但是经过深入的考察会发现,它们其实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因素。我心里有两种观点,一方面,在游戏阶段的诙谐发展(即推理的不成熟期间),能够产生这些快乐的凝缩作用;另一方面,在更高级阶段,它们通过把思维嵌入到无意识中而完成同样的作用。因为童年期是无意识的根源,无意识的思维过程不是别的,正是在童年早期产生的那些过程——是一些独一无二的过程。为了形成一个诙谐而嵌入到无意识中去的思维只不过是寻找它先前做语词游戏的故居。思维暂时退回童年阶段,只不过是再次获得童年期的快乐根源。如果我们不是借助对神经症心理学的研究而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在诙谐的引导下产生一种疑虑,即奇特的无意识修正不过是思维活动的童年期标志而已。我们要在儿童身上捕捉这种童年期的思维方式实属不易,而在成人的无意识中保留了这些特点,它在出生时被纠正。但是,在很多情形下,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便嘲笑儿童的“傻”。任何诸如此类未得以发现的无意识材料,一般说来都像喜剧一样打动了我们。^①

从某些经受一定精神疾病折磨的患者的话中,很容易发现无

① 我的许多精神病患者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每当我成功地把他们隐藏的无意识向他们的意识知觉给出一个如实描述时,总是投之一笑来证实这个事实。甚至当所揭示的内容并不能证实这一点时,他们也笑。当然,这有赖于在医生探究到无意识材料并提供给他们之后,他们足以接近于并掌握这种材料时才会有效。

意识思维过程的特点。如果我们对它们停止施以意识思维的要求,运用我们的解释技术,像对待梦一样对待它们,那么我们就最有可能(像格里辛格很久以前所建议的那样^①)理解这种精神错乱,并将它们作为信息的片断加以利用。确实,我们已经证实了“梦中的心灵返回到胚胎的观点”。^②

关于诙谐和梦之间相似性的重要,在考虑凝缩过程中我们已经做了密切而深入的探讨,接下来我们可能力求简洁一些。如我们所知,梦工作中的移位指向意识思维的监控操作,相应地,当我们在诙谐技巧中遇到这种移位时,我们倾向于假设,在形成诙谐时同样有一种抑制力在起作用。我们知道,通常状况下确实如此。诙谐为了恢复胡说中旧有的快乐或语词中旧有的快乐所做的努力,发现自己在正常心境下受到批判理性产生的反对意见的抑制,而且在每一个别情境下都必须克服这一点。但是诙谐工作完成任务的方式显示出诙谐与梦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在梦工作中它习惯上用移位、观念的选择来完成任务,这些观念为使监控作用允许它们通过而与令人反感的观念保持足够的距离,但它们仍然是该观念的派生物,并通过彻底的移情^③作用而接受了它的心理宣

① W. 格里辛格(W. Griesinger, 1817-1868)曾经指出梦和精神病的愿望满足特征。他有一篇见解独到的论文多次被弗洛伊德提及。参见一位编者对弗洛伊德论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的论文(1911b)所做的脚注。

② 《梦的解析》(1900a, 标准版, 5, 591)这句话在该书中作为引文出现, 出处不详。

③ 当然,“移情”(transference)用在这里并不是常识意义上所用的一种心理治疗现象: 参见一位编者对《梦的解析》第七章所做的注解(标准版, 5, 562)。

泄。由于这个缘故,移位作用总与梦相伴随并更易于被理解。

包括在移位作用中的不仅有思维链条的转换,还有各种间接表达,特别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但令人反感的因素被一个无关紧要、看起来对监控作用无害的因素所取代,这个因素看来是对另一个因素的极遥远的暗示——被一种象征、一种类比、或某个小东西所代替。不容争辩,这种间接表达的一部分已存在于梦的前意识思维之中——例如,借助象征或类比的表达——否则,思维根本不能到达前意识表达的阶段。这种间接表达及暗示及其与所指事务的关系的确是易于为人发现的,是被容许的,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中极有用的表达方法。然而,梦工作把这种间接表达的方法扩展到超出任何限度。在监控作用的压力下,任何形式的连结都可以取代暗示,任何因素间的移位都是允许的。内在联系(类似、因果联系,等等)被外在联系(时间的同时性,空间的接近性,声音的相似性)所取代是梦工作尤为令人惊奇的特点。

所有这些移位方法看来也同样是诙谐的技巧。但是当它们出现时,它们通常很重视意识思维强加给它们的适用限制条件。它们也许全然不存在,虽然诙谐也有一个对抗限制的任务要完成。我们可以理解移位 in 梦工作中所处的附属地位,当我们记起诙谐总有另外一种技巧对抗抑制,除此我们不能发现其他更具特点的东西时。诙谐与梦不同,它不能产生协调,也不能逃脱抑制,但却始终坚持保留文字游戏或一成不变的胡说。它们自我限定,选择一种场合使得文字游戏或胡说同时出现(在俏皮话中)是允许的,或者(在诙谐中)是合理的。多亏了文字的模糊性和概念联系的多样性,什么也不如语言的两面性和两重性更能清楚地将诙谐与其他心理结构区分开来。从这个观点出发,当权威们强调“胡说的意

义”时,他们至少是接近了对诙谐本质的理解。

考虑到这种特别技巧在诙谐中克服抑制的广泛优势,可以认为,在特殊情境下也运用移位技巧是完全多余的。但是,一方面,一些技巧对诙谐而言仍具有快乐目标和源泉的价值——比如,移位作用(思想的转移),就的确具有胡说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不该忘记,诙谐的最高阶段,倾向性的诙谐,往往必须克服两类抑制,一类与诙谐本身相对立,另一类与诙谐的目标相对立。暗示和移位完全有资格使后面这个任务成为可能。

间接表达,移位,尤其是暗示在梦工作中的大量不加限制的运用,产生了一个我曾提及的结果,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成为我着手解决诙谐问题的主观原因。如果某人给一位无知或反常的人做一个梦的解析的解释,其中设计了奇怪的暗示和移位过程——在清醒生活中这是令人厌恶的——梦工作就利用了这些过程。读者于是获得一个不好的印象,并宣告说这些解释具有“诙谐的性质”。但是,他显然没把它们看做成功的诙谐,而是看做强迫性的,以某种方式违反常规的诙谐。解释这种印象很容易,它产生于如下事实:梦工作与诙谐使用共同的方法,但是在运用时它已超越了诙谐所尊重的限度。^① 我们很快便会知道,由于第三个人的作用,诙谐受到在梦中不存在的条件的限制。

① 本文要点弗洛伊德已包括在《梦的解析》第一版的一个脚注中(1900a)。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弗雷斯率先提出的,他曾看过本书的校本,弗洛伊德在1899年9月11日给他的信中,以几乎与上述完全相同的内容就这一问题作了答复。人们可能注意,在标准版的译文脚注中德文“witzig”一词被解释为“机智的和逗人发笑的”,在本书中(比如上文中)则通常用“带有诙谐的性质”来解释。

在诙谐和梦的那些共同技巧中,对立表达及胡说的应用引起我们的一些兴趣。前者是诙谐中使用的较有效果的方法,在“过分夸张的诙谐”这类实例中即可发现。顺便说一句,对立面表达不能像其他诙谐技巧一样逃避开意识注意。一个人若试图尽可能有意地使诙谐工作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比如一个职业水平的打趣者,一般说来都会很快发现,用诙谐答复一种主张的最简易途径就是说出它的反面,使之具有片刻的激励作用,这样他就能摆脱因自己的对立而引起的反对意见,对自己所说的话做出新的解释。或许对立面表达将它所享有的好处归功于这个事实,即它成为另一种表达思想的快乐方式的核心,这无须借助无意识即可理解。我想起了“讽刺”,它与诙谐如此密切,并包含在亚类喜剧中。它的实质在于说出一个人想向另一个人转达的反面,通过一个人的声调,某种伴随手势,或者(就写作而言)某些典型的表达方式,使人明白他所说的是反话。讽刺只能在另外一个人有听取反话的准备时才能运用,这样他就不会倾向于做出错误反驳。这种条件造成的后果是,讽刺尤其易于产生误解,它给运用它的人带来的好处是使其能够随时避开直接表达的困难,比如在骂人的话里——它带给听者以喜剧的乐趣,或许因为它在听者身上激起了矛盾,而瞬间又被认识到这完全没有必要。类似这样的诙谐和紧密相关的喜剧类型间的比较证实了我们的假定,即诙谐所特有的东西是它与无意识的关系,或许这能够很好地使其与喜剧区分开来。^①

在梦工作中,对立表达所起的作用甚至大于它在诙谐中的作

^① 可笑性的这一特点被描述为“乏味性”,依赖于表述及与之相伴随的手势(在该词最广泛的意义上)之间的差异。

用。梦不仅仅喜欢用一个相同的复合结构表达两个对立面,在梦思想中它经常把一些东西变为其对立面,这一点给解析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第一眼根本不敢断定在梦思想中包含对立的那些因素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个问题迄今还未得到承认,但是它似乎说明了无意识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没有任何类似于“判断”的过程发生。用判断代替拒绝,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的便是“压抑”。毫无疑问,压抑可以被描述为保护性反应和责难之间的中介阶段。^①

在梦中经常出现的胡说和荒诞行为,使梦处于不应有的轻蔑地位,从未通过混淆在一起的观念成分偶然产生。事实上,它总能表现出已被梦工作有意认可,在梦思想中表达辛辣的批评和傲慢的反驳。这样,梦内容中的荒诞行为便取代了梦思想中“这是一句胡说”的判断。^②我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对这一证据给予了重要强调,因为我认为这样可以对相信梦根本不是一种心理现象的观点给以最有力的回击——这种谬见阻碍了通往了解无意识的道路。现在我们在解决某些倾向性诙谐的过程中已经明白,诙谐中的胡说是被用以为同样的表达目的服务的。我们也知道,诙谐的无意义的假象是被特别乔扮以增加听者心理能量的消耗,从而增加通过笑而释放出来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绝不能忘记诙谐中

① 无意识中对立物之间十分惊人的、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关系行为无疑会帮助我们理解神经症和精神错乱病人的“逆反症”[有关该问题的后两部著作参见布洛伊勒(1904)和格鲁斯(1904),以及我的《原始词汇的反义》(1910e)——压抑是一种早期的消极判断形式这种说法在这里似乎是第一次出现,它常常在后面重复]。

② 参见《梦的解析》第六章第四节。

的胡说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为恢复胡说中旧有快乐的意图就在诙谐的动机当中。还有其他恢复胡说并从中获得乐趣的途径,比如漫画、夸张、模仿和歪曲都利用胡说而产生“喜剧性胡说”。如果我们对这些表达方式做一个类似于我们曾用之于诙谐那样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情况中没有一种能够产生我们意在对之做出解释的那种无意识过程。现在我们还可以理解,成为一种诙谐的特点是如何作为漫画、夸张和模仿的附加成分出现的。是“活动中的心理景观”中的一种差异使这成为可能。^①

我认为,将诙谐工作安置到无意识系统上去,现在对我们而言开始具有了令人震惊的重要性,它能使我们理解这个事实,即诙谐所公然依赖的那些技巧,在另一方面,并不是它们独有的财产。有些我们被迫推迟到后面作原始考察才能论及的疑问,现在可以发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另一个疑问也应引起我们注意。这个疑问认为,诙谐和无意识间不容否认的关系只对特定范畴的倾向性诙谐才有价值,而我们却准备将之扩展到任何种类和诙谐的任何发展阶段。我们绝不能回避对这种反对意见的考察。

可以确定地假设,诙谐产生于无意识,此时的问题在于诙谐是服务于无意识的目的还是服务于被无意识强化的目的——这就是最愤世嫉俗的诙谐。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目的把前意识的思想拖入无意识中,并赋予它一种新形式——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研究

① 这是费克纳(1889)所使用的一种表达式,作为对我的论点的支持,它已经获得其重要性(费希纳的“梦中活动的图像不同于清醒的观念生活”这一观点曾被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加以引用,作为对无意识和前意识心理过程间地形学划分的支持)。

教给我们做了大量对比的过程。但是在其他的情境下,倾向性诙谐、单纯性诙谐和玩笑中,这种向下拖曳的力量仿佛根本不存在,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于是便成了问题。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情形:一种本身并非毫无价值的思想,产生于思想序列过程,作为诙谐被表达出来。为了使这种思维转化为一种诙谐,显然有必要从那些可能的表达式中选择一种能带来语言乐趣的准确形式。我们由自省可知,这种选择不是由意识注意完成的,但它必定对选择有所帮助,假如前意识思想的投注减弱为无意识,正如我们曾从梦工作中所获知的那样,由语词发出的种种联系在无意识中被处理为与事物的实际联系完全相同。一种无意识投注能够为这种表达式的选择提供远为便利的条件。而且,我们可以即刻假定,包含有语言乐趣的表达式的可能形式,对犹疑不决的前意识思想语言所施加的向下拖曳作用,类似于它先前对无意识目标所施加的作用。为满足俏皮话的更简单情形,我们可以假定,一种全神贯注一心要获得语言乐趣的意图,抓住了前意识中的机会,按照所熟悉的图式,将投注过程拖曳到了无意识当中。

如果在一方面我有可能对我有关诙谐观点中的决定性要点提出较清楚的解释,另一方面我能以确定性的论证支持这一观点,那么我将无比高兴。但实际上我在此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两重失败而根本上就只是同一个失败。我不能给出更清楚的解释,因为我没有关于我的观点的进一步的证据。我是在研究诙谐技巧及与梦工作的比较的基础上达到这个认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基础;然后我发现,作为整体,它是如此完美地适应于诙谐技巧,于是通过推论便得出了这个观点。如果这种推论不是将某人引向一个熟知的领

域,而是相反,引向一个对他的思维而言是陌生而全新的地方,那么他就会称这种推论是一个“假说”,并直截了当地拒绝接受假说和由之而被推出的作为证据的事物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其他的途径到达,并且表明为其他联系的枢纽时,这种假设才会被认为得到了证实。但是这类证据根本没有,事实上我们关于无意识过程的知识才刚刚开始。我们站在一片从未被前人涉足的土地上,满意地、从考察者的出发点,探出我们孤独、短促而不确定的步伐,向着这片处女地迈进。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不可能建树太多,如果我们把各种诙谐阶段与对它们有利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俏皮话产生于快乐心境,这种心境似乎倾向于降低心灵的投注。俏皮话已经动用了诙谐的所有典型技巧,并通过选择那种满足产生乐趣与理性批评双重要求的语言材料或思想联系,来满足它们的根本性条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在快乐心境的配合下,思想投注向无意识的陷落,在俏皮话中已经存在了。至于和有价值思想联系的单纯性诙谐,心境的激励作用将不再产生效果。这里我们必须假定特殊的个人能力的情景,它很容易表明前意识投注暂时失落或转化为无意识。一种始终旨在恢复根源性诙谐乐趣的意图对依旧紊乱的前意识思想表达方式实行了向下的拖曳作用。无疑,绝大部分人在心境愉快时均能说俏皮话,但无论什么心境下均能制造诙谐的能力却只有少数人才具备。最后,诙谐工作最有力的激励来自于这样一些强烈目标,它们既代表一种产生诙谐的特别能力,又能向我们解释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如何在精神错乱病人那里经常得以实现。在这些强烈目标的影响下,甚至那些鲜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也变得诙谐起来。

最后的这个贡献,尽管仍不过是假设的,它对第一个人身上诙谐工作的解释,严格说来已结束了我们对诙谐的兴趣。这里还有待于我们在诙谐和较熟悉的梦之间作一个进一步的简短比较;我们可以期望,除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那种一致性,两种不同的精神功能只会昭示差异。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们的社会行为。梦是完全的社会性心理产物,它与别人没有任何可交流之处;它以诸多心理力量斗争的妥协形式产生于主体内部,即使对主体本人,它也是非理智的,因此对别人而言就更是索然无味。不单是它没有被可理解性存储的必要,而是它根本上就必须防止被理解,否则就破坏了它本身;它只能存在于伪装形式内。这样它就可以任意利用那些控制无意识思维过程的机制,到达一个歪曲之点,对之再也不能有直接的理解。另一方面,诙谐是所有心理功能中最具社会性的,它的目的在于引起快乐。它通常需要有三个人,它的完成也需要一个从一开始就处在一定心理过程的人参加。可理解性条件束缚了它,它只能通过凝缩和移位而在无意识中利用可能的歪曲,只要不超过第三者的理解力。另外,诙谐和梦产生于心理生命的如此不同的领域,必须被定位于心理系统的两个殊异的类别。梦仍然保留了一个愿望,即使是隐蔽的,而诙谐却是一种成熟的游戏。尽管没有什么现实的用处,梦依旧与生活的主要兴趣相关联:它通过幻觉的迂回来满足需要。夜间活动的需要——睡眠需要允许它们的出现。在另一方面,诙谐,它只想从简单活动中获取少许乐趣,不受我们心理结构需要的限制。之后,诙谐试图在心理结构的活动中将乐趣作为副产品来掌握,然后到达指向外部世界的并非不重要的功能。梦主要服务于避免不快,诙谐则旨在追求快乐,但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均会集于这两个目的之中。

第二节 诙谐和滑稽的种类

(一)

我们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接近了滑稽问题。看来诙谐作为滑稽的一个亚类有很多被直接攻击到的特性；所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避免把它与更多滑稽的范畴联系起来，虽然我们已获取了有可能阐明滑稽的一些线索。我们不难发现滑稽的社会行为与诙谐不同。它只需两个人便可满足，一个是发现什么是滑稽的人，另一个则被发现具有滑稽性。第三个人，被告知了滑稽事件，他能增强滑稽过程却不能再补充任何新东西。在一个诙谐中，这第三者是快乐产生过程的完成所必不可少的；但第二个人却可以不在场，除非是具有攻击性、倾向性的诙谐。诙谐被制造，滑稽被发现——首先也主要是在人身上，通过随后对事物、情境等的移情而实现的。就诙谐而言，我们知道那有待于助长的快乐源泉在主体内部，而不在其他人身上。我们同样已看到，诙谐有时能重新开发滑稽的已变得不可得到的资源，滑稽经常作为诙谐的假象为之服务，并取代通过别的技巧可以获得的那些先前乐趣。所有这些没有一点能够确切说明诙谐和滑稽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相反，滑稽的问题已证明其是如此复杂，哲学家们在解决它们方面所付出的全部努力是如此不成功，以致我们不能给出一个通过从诙谐方面出发而求掌握它们的前景。另外，我们在研究诙谐时带有一个迄今无人用过的工具——关于梦的知识。我们没有类似能帮助我们理解滑稽的东西。我们只能期待获得不多于我们已在诙

谐中发现的关于滑稽的本性，这不过是所谓它们是滑稽的一部分，并掌握了滑稽的不变的或略加修改的一定特性而已。

与诙谐最接近的一类滑稽是天真，像一般的滑稽一样，天真是在被发现的，而不像诙谐是被制造出来。实际上，天真根本不可能被制造，而在纯粹的滑稽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形，在这里某些东西被搞得有了滑稽性——滑稽的唤起。天真必须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在其他人的言语和行动中产生，这些人站在滑稽或诙谐中第二个人的立场上。如果某人丝毫不在乎某种禁忌，因为这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他毫不费力便能将之克服，此时，天真就出现了。当事人根本没有任何禁忌，这是我们应知道的一个产生天真效果的条件，否则，我们就不称其为天真，而称其为无礼了。我们不是对他发笑而是表示愤慨了。由天真引发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看上去不难理解。我们通常在禁忌上的消耗因为听到天真的话语而突然变得不起作用，并通过笑声释放出来。在这里没有必要分散注意，或许是因为禁忌的消散是直接发生的，而不必通过被激起活动的中介。在这里我们像诙谐中第三个人那样行为，不须付出任何努力，就被给予禁忌的节省。

根据我们沿游戏向诙谐发展的过程所获得的禁忌根源的见解，我们将毫不奇怪地发现，天真最经常发生在儿童身上，然后遗留在未受教育的成人身上，就他们的智力发展而言，我们可以称他们是孩子气的。当然，天真的话语比天真的行为更适于同诙谐作一比较，因为表达诙谐的通常形式正是话语而不是行动。儿童说出的话可以被描述为“天真的诙谐”，这个发现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诙谐和天真的话之间的一致性，以及不相似的理由，可以通过几个

实例向我们予以阐明。

一个三岁半的小女孩警告她的弟弟：“我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布丁，不然你会生病的，就必须吃‘布比珍’。”“布比珍？”她的母亲问道：“那是什么？”小女孩自我辩解道：“当我生病时，我必须吃药（麦地珍——音译）。”这个小姑娘认为当病人是个小姑娘时，医生开的药是“麦地珍”，而当病人是个小男孩时，医生开的药就是“布比珍”（Mādi——小女孩；Bubi——小男孩）。这种像言语诙谐的笑话是利用声音类似性的技巧构成的。的确它可以作为真正的诙谐出现，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愿以不情愿的一笑对之表示接受。作为天真的一个实例，它非常出色地打动了我们并引起笑声。在这里导致诙谐和天真的事物间出现差异的是什么呢？很明显不是语言或技巧，对诙谐和天真而言它只是同一样东西。而是这样一种因素，它乍看上去似乎与两者都非常遥远。我们是该假定说话者有意要制造一种诙谐呢，还是该假定那个孩子是在未经纠正的无知基础上试图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一种天真。在这里我们的注意第一次指向另外一个人，他将自己推入在说话者身上才发生的心理过程中。

如果我们考察了另一个心理过程，这个观点将得到证实。姐弟两人——一位12岁的女孩和一位10岁的男孩，在叔婶面前演出由他们自己编的戏。布景是海边的一间小屋。第一幕中，两位编剧兼演员，一位穷渔夫和他忠诚的妻子，正在抱怨世道的艰难和收入菲薄。丈夫决定乘小船穿过广阔的海洋去别处寻找财富。在两人缠绵的告别之后，幕谢了。第二幕发生在几年后，渔夫成了富翁，带着一袋子钱回家了。他告诉在屋外等候自己的妻子，诉说他

在异国他乡所交的好运。他的妻子很自豪地打断了他,说道:“我也没有闲着。”然后她打开小屋的门,在渔夫面前出现了十二个躺在地板上睡觉的大布娃娃……此时观众的轰笑打断了演员的表演,这对孩子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他们窘迫地望着喜不自胜的亲戚们,先前他们一直举止得当并且专注地听着。笑声可以用这种假设解释,即观众设想小作者还不了解孩子生育的主宰条件,以为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时妻子也能为所生的孩子感到自豪,丈夫也为之感到高兴。作者在这种无知基础上创作的东西可以被描述为胡扯或荒唐。^①

第三个实例将向我们展示另一种技巧,我们在诙谐和天真中对之已有所熟知。一位法国妇女被雇来看护一个小女孩,但未征得小女孩个人的同意。新来的人刚离开屋子,小女孩就大声批评道:“那是位法国妇女吗?她可以说她是位法国妇女,因为她曾经站在——位法国男人的身边!”这或许可算是一种诙谐——甚至还是个不错的诙谐(双重意义或暗示,带有双关语),如果这个孩子对双关语有最起码的概念。事实上她只不过是要向陌生人转达她不喜欢用一种滑稽的方式把一件东西描述为不真实的,这一点她常听到:“那是真金吗?它可能放在金子旁边。”这个孩子的无知完全改变了她理解听众的心理过程,她的话成了天真的话。由于这个条件(这个孩子必须是真的无知),存在着误导天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孩子不再无知;孩子们常常表现出天真,以此来享有那种否则便得不到的自由。

^① 这个利顿伯爵一世的孩子们的故事曾经在不同背景下被讲述 参见 G.W.E. 拉塞尔的《文集和回忆录》(1898)第三十二章。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阐明诙谐和滑稽间的天真所占的地位。言语中的天真和诙谐在用词和内容方面是一致的,它引起词的误用,一种胡说,或一种猥亵语言。然而在第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过程,曾在我们身上引起如此多的兴趣和有关诙谐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在这里却完全不见了。一个天真的人以为他正常而简单地运用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序列,他的心中没有保留的想法,他也不从制造某些天真事情中获得乐趣。天真的这些特点除了在听者那里外根本不存在,这里的听者相当于诙谐中的第三者。另外,产生天真的人毫不费力便做到这一点。在诙谐中用来使来自理性批评的禁忌失去作用的那个复杂技巧他不具备;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禁忌,所以他可以直接而毫不妥协地胡说,说出粗鄙的话。在这方面,天真是诙谐的一种边缘情况。如果我们把监控作用降为零,天真便会在这种构造诙谐的程式中产生。

两个人应服从大致相同的禁忌与内部阻抑,这是诙谐有效性的一个条件,在天真中我们看到的是只有一个人有禁忌,而另一个人没有。对天真的理解在于被给以禁忌的那个人,他独自获得天真所带来的乐趣。我们已接近于猜测乐趣来自于禁忌的解除。既然来自诙谐的乐趣有同样的根源——一个语言乐趣及来自胡说的乐趣的核心,——一个解除禁忌或释放心理消耗快乐的外表——这种与禁忌的相似关系可以解释天真和诙谐间内在的密切联系。在它们当中快乐产生于内部禁忌的解除。

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是远为复杂的,这是指天真的情况,而和诙谐制造者相比它又是简单的(顺便说一句,在天真的情况下,我们的自我和接受者是一致的,而在诙谐情况下,我们可能占据制造者的位置)。当接受者听到天真的某事物时,必定一方面像诙谐一样

对他产生影响——我们的例子精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和诙谐一样，他只须倾听就可以解除监控作用。但是能作如此解释的只是天真所产生的部分快乐，而且即便如此，在某些情形下这也是有风险的——比如当听到一句天真的猥亵语言时，如果不是因为另一个使我们免于气愤的因素及同时由天真提供给我们的更加重要的快乐，那么我们可能立即做出像对待真正的猥亵语言那样的愤怒反应。这个另外因素我们已经提到，为了接受天真，我们必须明白在制造者那里内部的禁忌是不存在的。只有这一点确定之后，我们才会以笑代替愤怒。于是我们将制造者的心理立场考虑在内，将我们自己投入其中，从我们自身与之比较中进行理解。正是这些感情移入和比较过程导致消耗的节省，而我们以笑声将之释放。

还有一个可能的更简单解释——另一个人没有必要克服禁忌，这使得我们的愤怒变得多余。在这种情况下，笑声的出现是以节省愤怒为代价的。为了阻止这种总起来讲是误导的观点，我将在以上已处理的两种情形间作一严格区分。我们所遇到的天真既可能具有诙谐的性质，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可能具有猥亵语言的性质（或总而言之令人不愉快的性质），特别是当它不是在语言中而是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时，后者将出现。第二种选择的确是误导，可以设想，就此而言，快乐起于节省和转换的愤怒。但是第一种选择能更清楚地说明事物。一句天真的话——比如“布比珍”——其本身表现得就像一种小小的诙谐，而且不会引人发怒。这种选择当然是不经常的，但它更纯粹，更富于启发性。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孩子已经严肃而毫无保留地相信，在“药”（Medizin）这个词中的“Medi”，等同于她自己的名字“Mädi”，我们

的快乐在听到这句话时得到了加强,它不再和诙谐中的快乐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来看两种观点——一种是发生在小孩身上的方式,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方式。在作这一比较时,我们发现孩子找到了同一性,并且克服了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羁绊。然后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对自己说:“如果你选择了理解你所听到的东西,你就能节省下为保持这障碍需付出的消耗。”类似于这样的比较中被释放的消耗,是天真中快乐的源泉,它借助笑声释放出来。附带说一句,如果我们对制造者所说的话的本意没有理解,这种快乐便会被我们转化为愤怒。但如果将天真的诙谐作为另一种选择的模式,关于令人讨厌的某种天真事物,我们将看到从这种比较中也能直接产生出禁忌的节省,对我们而言根本没有必要假定一种开始而后又被抑制的愤怒。这种愤怒实际上只在另一种方式上与释放的消耗相对应——与诙谐的情形相比,复杂而具防御性的设施成为必需。

通过将某人自己置于制造者的心理过程上而行的比较和消耗的节省,只能宣称对天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如果它们并不只在天真中被发现。在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疑惑,实际上,这种与诙谐完全相异的机制,也许是滑稽中的心理过程的一部分或基本部分。从这个观点看——无疑这是天真最重要的方面——天真自我呈现为滑稽的一类。我们附加到诙谐快乐上的天真话语实例中的特别因素是天真的快乐。一般地,我们应倾向于假定,天真的快乐是在他人话语与我们自己比较中从节省的消耗中产生的。但是,既然这引导我们进入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将首先总结我们关于天真的讨论。天真,就它产生于由试图理解他人而引起的消耗中的差异而言,应该算是滑稽的一类。在服从于比较中节省的消耗必须是

禁忌的消耗这个条件上它将接近于诙谐。^①

让我们迅速在我们刚刚达到的及在滑稽心理学中早已熟悉的概念间增加一些共同和差异的见解。将某人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试图理解他不过是“出借滑稽”，自琼·保罗参与滑稽分析以来。别人的心理过程与我们自己的比较对应于一种“心理上的对立”，先前我们在诙谐中不知该如何处理它，在这里可以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我们对滑稽乐趣的解释与一些权威解释完全不同。那些权威认为滑稽乐趣产生于人们在两个对立的观念之间的摇摆不定。对我们而言，类似这样的乐趣机制似乎是不可理解的。^②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对立间的比较，发生了消耗中的不同，如果不是被用于其他目的，这样它就变得能够释放并因而成为一种快乐源泉。

当我接近滑稽本身的问题时，我只是感到困惑不安。在许多卓越思想家的著作总体上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之际，期待我的努力能够对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的贡献，这是过于冒昧了。我的意图只不过是沿着被证明对诙谐有价值的思路在滑稽范围内向前迈出一小步。

首先，诙谐是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无意发现而出现的。它在

① 在我已写过的东西中，我一直区分“天真”与“天真的滑稽”，这并非任何情况下均能被接受。但是对我们旨在研究“天真的滑稽”和“天真的猥亵话语”中天真的特性这个目的而言，它已足够了。任何进一步的研究都将唤起我将这作为关于滑稽所做解释的基础加以运用的注意。

② 伯格森也反对关于滑稽由此派生的观点，很明显，这种观点受了力图与逗乐引起的笑相类比的影响；他用了一些很好的论点支持自己的观点——李普斯对滑稽的快乐所做的解释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根据他的意见，滑稽是一件“小得无法预料的”事情。

人们身上出现——即出现在人们的运动、方式、行动和性格特点上。起初,它可能只表现在人们的生理特性上,后来,才表现在精神特性上,或者表现在那些情形的表达方式里。通过通常的拟人化手段,动物也开始变得滑稽了,无生命的东西也如此。同时,如果能分辨出一个人看上去滑稽可笑的那些条件,就可以将滑稽与人分离。情境性滑稽就是如此产生,这个认识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即将某人置于一种情境,在那里他的行为必须服从于滑稽的条件,这样他就变得滑稽起来。一个人具备使他人滑稽的力量,这一发现为一种梦想不到的滑稽乐趣开辟了道路,并成为高度发展的技巧的一个根源。一个人也可以像别人那样容易地使自己滑稽。使人变得滑稽的方法是:将他们置于滑稽情境中,模仿、伪装、解下面具、漫画、滑稽模仿、歪曲等等。显然,这些技巧可用来服务于敌意和攻击的目的。一个人可以为使某人渺小卑劣而使其滑稽,并剥夺他获得尊严和权威的要求。但是,即使这种意图习惯上是使人滑稽可笑的基础,但却未必是自发性滑稽的意义。

产生滑稽的这种不正规的看法将向我们表明,滑稽的起源极其广泛,不能预期它具有在天真中发现的这种特殊情况。为了掌握对滑稽有用的决定性条件的踪迹,最重要的事情是入门性案例的选择。我们将选取动作滑稽,因为我们记得那种最原始的舞台表演——哑剧——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引我们发笑的。我们为何会对小丑的动作发笑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表演太夸张而不适当了。我们在笑一种过大的消耗。现在让我们寻找滑稽之外人为设置的决定性条件——在那里不用有意便可找到。一个孩子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滑稽,尽管他也踢也跳。另一方面,当儿童学习写字时,追随着笔的移动而吐出舌头时,便

是滑稽的。在这些联想动作中我们发现有一种多余的动作消耗，因为我们做同样的动作时不会做出这些动作。类似的，其他这类联想动作，或只是夸张的表达方式，若在成人身上出现我们也认为是滑稽。这种纯滑稽的例子还可以在玩保龄球的人的动作中发现，他在把球扔出去以后，仍然追随着球出去的方向，就好像他仍然能继续指导它。这样看来，所有的做鬼脸也都是滑稽，它夸大了正常化的情绪表露，即使是不经意而产生的。比如圣·维吐斯(S. Vitus)的舞蹈(舞蹈症)患者。同理，一位现代指挥的充满激情的动作也被那些不懂音乐的人认为是滑稽，他们不能理解这些动作的必要性。的确，正是从动作滑稽中分离出体态滑稽和面部特征滑稽，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夸张或无意义动作的结果。张大的眼睛，垂到嘴边的鹰钩鼻子，向外直长的耳朵，驼背，所有这些或许只在被认为这些动作产生这些特征是必不可少的时候才可能产生滑稽效果。在这里人们将鼻子、耳朵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想象得比实际上更有可动性。无疑，如果某人能来回摇动他的耳朵，那是滑稽的，如果他能上下翘动他的鼻子，那更滑稽，许多由动物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滑稽效果，来自于我们在动物身上知觉到的这些动作，这是我们自己无法模仿的。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其他人的动作夸张而又不适当时，我们怎么要笑呢？通过我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动作和我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会做的动作之间的比较，我这才相信相比较的两个事物当然须用同样的标准加以判断，这个标准就是我内心精神的消耗，它和我对这两种情况下运动的看法有关，这个观点有待于阐释和扩展。

在这里我们所比较的一方面是我们具有某种观念时的心理消耗，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所涉及到的事物内容，我们的观点是：

前者一般说来在理论上并不脱离于后者,观念的内容、特别是大事物的观念比小事物的观念需要更多的消耗。既然这只是有关不同大小动作的观念的事情,那么对我们的观点或通过观察予以证明给出理论基础就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将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性质和我们所具有的观念的性质是一致的,尽管心理学规律警告我们要抵制这种混淆。

通过自己做动作或模仿,我获得了一个有关特别尺度动作的观点,通过这个活动,我知道了自己内部感觉运动的一个标准。^①

现在,当我在他人身上观察一种类似于此的或大或小的行为时,对我来说达到理解(统觉, apperception)的最安全方式就是通过模仿把它产生出来,然后我就能从比较中确定我在哪种行动上的消耗更多。模仿的这种冲动无疑存在于动作的知觉中。但是我实际上进行的模仿不过是我学会阅读时把词拼出来一样。我不是用我的肌肉来模仿这种动作,而是通过消耗在类似动作上的记忆痕迹的中介而产生对它的一种观念。观念或思维与行动或表演不同,主要在于它把较小的能量贯注转移并抑制了主要消耗的释放。^②

① 内部感觉记忆将保留为我有关运动观点的主要方面,我的精神生活中将永远有思维模式,其中这种观念只能借消耗得以表达。在其他情况下,这个因素可能被其他因素所代替——比如,行动目标的视觉图像或语言图像。在一定种类的抽象思维中,一个象征便将足以代表这个观念的全部内容。

②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表述了这个重要原则,虽然可能不如这里表述得清楚。早在18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部分(18)中就用准神经病理学术语讨论过它。其要点曾经在《心理机能的两个原则》(1911b)的论文中再次非常清楚地阐释过,在以后的许多文章中,例如《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1933a)第三十二讲中他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数量因素——关于观察到的行动的或大或小尺度——是如何在观念中得以表现的呢?如果观念中并没有数量表现,它是由质量构成,那么,我又如何区分大小不同的动作观念呢?我怎样能够做出各种事物依赖于此的比较呢?生理学为我们指出一条出路。它告诉我们,即使在内观念过程中,也有通向肌肉的神经力量,虽然它们只相当于轻微的能量消耗。^①现在可以相信,这种伴随着观念过程的心理能量是被用来表达观念的数量因素的:即大动作的观念大于小动作的观念。这样一来,较大动作的观念实际上也就是较大的,也就是说,它伴随着较大数量的能量消耗。

直接考察显示,人类有一种通过观念模仿中变化的能量消耗来表达他们观念中大小性质的习惯。

普通人或一个民族中的一名孩子或成人,在讲述或描绘某种事物时,我们不难看到,他不满足于用浅易的声音或词语向听者朴素地表述,而总要将主要事实用自己的表现性动作表达出来。他将哑剧和表达的语言形式结合起来。他特别地展示或论证数量和程度:“一座高山”,他将手举过头顶;“一个侏儒”,他将手靠近地面。或许他会打破自己用手进行描述的习惯,那他就会用声音描述,如果他进而抑制了自己的声音,那么在描述某种大东西时,他就会睁大眼睛,而在描述某种小东西时,则会闭上眼睛。他所描述的不足他的感受,而是他所具有的观念内容。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定吗?即对模仿的需要只是产生于交流的要求,而不管大部分表达的方式已避开了听者的注意这个事实。

^① 对本文所包含的这些观念的考察或许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

恰恰相反,我相信即使这种模仿不那么鲜明生动,它的存在也在任何交流之外。当主体在他个人意义上形成关于某物的一种观念或图像式地想象某一事物时,模仿就产生了。于是他就用自己的身体表达“大”或“小”的观念,正如用语言表达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精神特征和感觉器官的变化。我甚至可以相信,与他头脑中的观念内容相当的躯体神经支配,可能是出于交流目的而进行模仿的起源和开端。为了服务于该目的,它只须被强化或引起别人的注意即可。如果我支持“情绪表达”的观点,它作为心理过程的身体伴随物而广为周知,那么,还应该补充上“观念内容的表达”,我能够清楚地发现我关于大小范畴的论断丝毫未损害这一主题。甚至在到达紧张现象之前我自己也能补充一系列观点,一个人是通过这种紧张而在身体上表达他的集中注意及当下进行的思维抽象水平的。我视此事为极其重要,我相信如果继续探究观念的模仿,那么它在其他美学分支上会像在这里对于理解滑稽同样有用。

现在回到动作的滑稽上去,再重复一遍,当某一特别动作被知觉时,就会借助于某种能量的消耗而发出形成该动作之观念的冲动。因此在“试图理解”,即统览这种动作时,我付出了一定的消耗。在这个心理过程中,我像是把自己置于被观察者的位置那样精细行事。我在心中记住这个动作的目的,早期的经验使我能够估计出达到目标所需的消耗量。在做这一切时,我抛开了我正在观察的这个人,仿佛是我自己要达到这个行动的目的。在我的想象中的这两种可能性相当于被观察的动作和我自己的动作之间的比较。如果另一个人的动作是夸张而不合适的,那么我为了理解它而逐渐增多的消耗就会在初始状态,即发动该动作的活动中便

受到抑制。它被宣布为是多余的,或者可被用作别的用途或干脆通过笑释放出来。这就是其他有趣的情境中滑稽动作中的快乐产生的方式——在和自己的行为比较时变得无用而多余的一种内部神经消耗。

能够发现,我们的讨论必须在两个方向上进行:首先,建立支配剩余物释放的条件;其次,考察其他滑稽可否被看做与动作滑稽具有同样的方式。

我们将先考虑第二个问题,并且将从动作滑稽转向在人的理智机能及他人性格特征中发现的滑稽。

我们可以选择滑稽胡说作为该类别的一个样本。在考察中它由无知的候选者产生,无疑,要给出性格特征的简单实例会更困难。我们将不再困惑,如果我们发现,经常产生滑稽作用的胡说和愚蠢,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被看做是滑稽,正如同样的性格特点在一种情况下被看做滑稽可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令人感到鄙俗可恨。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的这个事实只不过指出,除了我们已知的能够从其他联系中追溯出来的比较因素外,其他因素也参与了滑稽的产生。

在某个其他人的理智或心理特征中发现的滑稽因素,仍然是他同我自己之间比较的一种结果,尽管令人困惑的是,这种比较一般说来产生的是和滑稽动作或行动相反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付出了比我认为我将需付出的更多的消耗,那么,这就是滑稽的。对心理机能而言,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某人节省了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消耗(因为胡说和愚蠢是机能的无效表现),那么这就是滑稽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之所以笑是因为他克服了太多的麻烦,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他用劲太少。所以,滑稽

效果显然依赖于两种能量贯注的消耗间的差异^①——通过“移情”而估计出来的某人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消耗间的差异——不在于差异倾向于哪一方。但是,当我们牢记我们肌肉活动的限制和理智活动的增加适应于我们朝向更高、更文明水平的个人发展时,这种乍一看混淆我们的判断的特性就消失了。理智消耗的增加会同样达到减少运动消耗的结果。我们的机体提供了这种文化成功的例证。^②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对这个事实做出一致解释,在和我们比较时,如果一个人身体机能消耗太多而心理机能消耗太少,那对我们而言就是滑稽的,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笑声都表达了一种快乐的优越感。如果两种情境中的关系倒转过来,即与我们相比,其他人的身体消耗太少,心理消耗太多,那么我们就不再发笑,而是感到诧异和崇敬。^③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滑稽乐趣的根源,它由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比较而引发,来自于我们自己身上的生理消耗和通过移情而期待在别人身上发生的消耗间的差异。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它也许是最重要的。我们业已知道,可以无视别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比较,只从移情或证明为优越感与滑稽乐趣间没有丝毫实质关系的我们自身的过程来导引出快乐的不同。不过,就快乐的产生而言,比较

① 这里的德文词是“Differenz”,不是通常的“Unterschied”。它是用在数学上的术语,意思是“数量的”,而不是性质的差异。英文词必须包含这两个意思。

② 正如谚语所说:“一个人头脑中没有的东西,必定在其腿上有。”

③ 滑稽的决定性条件遍布了矛盾——滑稽乐趣的根源有时是过剩有时是不足,这个事实使问题变得混淆不堪了。参见李普斯《滑稽性与幽默》(1898)。

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发现快乐的产生在两种消耗贯注间进行,这两种消耗贯注是密切相连且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或者通过移情到作为他者的我们那里、或者在任何关系之外,只在我们自身的精神过程中产生。

这些情形中的第一种——在那里他者仍起作用,虽然不再与我们自己进行比较,当消耗贯注中的快乐的差别通过我们可以称为一种“情境”的外部影响而产生时,这种情形就发生了。因为这个原因,这类滑稽也被叫做“滑稽情境”。产生滑稽作用的那个人的性格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起根本性作用,即使我们承认,处于同样情境下我们也会有同样的举动,我们~~还~~笑了,这里我们从个人与常常是过分强大的外部世界间的关系中提取滑稽性;涉及到人的心理过程,这个外部世界还包括社会习俗及必要性甚至他的身体需求。后一类的典型例子是,在一个对人的心理能量存在要求的行动中间,这个人突然被疼痛或大小便的要求所打断。通过移情,相反的情况向我们提供了滑稽的差异,这差异存在于被打断之前这个人所带来的高程度兴趣和被打断时他留给心理活动的微量兴趣之间。这个向我们提供差异的人因其较次要地位对我们一再变得滑稽可笑,他的次要地位不存在于他和我们的比较之间,而存在于他和自己先前的自我的比较之间,因为我们知道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们也只能像他那么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是在有移情作用的地方才发现某人被置于一种较低滑稽的地位——即只针对别人而言,如果我们自己处于同样情形,我们只会体会到某些痛苦情绪。或许只有通过把这些情绪从我们身上驱除掉,我们才能享受起于变化的贯注比较中差异的那些乐趣。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贯注转换中发现的滑稽的另一个根源,存

在于我们和未来的关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我们的期待观念预期未来。我假定在我们的每个观念中都存在一个定量的消耗——在失望的情况下,这种消耗就被某种确定的差异削弱了。这里我重又记起先前我曾作过的关于“概念模仿”的评述。但是我认为在期待情形下证明一种贯注能量的激发更容易一些。显而易见,在很多情形下期待表现是由动力准备形成的——首先是那些期待行为要求我们动力的情形——而且这些准备可以立即在数量上加以确定。假如我期待抓住一个向我掷来的球,我便使我的身体处于紧张状态,以适应球的冲击力。如果球被接住时太轻了,我的多余的动作便令观众感到滑稽了。我使自己受我的期待的引诱而做出夸张的动作消耗。假如我从篮子里拿起一个我断定为很重的水果,但令我失望的是,这是个假水果,是空心的,用蜡制成,那么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我的手高举起来,暴露出我为此目的而准备的过大神经消耗——我为此成为笑料。至少有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对动物的生理实验,用测量的方法直接证明对期待的消耗。在巴甫洛夫的唾液分泌实验中,各种食物摆在狗的面前,在狗身上装有唾液漏管,分泌的唾液的多少根据实验条件即摆在狗面前的食物是增强了狗想吃这些东西的期待,还是令它感到失望。

即使所期待的东西对我的感官而不是运动提出要求时,我也可以假定期待是通过某种运动的消耗表达出来,这种消耗旨在使感觉紧张起来并收回其他未被期待的紧张。一般来说,我把一种注意的态度看做与某种消耗等同的运动机能。我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前提,即期待的准备活动将不与被期待的印象的重要性无关。但是,我将用一种或者更大或者更小的准备性消耗模仿地表现其大小,就像在进行交流时有期待伴随的思维中一样。然而,期待

的消耗是由几种成分集结在一起的,在我感到失望时也将包含几个要点,不仅包含所发生的事情是否比所期待的更大或更小,而且包含它是否值得我在期待上消耗很大的兴趣。在这种方式下,或许我将被引导在考虑表现大小(观念模仿)的消耗之外,还要考虑使注意紧张的消耗(期待消耗),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情况下用于抽象的消耗。但是,这些其他种类的消耗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大小的消耗上去,因为那些更有趣、更崇高、更抽象的事物只是带有特别性质的更大事物的特殊案例。根据李普斯和其他作者的观点,如果我们将数量的(而不是质量的)对比看做滑稽乐趣的主要根源,那么我们将为选择了动作的滑稽作为研究的起点而感到由衷高兴。

作为对康德“滑稽是一种虚无期待”论断的解说,李普斯在他为我们时下经常引用的文章中,试图从期待中导引出滑稽乐趣。尽管这个企图带来很多富有启示的有价值的发现,但是我还是要对其他作者的批评表示支持,那就是李普斯将滑稽根源的领域搞得太窄了,而且他必须花很大气力才能把滑稽的种种现象囊括在这个程式中。

(二)

人们并不满足于享受他们在经验中碰到的那些滑稽性,他们还要有意地让滑稽产生,如果我们研究了使事物变得滑稽的种种方式,那我们将知道更多滑稽的本性。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为逗别人发笑在与自我的关系中产生滑稽是可能的——举个例子,通过使自己变得笨拙或愚蠢。在那种方式中,一个人通过满足导致消耗差异的比较条件而产生滑稽效果,仿佛他确确实实就是那个

样子。但是,这种方式不会使某个人变得可笑或鄙俗,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会得到别人仰慕。如果别人知道他不过是在做戏,那么在别人身上就不会出现这种优越感。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例证,即滑稽对优越感来讲是根本独立的。

至于令别人滑稽可笑,主要的方式是把他们推向一种情境,在那里这个人变得滑稽,因为人们只是依赖于外部环境,特别是社会因素,无论这个人的个人特点如何——也就是说,通过运用环境的滑稽性而使人变得滑稽可笑。这种将人置于滑稽情境的方式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实际的玩笑)——伸出一条腿将某人绊倒,好像他腿脚不灵似的;通过利用某人的轻信而使他显得愚蠢,或者试图让他相信某件荒谬之事等等——或者也可以通过语言或游戏来模仿。使一个人变得滑稽通常有助于攻击性,以下的事实给攻击性以很大帮助,滑稽的乐趣并不依赖于滑稽情境的现实性,这样每个人实际上都不设防地处在成为笑料的情境中。

但是,还有其他值得特别注意的使别人滑稽可笑的方式,同时它们也部分地说明了一些新的滑稽性乐趣的来源。比如,模仿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它远远不同于漫画中的夸张手法,它依然给听者以特别的乐趣,并使它的对象变得滑稽可笑。漫画的滑稽效果要比简单模仿更容易找到一个理由。漫画、模仿和歪曲(就如它们的现实对应物,揭去伪装)直接与那些要求权力和尊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崇高的人或物相对。^① 它们是贬低程序,如同德文词(Herab-

^① 德文词在这里是“erhaben”,在美学中可接受的英文翻译是崇高的(sublime)。然而,在人的情形下使用这一解释是困难的,故必要时,我们用“地位高的”一词代替。

setzung)所表达的意义。^①所谓崇高是一些在身体或心理意义上的大事物。我想说明,或更确切地说是重复我的说明,和身体的大一样,心理的大是通过增加的消耗表达出来。稍加考察就可断定,当我说某物是崇高之时,我用不同的方式支配我的语言,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我竭尽全力使自己和我对之有某种观念的崇高相谐调。我给自身加上一种神圣的约束——与我要谒见一位名人、一位国家元首或一位科学巨匠时并无二致。当我假定相应于增加的消耗我的内心不同的观念模仿时,我很少出错。当我前进于思维的抽象序列而不是习惯上具体而可塑的观点时,无疑会发现这类增加的消耗的第三种例子。于是,当我为贬低崇高而进行的讨论过程允许我对之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似乎它不过是普通的,我不须如临大敌,而完全可以“放松”——套用一句军事术语,当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节省下那要增加的消耗;另外,由移情而引发的新的观念方法和先前习惯的那一种——它总试图自我确证——两者间的比较再一次产生了可以通过笑得以释放的消耗间的差异。

众所周知,漫画通过在一般印象上的移情而引起贬低效果,这种一般印象是如此被给予的,对象本身就有一个带滑稽性的特点,这个特点若不与整个画面联系起来就注定会被忽视。通过将这个特点分离,一种波及整个对象的滑稽效果就在我们记忆中达到了。这须服从一个条件,即那个崇高的事物的在场并束缚我们处于对它的崇敬态度。如果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种滑稽性,漫画就会毫不迟疑地通过夸大一个本身毫不可笑的东西来创造出这一特点,

① “贬低”,A. 贝恩的《情感与意志》(1865)写道:“在不激起任何其他强烈情绪的情形下,滑稽情境是对端庄体面的人或兴趣的贬称。”

这种对真实性的伪造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漫画的效果,这个事实又一次成为滑稽根源的暗示。

模仿和歪曲通过另外的方式达到了对崇高事物的贬抑:通过摧毁我们所知道的人们的品格和他们的言行间的一致性,通过以较次要形式代替名人或他们的言论。在这方面它们与漫画迥然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存在于它们产生滑稽乐趣的机制里。同样的机制也在揭露伪装中运用,这只用在当有人攫取实际上不属于自己的尊严和权威时。我们已经在诙谐中碰到了揭露伪装的滑稽效果的一些实例——比如,在那个首次生小孩的贵夫人的故事里,当她喊“啊,我的上帝”时,医生并不理睬她,直到她哭叫“啊啊——噢噢——啊啊——噢噢”时,医生才予以理睬。现在熟悉了滑稽性的特点,我们就不必再争论不休,这个趣闻实际上是揭露伪装的滑稽的实例,它没有正当理由被称为诙谐。它只是通过背景和“借助微小事物进行表达”的技术方法才产生诙谐。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喊叫是治疗的足够暗示。然而,如果我们要对这类故事做个判断,我们的语感不会遇到任何反对将之称为一种诙谐。我们可以对此条件反射般地做如下解释,即语言的用法并不基于对诙谐本质的科学洞察,我们通过辛勤的考察才达到这个本质。既然诙谐的功能之一是使隐藏的滑稽性源泉再度可被达到,那么按粗略的类推,任何使不明显的滑稽性得以暗示的策略,均可被称为一种诙谐。与其他使人滑稽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揭露伪装。^①

^① 因此,滑稽的每一次有意识的或巧妙的引起(无论是沉思的滑稽或情境的滑稽)一般地都可被描述为一种诙谐。当然我们还不能在这里运用这种诙谐概念(李普斯,1898)。

在“揭露伪装”的标题下,我们还可以包括使我们熟悉的事物变得滑稽的程序——那种通过将注意力导向人所共有的弱点,特别是紧密依赖于生理需要的精神机能而贬抑某人的崇高性。揭露伪装在这里等同于某种告诫,所谓这样的被奉若神明的人,只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常人。这里所付出的努力只是要揭示单调的心理自动作用,它隐藏在财富和明显的心理功能自由的背后。在婚姻代理人的笑话中我们碰到过这类揭露伪装的例子,并对这些趣闻是否有资格被看做诙谐存有疑虑。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确地断定,应声虫的轶事强化了婚姻代理人的所有主张,并最终肯定了他用“好大的一个驼背”而对新娘是个驼背的承认——这件趣闻基本上是个滑稽故事,一个心理自动作用揭露伪装的实例。然而,在这里这个滑稽故事只是一个假象。对任何一个注意婚姻代理人轶事的背后意义的人而言,全部事情是一个令人赞赏的舞台笑话,而没有探究如此深入的人则认为这只是一个滑稽故事。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其他诙谐,那个婚姻代理人为了回答一个反驳,用一声叫喊承认了实情:“但是我问你,谁会把东西借给这种人呢?”这里我们再次将滑稽的揭露伪装看做诙谐的外表,尽管在这个例子中诙谐的特点更加清楚明白,因为婚姻代理人的话同时是相反事情的一种表达。在试图证明那些人是富有的同时,他也证明了他们不富有,而是极端贫困。诙谐和滑稽在这里结合起来,并告诉我们同一个评论可以同时既是诙谐的又是滑稽的。

我们乐于抓住这个从揭露伪装的滑稽性回到诙谐的机会,既然我们的真正问题不是确定滑稽的本质而是阐明诙谐和滑稽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心理自动性的揭露伪装,在一种我们关于某物是否是滑稽或诙谐的感觉置我们于困境的情形下,我们现

在将增加另一种情况,在那里有一种类似的滑稽和诙谐间的混淆——愚蠢的诙谐。但是我们的观察将最后向我们显示,在第二种情况下诙谐和滑稽间的会合在理论上是能予以解释的。

在讨论诙谐的技巧时我们发现,给予思维模式以自由作用是被许多诙谐接受的技术性方法,这里的思维模式一般地是处于无意识中,但在意识中被判断为“错误推理”的实例。关于这些我们再次为它们是否具有真正的滑稽性格而感到困惑,所以就倾向于简单地把它们划为滑稽故事。我们不能对这种疑惑达到一个决断,因为现在我们对诙谐的根本性质仍处于蒙昧无知。后来,被梦工作的类推带领,我们发现诙谐的特性在于由诙谐工作引起的合理批评的要求和不放弃语词和胡说中的古老乐趣的欲望间的妥协。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妥协,当前意识的开端在某一刻导向无意识的修正时,满足了在每种情形下的双重要求。但却将自身交给各种形式的批评,并不得不容忍形形色色的评定。有时一种诙谐以一种微不足道但可接受的断言面孔成功地溜过,有时它又以有价值的思维表达形式贩卖自己。但是,在引发妥协的边缘情况,将会放弃满足批评的努力。在它支配下的快乐根源的夸口,将以简单的胡说方式在批评前发生,不惧怕暴露任何矛盾。因为,诙谐可以期待听者通过无意识修正而澄清它的表达形式中被破坏的外观,从而还其本来意义。

那么,在何种情形下,诙谐会作为胡说在批评前出现呢?特别是当它动用那种一般来讲是无意识的,而被意识思维所禁止的错误推理的思维模式时。有一些对无意识适当的思维模式也被意识所保留,比如一些种类的间接表达暗示等等——即使它们的有意识的运用要遭受相当多的限制。当一种诙谐要运用这些技巧时,

它不会引起批评中的任何反对,或只是那么一点点。反对只出现在它还运用与有意识思维毫无关系的那些技巧方法时。一种诙谐仍然可以避免这种反对,如果它掩盖了所运用的错误推理并伪装上逻辑的外表,就如在蛋糕和美酒,鲑鱼炒蛋黄的趣闻中一样。但如果它坦率地给出错误推理,那批评便必定跟随而来。

在这些情境中诙谐还有另一个根源。错误推理,一种它作为无意识思维模式之一的技巧,对抗了批评——即使并不总是如此,比如滑稽。有意识地给予无意识思维模式以自由作用(这被作为错误的加以拒绝)是产生滑稽快乐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是易于理解的,既然产生前意识贯注比充分发挥无意识作用需要更多的能量消耗。当听到一种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思想时,我们将它与它的正确形式加以比较,一种消耗中的不同便会出现,从中产生了滑稽的乐趣。一种类似于此利用错误推理为技巧的诙谐表现为胡说,可以同时产生滑稽效果。如果我们没能注意到诙谐因素,那留给我们的就只是滑稽或逗人的故事。

那个在归还时破了一个洞的借水壶的故事是无意识思维模式自由作用的纯粹滑稽效果的精彩例子。我们还记得,当被追问时,借壶人先是回答说他根本就没借过水壶,接着说他借壶时壶上已经有一个洞了,最后他说在归还时壶根本没有损坏,也没有洞。这几种思想每一种就其自身而言都是有效的,它们相互抵消,这在无意识中是显然不会出现的。在梦中,无意识的思维方式通常是明显的,因此不存在“非此即彼”^①这类事情,只有同时并列。在一

^①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由陈述者通过解释提供出来(参见《梦的解析》1900a,标准版,4,316~318)。

个梦的实例中,尽管它本身复杂,我还是在《梦的解析》中将之作为解释工作的一个样本。我想使自己从没能用心理治疗医好一位女患者的病痛而受责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我的理由如下:1)她自己应对病痛负责,因为她不愿接受我的治疗;2)她的病痛是有器质性根源的,这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3)她的病痛与她的寡居有关,我当然不必为此负责;4)她的病痛因为用了别人给她的不干净的注射器引起。这些原因互相并列在一起,似乎并不彼此排斥。为了避开胡说的指责,我被迫以“非此即彼”代替梦中的“和”。

类似的一个滑稽故事是,在匈牙利的一个村子里,一个铁匠犯了死罪,但是村长却决定绞死一名裁缝而不是这个铁匠作为惩罚。因为村里有两个裁缝,却只有一个铁匠,而犯罪必须受罚。^①这类把罪过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头上的做法自然与意识逻辑的法律相抵触,但在无意识思维模式中却不是这么回事。我毫不犹豫地称这个故事是滑稽,并将诙谐中的借壶故事归于此类。现在我将承认后一个故事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滑稽,而不是诙谐。但是我现在理解了,我那一贯确定的感受,如何在确定这个故事是滑稽还是诙谐面前陷入困惑。这是一种我不能依赖于感觉做出决断的情形——当滑稽是从仅适合于无意识的思维模式的揭示中产生时。类似的一个故事可能同时既是滑稽又是诙谐。但是它将给我以诙谐的印象即使它只是滑稽,因为对无意识错误推理的运用使我记起了诙谐,正如为揭露不明晰的滑稽所做的安排一样。

对于澄清我的辩论中最精细的地方,我给予重大注意——滑稽和诙谐的关系。为此我将在曾说过的话之外补充几条相反的陈

① 这个故事在近20年后的《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中再次出现。

述。首先我可能会让人注意这个事实,即我正在解决的诙谐和滑稽交会的情形在这里与前者并不等同。无疑这个区分太窄,但却具有确定性。在较前的情况中滑稽产生于心理自动作用的揭露伪装。然而,这一点绝不是无意识所特有的,它在诙谐技巧中也不占突出位置。揭露伪装只偶然地同诙谐发生关系,当它为诸如对立面表达等诙谐技巧服务时,但是在无意识思维模式自由活动的情情况下,诙谐和滑稽的会合是必需的,既然在这里所运用的为产生乐趣而由第一个人作为技巧实行的同样方法必定在第三个人那里由它的本性而产生滑稽乐趣。

一个人可能被诱使从最后这种情况中归纳并寻找滑稽和诙谐的关系,在诙谐乐趣根据滑稽乐趣而在第三者身上产生这样一种见解之下。以下这点毫无问题是正确的,即绝不是在全部诙谐,甚至也不是在大部分诙谐中均可发现它与滑稽的联系。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诙谐和滑稽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无论一种诙谐如何成功地避免了荒诞的外表——即大多数诙谐伴随有双关语和暗示——在听者那里没有任何类似于滑稽效果的迹象。这可以由我先前已给出的例子验证,或者我还可给出一些新的例子:

一位赌徒的 70 岁寿辰贺电:“30 和 40。”(暗示性划分)

海维斯在某处如此描述烟草制作过程:鲜艳的黄叶子……被蘸到一种酱汁里并成了酱。(同一材料的大量运用)^①

门提农夫人被称做“门提囊夫人”。(名称的改变)

卡斯特纳教授对一位站在望远镜前的王子说:“尊敬的陛下,

① “蘸酱”德文词“tunken”,被用作烟草准备的技术性过程的一部分

我清楚地知道您是高贵的^① (durchläuchtig), 但不是透明的 (durchsichtig)。”

安德卡西伯爵曾以“漂亮的外交部长”而闻名。^②

可以进一步认为,所有表面上像是胡说的诙谐,无论如何似乎都是滑稽的,而且一定会产生滑稽效果。但是我必须记住这类诙谐通常是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听者,并引起疑惑和另一种否定倾向。由此,它究竟是依赖于那看上去是滑稽的胡说还是简单的一般性胡说——我们尚未考察是什么因素决定的。我们仍坚持这个结论,诙谐从本性上可以与滑稽区分开,而且只在一方面是特殊情况下,另一方面怀有从理智根源获得乐趣的目的时才与滑稽会合。

在探究诙谐与滑稽的关系期间,这个区别对于我们是一目了然,我们必须将之视为最重要的来加以强调,这个区别同时也指出了滑稽的一个主要心理特点。我们发现我们被迫将诙谐中的快乐定位在无意识中,而在滑稽中没有发现任何这样定位的理由。相反,我们迄今所做的全部分析指出,滑稽快乐的根源是两种消耗间的比较,它们必须被归于前意识。诙谐和滑稽的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区分在于它们的心理定位,可以说,诙谐是从无意识领域中对滑稽的贡献。

(三)

没有必要为这种离题而表示歉意,因为正是诙谐与滑稽的关

① 从“Durchlaucht”派生出来的形容词,用作较小皇帝的头衔:“尊贵的殿下”。

② 居拉·安德卡西伯爵(1823—1890),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多年,有点像花花公子。

系驱使我们对于滑稽加以研究。但的确已是回到我们先前主题的时候了——关于服务于使事物滑稽的方法的讨论。我们首先考虑漫画和揭露伪装,因为我们能够从这两者中获得某些关于滑稽模仿分析的启示。一般地,模仿无疑是与漫画相互渗透的——对那些否则不会引人注意的特点的夸张——它还包含着贬低的特点。但是这远未穷尽它的特点,不须争辩,它本身是滑稽快乐的一个特别丰富的来源。因为我们的笑特别是针对某种模仿的真实程度而发的。对此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实属不易,除非你准备接受伯格森的观点,他使模仿的滑稽接近于由心理自动性的发现而导致的滑稽。伯格森的观点是,任何发生在活人身上的使他想到无生命机制的事物均有一种滑稽的效果。他为此提出“生命机制”的公式。他从帕斯卡尔的问题出发来解释这种模仿的滑稽。帕氏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比较两个类似的方面时会发笑,而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就其本身而言并无滑稽性(参见《思想录》:“活着的事物决不会被完全精确地重复,当我们发现这种重复时,我们总是怀疑在活着的事物背后存在某种机制。”(伯格森,1900)。当人们看到两张极其相似的面孔时,就会想到来自同一模子的两种印象或是某种类似的机械过程。简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笑的原因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分歧,或者如我们所言,是把生命体贬为非生命体。另外,如果我们想要接受伯格森的这些似乎合理的想法,我们将发现并不难把他的观点包含在我们自己的程式中。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活着的东西都是彼此不同的,要求我们的理解力给出一种形式的消耗。如果因为完全的一致或不可靠的模仿,我们不需要付出新的消耗,那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失望。但是我们的失望是在宽慰的意义上,成为多余的期待的消耗通过笑声得以释放。

同样的程式还将包括伯格森思考过的所有情形,如滑稽刻板、职业习惯、固定观念以及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言语的转换。所有这些情况都要回到期待的消耗和为理解某种保持同一事物实际要求的消耗之间的比较。期待所需要的更大数量的消耗建立在生命体的多样性及可塑性的观察基础之上。在模仿的情况下,滑稽作用的来源将不是情境的滑稽而是期待的滑稽。

因为我们一般是从比较中获取滑稽的乐趣的,我们有责任考察一下滑稽本身的作用。确实,这可以用作一种使事物变得滑稽的方法。当回想类比的情况时,我们对该问题的兴趣将会增加。我们经常发现对于某事物应被称做诙谐或是滑稽这个问题,我们的“感觉”使我们陷入困境。

必须承认,这个主题值得付出比我们的兴趣所能为之的更仔细的对待。在一种类比之后我们所追寻的主要属性是它是否恰当——即它是否引起对两件不同事物间真正表现出的一致性的注意。重新发现同一事物的原始快乐并非是有利于类比运用的惟一动机。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事实说明类比有一个用处,即对理智工作带来宽慰——也就是说,如果某人遵循着通常的比较方式,将不太熟悉的东西和较熟悉的东西,或者把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进行比较,由此就能阐明较不熟悉的或较困难的东西。每种这样的比较,尤其是抽象事物与具体事物的比较,都包含着一种贬低和(观念模仿意义上的)抽象消耗的节省,但是这显然不足以凸显滑稽的特点。它是从由比较引起的宽慰的快乐缓慢地而不是突然地产生的。有许多情况仅涉及到滑稽性,在这些情况里人们也许会怀疑它们是否显示出了滑稽的特点。在两个进行比较的事物中,如果抽象消耗间的差异水平上升,如果某件重大的和不熟悉的事

物,尤其是如果它有带理智或道德的性质,同某件平常而低劣的事物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比较无疑变得滑稽。先前宽慰的快乐和观念模仿的决定因素所做的贡献或许可以解释这种渐进的转变,它受数量因素的制约,在比较中从一般性快乐转变到滑稽的快乐。如果我强调我不是在两样相比较的事物的对立中,而是在两种消耗间差异的类比中追溯到滑稽的乐趣,那么我无疑会避免误解。当一件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的事物,一件十分抽象的、在理智意义上实际是极异常的事物,被说成与某种熟悉而低劣的事物相一致时,在这里没有对抽象作用的任何能量消耗,那么,抽象事物本身作为同样低劣的事物而被揭去伪装。比较的滑稽作用于是还原为一种贬低。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种比较可以在本质上是一种未夹杂任何滑稽因素的诙谐——准确些说是当它避开贬低时。因此,真理与火炬——人们不可能举着它从人群中走过而又避免烧着某人的胡须——的比较就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诙谐,因为它是在整体意义上运用淡化的语言形式(真理的火炬);它不是滑稽,因为一把火炬作为一件东西,虽然是具体的实物,但仍不缺乏确定的象征。但是一种比较也同样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一种诙谐或滑稽,而且可以成为排斥对方的两者之一,既然对比可以对某些诙谐技巧——如联合或暗示——有所裨益。在这个意义上,内斯特莱(Nestroy)将记忆比做仓库的比较便立刻成为滑稽和诙谐了——前者因为心理概念必须容忍将记忆比做仓库这一特别的贬低;后者是因为进行比较的这个人是个职员,他在比较中建立起一个出人意料的心理学和他的职业间的连结。海涅的诗句“直到最后我耐心的马裤上的扣子全都崩开”,乍一看不过是滑稽性贬低比

较的一个典型例子,但仔细考察后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它带有诙谐特点,因为作为暗示的一种手段,这种比较触及到淫秽的领域,从而成功地在猥亵中释放了快乐。同样的材料,通过不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既滑稽又具有诙谐特点的快乐。如果一方的条件有利于产生另一方,它们的统一就会对那种被认为可以告诉我们在被给予一种诙谐还是一种滑稽事物的“情感”产生混乱作用,而且决定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出,即专注的研究摆脱了对特定快乐的任何预先安置。

无论滑稽快乐产生的深入决定因素的探究多么富有吸引力,作者必须牢牢记住,他所受的教育或他的职业都不能使他将研究工作扩展到诙谐领域之外;他必须承认,滑稽比较这一主题使他尤其感到自己的无能。

所以我们容易记起,很多权威人士没有认识到我们已发现的诙谐和滑稽之间更大的概念与材料上的区别,他们认为诙谐只不过是“语言的滑稽”或“语词的滑稽”。为验证这一观点我们将选择一个实例,将每样在语词中有意或无意的滑稽与诙谐作一比较。我们早已说过,我们完全自信能够将滑稽的话和诙谐区别开:

拿着叉子纷扰不休,

他的母亲把他从烦恼中拽出。

这只不过是滑稽的,海涅将哥廷根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教授、学生、市侩和驴子,这个说法才是一种诙谐。

作为有意的滑稽,我将把斯特登海默^①的威甫岑作为一个典型。我们说威甫岑是机智的,因为他具有激发滑稽性的相当的天

① 朱力叶斯·斯特登海默(1831—1916),柏林新闻记者。

才。这种才能事实上贴切地决定了一个人所“具有”的机智与“造成”的诙谐之间的区别。^① 不容置辩,威甫岑的那些通信,在它们被点缀以五花八门的诙谐这个意义上是机智的,这当中有一些真正成功的例子(比如,野蛮人的展览:节日般一丝不挂),但是给予这些东西以特性的并不是分离的诙谐,而是信里那些泛滥成灾的大量俏皮话。无疑,威甫岑从根本上来讲想要做个讽刺性人物,一个古斯塔夫·弗雷塔克笔下的史默克的变形,^② 一个未受教育的误用并贩卖民族文化宝藏的人。但是,作者在描绘这种性格中所获得的滑稽效果的享受明显地一点点将讽刺目的推向了幕后。威甫岑的作品在最大程度上是“滑稽的胡说”。作者利用由成功的堆积而产生的快乐心境,提供给我们各种就其自身而言根本无法忍受的枯燥乏味的东西,同时还有一些可接受的材料。考虑到其特别的技巧,威甫岑的胡说产生了特别的效果。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些诙谐,有人就会被其中一些特别地打动,这些诙谐将自己的印记刻在了整个作品上。威甫岑主要运用了联合法(混合法),人们所熟悉的语言用法和语录的更改,用一些通常更自命不凡而且凝重的因素替换了这些表达式的普通因素,这样一来就接近于诙谐的技巧了。

比如,这里是从前言和开头几页里引用的几个混合的实例:

“土耳其的钱就像海中的草一样。”这是由两个表达式构成的,“钱像草”及“钱像海里的沙子”。

① 同一个德语词“Witz”在这里既用作机智又用作诙谐。

② 古斯塔夫·弗雷塔克(1816—1895),小说家,剧作家。史默克是他的喜剧《记者》中一位寡廉鲜耻的新闻记者。

或者：“我只不过是根没有叶子的树干，它是自己昔日繁华的见证。”这由“无叶的树”和“那根树干……”凝缩而成。

或者：“那引我离开阿奥吉恩牛厩的西西拉的阿里阿德娜的线索在哪儿？”三个希腊神话给这个混合提供了三个组成部分。

我们不难对这些更改和替换进行总结。从威甫岑的以下实例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们的本质，这些例子显示了威甫岑的性格，其背后我们瞥见另一种更流行、更平庸的言语，这言语被还原为一种陈词滥调：

“为我将纸墨吊得更高。”俗语是“高悬我的面包篮”，这里用隐喻的方法表达了一种把某人置于困境的观点。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隐喻扩展到其他事物上去呢？

“在战争中俄国人有时抽短签，有时抽长签。”这里的表达只有第一个是通常用法，但考虑到它的起源将第二种用法也投入使用并不显得荒谬。

“还在我年轻的时候，佩格索斯就在我心中将我激动。”如果用“诗人”代替“佩格索斯”，我们发现这不过是自传中用滥了的一种表达方法。当然，佩格索斯并不是替换诗人的合适的词，但它与“诗人”有概念上的联系，而且听起来更响亮。

“我走过童年期带荆棘的鞋子。”这是取代一段陈述的一种明喻（穿破了童年的鞋子，将托儿所抛在身后），是与童年期相关的图像之一。

从大量威甫岑的其他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纯粹以滑稽性感人的例子。比如一个滑稽失望的例子：“战斗进行了数个小时，最后仍然未分胜负。”以下是一个滑稽性揭露伪装（无知）的例子：“克里欧，历史上的梅杜莎。”这是滑稽的无知的揭露伪装。或者像：

“Habent sua fata morgana”^① 这种引语。但是,我们的兴趣更多地是由混和与改变引起的。因为它们重复了诙谐的技巧。比如,我们可以把这种诙谐如“他的背后有美好的未来”,或者“er hat ein Ideal vor dem Kopf”和改变加以比较,或者把“新的矿泉治疗效果”和利希腾伯格(Lichtenberg)的改变加以比较等等。威甫岑的具有同样技巧的作品现在可以称为诙谐吗?或者它们是如何与此相区别的呢?^②

不难回答,让我们记起诙谐提供给听者双重面孔,使其接受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一个胡说的诙谐中,像我们新近提到的那一个,仅考虑措辞的话,一种观点可将其看做是胡说;另一种观点,沿着所给出的路径,穿过听者的无意识并在其中找到一种精彩的感受。在威甫岑的像是诙谐的作品中,诙谐的一个面孔是空洞的,似乎发育不良;像是贾纳斯的脑袋,只有一面发育了起来。如果我们受这些技巧的诱使进入无意识,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混合永远不会带我们进入由混合真正能产生某种新意谓的情形。如果我们试图进行分析,它们就完全坍塌解体了。改变和替代,正如它们在诙谐中所做的那样,带我们进入一种一般性的熟悉的措辞,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别的新东西。一般来说,它们实际上不可能是什么有用的东西。所以,关于这些诙谐的观点只有一种被留下——它们是胡说。我们只须简单地断定,这些不具备诙谐的最根本特性的作品,或者是坏的诙谐,或者根本不是诙谐。

① “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籍有它们的命运),这是特伦斯的一句拉丁格言。“Fata Morgana”是意大利人对在墨西拿海峡见到的一种特殊海市蜃楼的称呼,出自摩根·勒·费伊(仙女,国王阿瑟的妹妹)。

② 斯特滕海默的另一个诙谐将在《梦的解析》标准版,4,207中找到。

这类最简单的诙谐无疑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对之我们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它们或者是如先前我们考虑的情况下由无意识思维方式的揭露伪装而产生的滑稽,或者是与完全的诙谐相比较而产生的乐趣。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假定这些产生滑稽快乐的方式在这里会合。并非不可能,这里来自诙谐的不充分的支持确切些说就是使胡说成为滑稽性胡说的东西。

还有其他容易理解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与那应当有效的东西相比较的不充分性使胡说具有不可抗拒的滑稽性。诙谐的组成部分——谜语,或许能提供给我们比诙谐本身更好的例子。比如,这里有一个滑稽问题:“墙上挂的是什么东西?人们可以在它上面把手擦干。”如果答案是一条毛巾,那么它将是一个愚蠢的谜语。但是如果这个回答被反驳:“不,那是一条青鱼。”——“可是我的天哪!”猜谜的人发怒说:“青鱼不会挂在墙上。”——“你可以把它挂在那儿。”——“但是谁会在青鱼上擦干他的手呢?”——“好啦,你并不是必须这么做。”一个宽慰的回答。通过两个典型的移位而做出的这个解释,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离真正的谜语是何其之远,而且考虑到它的完全不充分性,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可抗拒的滑稽,而不是简单的愚蠢。在这种方式下,通过背离根本性的条件、诙谐、谜语及其他事物,它们本身并不产生滑稽的快乐,但成为滑稽快乐的来源。

理解语言的无意滑稽的情况还有少许困难,它们经常以我们乐意的方式实现。比如弗里德里克·凯姆普娜的诗歌:

反对动物解剖

在人类与可怜的哑巴动物之间,
伸展着一条看不见的灵魂之链。

可怜的哑巴动物也有意志——也是灵魂，
 尽管它们的灵魂小于我们。
 或者一对情侣间的一段对话：

对比

“我真幸运，”她轻柔地喊着。
 “我也是，”丈夫高声宣布，
 “你的众多品质使我无比骄傲，
 我竟做出了这么英明的选择。”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想到诙谐，但是，无疑是这些诗歌的不充分性使得它们滑稽——如表达方式的不同寻常的拙劣，这和最陈腐的或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语言特色，思想的最纯朴的局限，任何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缺乏都有联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为何发现凯姆普娜的诗歌是滑稽的这个问题仍不明朗。我们发现许多类似的作品除了出奇的糟糕之外什么也不是，它们不仅不能让我们发笑反而令我们烦恼，但正是这种巨大的距离才使它们和我们所期待的能够提供滑稽的诗歌得以区分。如果我们感到这种区别太小，那我们就倾向于以批评代替发笑。再者，凯姆普娜诗歌的滑稽性由一种附属的情况得以保证！这位女作家准确无误的良好意向和特别忠诚的情感，解除了我们的嘲笑或烦恼，我们在她那无助的诗句背后感受到这种情感。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一个暂不考虑的问题。能量消耗的不同无疑是滑稽乐趣的根本决定条件。但是观察表明，这种差异并不必然地引起快乐，为了使滑稽快乐能从能量滑稽的差别中实际上产生，必须要具备哪些更进一步的条件或克服哪些障碍呢？在转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将对这个讨论用一个清楚的断言下个结

论：言语的滑稽与诙谐并不一致，因此诙谐必定是一种与言语滑稽不同的事物。

（四）

既然我们即将对最后一个问题做出答复，即在能量消耗的差异中产生滑稽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先让自己放松一下，这不能不令我们高兴。对这个问题的确切回答与对滑稽本质的艰难解释是一致的，对此我们既不需要能力，也不需要权威。我们将再次满意地阐明这个问题，只要它能清楚地与诙谐问题形成对比。

每一种关于滑稽的理论都受到了反对，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定义忽视了滑稽的根本性东西：“滑稽是以观念间的对比为基础的。”“是的，只有当这种对比有一种滑稽作用而不是其他。”“滑稽感觉产生于期待的失望。”“是的，除非这失望实际上是令人痛苦的。”无疑，这些反对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其中总结出的滑稽的根本特征迄今逃避了考察，那么我们是过高地估计了它们。损害这些定义的普遍有效性的是产生滑稽快乐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条件。但是我们不必从它们当中寻找滑稽的本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滑稽快乐的根源在于两种消耗间差异的比较，那么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并对滑稽定义中的矛盾之处予以阐明将变得容易一些。滑稽快乐和它的众所周知的效果——一笑——只在这种差异不可利用并且能够释放出来时才能产生。如果这种差异一旦被承认便挪作它用，那么我们就不会获得任何快乐的效果，至多是有一种短暂的快乐，而滑稽的特点并没有出现。正如在诙谐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认为是多余的消耗在别处被运用，我们不得不采用特别的技巧，滑稽快乐的出现也只能保证是在这同一种条件的情况

下。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这种能量消耗差异情况的出现特别多,而从这些差异中产生出滑稽的情况则相对较少。

即使是草率地研究由能量消耗的差异产生滑稽条件的人,也会获得两个观察发现。第一,有些情况下滑稽能习惯性地产生,好像有必然的力量推动似的,相反,在其他情况下仿佛完全依赖于环境,依赖于观察者的立场。第二,不寻常的巨大差异常常会突破不适宜的条件,这样,尽管有这些不适条件滑稽感仍会产生。与第一种观点相联系,确立两个类别是可能的——必然的滑稽和偶然的滑稽——尽管必须准备从最初便放弃在排除了例外的第一类别中发现滑稽必然性的看法。考察这两种类别的决定条件将是引人入胜的。

有些条件已经被作为滑稽情境的“孤立因素”而集合到一起,它们基本上适用于第二种类别。更密切的分析引出以下事实:

(a)产生滑稽快乐的最适宜的条件一般来说是使人“想发笑”的一种快乐心境。在毒性的快乐心境下几乎所有事物看上去都是滑稽的,或许是通过与正常状态下消耗的比较。的确,从一种单一的途径观点看,当它不表现为一般的心理特点时,诙谐、滑稽和所有类似的从心理活动中获得快乐的方法都不过是重新获得这种快乐心境——这种幸福愉快——的方式。

(b)一种类似的适宜效果是由滑稽的期待通过与滑稽快乐的协调产生的。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种想使某事滑稽的意图由另外一个人传达给别人,那么这种低程度的差别便足够说明,如果它们无意地出现在某人的经验中,它们也许会被忽略。任何一个开始读一本滑稽的书或者到剧院看一场滑稽戏的人都会将他能够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向他提供滑稽场合的事物发笑的能力归因

于这种意向。最后,正是在回想起笑过和期待发笑的情况下,当他看到喜剧演员一上场,不等后者做出什么逗他发笑的尝试,他就开始笑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才会承认此后面对戏剧中使他发笑的事物他感到羞怯。

(c)滑稽的不适宜条件产生于某个人当时所具有的心理活动。追求严肃目的的想象活动或理智活动与寻求释放的贯注能力相抵触——活动为移位而要求的贯注,因此,只有出乎意料的较大的能量消耗差异才能突破而形成滑稽快乐。那些特别不利于滑稽的事物是所有种类的理智过程,它们远离了知觉性的东西,结束了观念的模仿。在抽象思维领域没有为滑稽留下一丁点地盘,除非思维模式被突然打断。

(d)如果注意力恰好集中在那可能产生滑稽的比较上面,那么,释放滑稽快乐的机会也将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那否则会具有最确定滑稽效果的东西失去了它的滑稽力量。如果一个人的兴趣指向把某种动作或功能与他脑中清楚地具有的某种标准进行比较,那么这种动作或功能对这个人而言就不会是滑稽的。这样,考查者就无法发现他在无知中造成的胡说滑稽,他会为此烦恼不已,而应试者的同伴最感兴趣的是他将有什么样的运气而不是他懂得多少,对于这同一个胡说他们会捧腹大笑。一位体操或舞蹈教练几乎看不出他的学生动作中的滑稽;对于喜剧作家富有成效地阐明的人性弱点中的滑稽,一位牧师完全视而不见。滑稽过程不能忍受注意的过度贯注,它必须能够使其过程不受注意地进行——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它与诙谐一样。如果某个人要将滑稽过程说成是一个必要的意识过程,就会和我在《梦的解析》中有充分理由加以运用的“意识过程”这一命名相冲突。更确切些说,它形成

了前意识的一部分。这些在前意识内进行的过程,缺乏与意识相联系的注意贯注,可以恰当地命名为“自动的”。如果想要产生滑稽快乐,这种比较能量消耗的过程必须保持为“自动的”。

(e)如果从应该产生滑稽的情境中同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释放,那么,滑稽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操作性差异的释放是不可能的。个体在每种特殊情况下的情感、性情、态度使人可以理解,滑稽的出现或消失是根据每个人的观点发生的,绝对的滑稽只存在于例外情况下。所以,滑稽的偶然性或相对性要比诙谐大得多,它绝不是主动发生的,而是被必然造成的,使之能获得接受的条件在其建构过程中即可观察。情感的产生是妨碍滑稽的条件中最强烈的,在这一方面它的重要性从未被忽视。^①因为这个原因人们说滑稽感在多少有些淡漠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在那里不包含情感和兴趣的强烈参与。但是确切些说,正是在有情感释放的地方,一个人可以观察到能量消耗间一种特别强烈的差异产生了释放的自动作用。当巴特勒上校^②回答奥克塔维奥的警告时,他苦笑着叫道:“来自奥地利议院的感激!”他的怨恨并未妨碍他发出笑声,这笑声适用于他相信自己正遭受的失望的记忆。另一方面,剧作家所描述的这种重大失望不如他显示出有能力在释放出的情感风暴中迫使人发笑给人的印象更

^① 笑是容易的,但它对你并无别的意义。

^② 在席勒的悲剧《瓦伦斯泰因之死》中,巴特勒上校是一位曾在30年战争期间在帝国军队服役的有作战经验的爱尔兰士兵,他相信自己已被皇帝所疏远并准备跑到敌人一边。奥克塔维奥·皮克洛米尼是他的上司,请求他重新考虑,并提醒他想想奥地利为他40年忠诚所表示的感谢,巴特勒以上述话作为回答。

深。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解释适用于除快乐之外伴随着强烈痛苦或不友好情感之外的任何情况。

(f)如果我们在此之外再补充一点,即滑稽快乐的产生可以受任何其他快乐的伴随情况的激励,就如受某种感染力的激励一样(以和倾向性诙谐的前快乐原则同样的方式发生作用),我们将充分触及到支配滑稽快乐的条件,为我们的目的,虽然并没有触及到全部条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滑稽作用的不一致性和偶然性一样,这些条件用任何其他方式解释都不如用滑稽快乐的产生来自于差异的释放那么容易。在大多数不同情况下,这种解释可以用于释放之外的其他方式。

(五)

性(sexuality)和猥亵(obscenity)的滑稽应受到更仔细的研究。但是在此我们只能以些许评论略加涉及。它的出发点(和猥亵诙谐中的情况一样)将仍然是暴露。一次偶然的暴露对我们具有滑稽作用,因为我们把这种悠闲自得同我们以极大的能量消耗来享受的风范加以比较,否则人们就会用这种能量消耗来达此目的。这样这种情况便接受了天真的滑稽作用,不过要更简单一些。我们以第三者身份成为观众(在说淫秽语言的情况下的观众)的每一次暴露,都等同于成为滑稽的被暴露的人。我们已经发现,诙谐的任务是取代淫秽语言的地位,从而再次开通失去的滑稽快乐源泉的道路。与此相反,目击一次暴露并不足以回击滑稽,因为他自己在做这事情时的努力消除了滑稽快乐的决定条件:在所看到的事物当中除了性的快乐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如果目击者的其他什么人做一个解释,那被目击者再次成为滑稽的,因为有一种显著的

感觉,后者省略了为取代秘密的隐藏而需付出的能量消耗。除此之外,性和淫秽语言提供了最丰富的快乐的性兴奋与滑稽被同时获得的情况。因为它们可以向人们显示它们对身体需要的依赖(贬低),或者它们能够揭示隐藏在心灵的爱的要求背后的生理需要(揭露伪装)。

(六)

令人奇怪的是,伯格森的迷人生动的文集《笑》,邀请人们在滑稽的精神分析中寻求对它的理解。我们已经熟悉了伯格森掌握滑稽特点的公式:“生命的机械化,以人工代替自然的某种替代作用。”他从自动作用到自动机这样一种似乎合理的思想序列开始,并试图把许多滑稽作用追溯到已经淡忘的童年玩具的回忆。在这方面他暂时获得了一种观点,的确,不久后他就放弃了这个观点。他煞费苦心要将滑稽解释为童年期玩具的后效。“也许我们应该使这种简化再深入一步,回到我们最陈旧的记忆中去、追溯到游戏中,这种首次结合在一起的滑稽短剧使儿童感到有趣,使成人发笑。……首先,我们也常常认识不到在我们大多数快乐情绪中还有多少孩子气。”(伯格森,1900)既然我们已经将诙谐追溯到了儿童期的语词和思想游戏中,这种游戏一度受挫于理性的批评,那么,我们不由得也想考察一下伯格森如何猜测在滑稽中具有童年根源。

事实上,如果我们检查了滑稽与儿童间的关系,我们将发现许多有希望的联系。孩子们自己并不给我们任何滑稽的感觉,尽管与我们相比,他们的本性满足了更多产生滑稽差别的条件:过分的动作消耗,较少的智力消耗,身体机能对心理机能的控制及其他特

点。只有当孩子的举动像一个认真的大人而不像孩子时,这个孩子才给我们以滑稽效果。他的做法就像某些人伪装的一样。只要他保持着童稚的本性,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提供给我们一种纯粹的快乐,或许能轻微地使我们记起滑稽。我们称他是天真的,而且我们把他说的话称做天真滑稽,只要他对我们表现出缺乏抑制。而对另一个发生同样情形的人,我们则会认为他在说污言秽语或是诙谐。

另一方面,儿童根本没有滑稽感受。这个断言不过是说,同其他感受一样,滑稽感只在心理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发生,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尤其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感受清晰地应属于童年阶段的某个时期出现。但是,这个儿童缺乏滑稽感受的论断包含有比自明事物更多的东西。首先,很容易看出,如果我们关于滑稽感产生于理解其他人的过程中产生的消耗差异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不会是相反的情况,让我们再次以滑稽快乐为例,那被放入意识公式中的产生差别的比较是这样的:“他是那样做的。”“我将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但是一个儿童不具备这第二句话所包含的标准,他只是通过模仿进行理解,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做事。对儿童的抚养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标准:“这是你该做的。”如果现在他在做出比较时运用这个标准,他将简单地总结出:“他做得不对,我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带着一种优越感嘲笑别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将笑追溯到消耗的差别中,但是从嘲笑别人的情况的类比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从孩子充满优越感的的笑当中产生不出滑稽感,它只是纯粹快乐的笑,至于我们自己,当我们对自己明确感到优越时,我们只是以微笑代替开怀大笑,或者如果我们要笑,我们也会将这种变得有意识的优越感同使我们发笑的滑稽

性清楚地区分开来。

正确的说法或许是,儿童在大量情况下因纯粹快乐而发笑,这些情况我们感到是滑稽的,并且找不到什么动机,而儿童的动机却是清楚的和能够说明的。比如,若某个人在街上滑倒了,我们就会发笑,因为这种印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滑稽的。一个儿童在同样的情况下笑是因为优越感或幸灾乐祸:“你摔倒了,我却没有。”儿童身上的一些快乐动机看来在成人身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具有滑稽感。

如果可以做个归纳,将滑稽的独具特点放到婴儿期的觉醒之中——将滑稽看做重新获得“已逝的童年期的笑”,这是很富吸引力的。于是有人会说:“我笑另一个人和我在消耗间的差异,每一次我都重新发现了他身上的孩子气。”或者更确切些说,通向滑稽的完全比较是这样的:“他那样做事——我用另一种方式做事——他的做法像我童年期的做法。”

所以,笑总是适用于成人的自我与儿童的自我之间的比较,即使在滑稽的差异中缺少一致性——即这样一种事实,那在我看来是滑稽的东西有时是过大的消耗有时是过小的消耗——这种缺乏也符合婴儿期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滑稽东西总在婴儿一面。

这与以下事实并不矛盾,即当儿童自己成为比较的对象时,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是滑稽,而是纯粹的快乐。不矛盾的原因在于,如果差异的其他运用被避免,那么与婴儿的比较将只产生滑稽效果。因为这些是与支配释放的条件有关的事情。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将心理过程与其他过程联系起来,就会与多余的贯注释放相对抗,并使其转入其他用途。而任何将心理事件分离开来的事物则能促进释放。将儿童看做比较对象的意识态度将使滑稽快乐

所必需的释放成为不可能。只有在精神贯注是前意识的时候,才有可能近似于这种分离。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将这种分离归入儿童的心理过程。就中等强度的差别而言,如果没有其他联系能够控制释放出来的多余能量,那么只能考虑是产生滑稽作用的这种比较的增加(我在童年时也是这么做的)。

如果我们试图在与婴儿期的前意识联系中发现滑稽的本质,我们必须比伯格森更进一步,并且承认为了产生滑稽作用,一种比较不需要唤醒陈旧的童稚快乐和童稚游戏,只触及到幼稚的一般性本质就足够了,或者甚至只须涉及到幼稚的痛苦。在这里我们离开了伯格森,但仍保持与我们自己的一致,如果我们不是将滑稽快乐与回忆的快乐相联系,而是与一种比较相联系。前一种情况(即与回忆的快乐相联系的情况)或许与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滑稽相一致。

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先前从各种滑稽可能性那里得到的图式。我们曾经说过滑稽快乐是如此被发现的:

- (a)通过另一个人和我自己之间的比较;
- (b)通过完全在另一个人内部的比较;
- (c)通过完全在我自己内部的比较。

在第一种情况下,另外的人在我看来像个孩子;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将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孩子;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我将在我自己身上发现这个孩子。

(a)第一种情况里将包含动作的滑稽和形式的滑稽,心理机能的滑稽和性格的滑稽。相应的婴儿期因素将是促使动作和儿童低劣的心理和道德水平的发展。比如,一个愚蠢的人让我感到滑稽,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懒惰的孩子;一个坏人让我感到滑稽,则是

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儿童自己得到动作快乐这种单一情况下,只有成人失去了童稚快乐这一个问题。

(b)第二种情况,其中滑稽完全依赖于“移情”,包含了最多的可能性——情境的滑稽,夸张的(漫画式的滑稽模仿)滑稽,以及模仿的、贬低的、揭露伪装的滑稽。这是一种引进婴儿期的观点被证明为最有用的情况。因为情境的滑稽性最主要的是以窘迫为基础,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了儿童的无助。自然需要的强制性要求与其他功能的冲突是窘迫的最糟糕表现,它与儿童不能完全控制其身体功能相一致。情境的滑稽通过重复产生作用,它基于孩子不断重复(问题或听来的故事)而产生的专有快乐,这使他成为令成人讨厌的人。(见第 137 页)夸张仍然给成人带来快乐,因为它能发现其主要功能的正当性,它与儿童对比例感的特别缺乏有关,与他对数量关系的无知有关,他对数量关系的认识晚于对质量关系的认识。适度和有限制的运用,是后来教育的成果,是通过对在联合中结为一体的心理活动的相互抑制而获得的,即使在容许冲动的情况下——在这些结合被削弱的地方,比如在梦的无意识中,在神经症的单一观念中,儿童的缺乏节制再次出现。

如果我们不考虑婴儿期的因素,那么在理解模仿滑稽中我们将发现巨大的困难。但是模仿是儿童最好的艺术,是他的绝大多数游戏的驱力。儿童的志向目标不在于要超前于同龄伙伴,而是要模仿成人——儿童和成人间的关系仍旧是贬低滑稽的基础,这与成人对待儿童生活的态度中所表现出来的屈尊态度是一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成人降低自己的身体,放弃他那恼人的优越感,平等地与儿童玩耍更令儿童感到快乐。这种宽慰给儿童以纯粹的快乐,在成人和贬低的形式里则成为一种使事物滑稽的手段,一种滑

滑稽快乐的源泉。至于揭露伪装,我们知道它可以回溯到贬低。

(c)我们在寻找第三种情况下的婴儿期基础即期待的滑稽中碰到了最大的困难,期待的滑稽无疑可以解释,那些首先把这种情况置于对滑稽的讨论之中的权威们,为什么没有在滑稽中发现能够解释婴儿期因素的场所。无疑,期待的滑稽在儿童中是最遥远的,掌握它的能力最后才出现。大多数成人看来很滑稽的情况,儿童可能只感到失望。但是,当我们遇到一种滑稽失望时,我们可以把儿童极端快乐和轻信的力量作为一个基础,来理解我们是如何孩子般表现得滑稽可笑的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似乎显示出滑稽感转换的一定可能性,它可以这样进行:“那些对成人不适合的东西是滑稽的。”但是,由于我对滑稽问题的全部态度,我不敢像早期那样严肃地捍卫后一种观点。我不能确定,是否贬低为一个孩子只是滑稽贬低的一个特例,或者所有滑稽事物是否在根本上都基于贬低为一个儿童。^①

(七)

对滑稽的考查无论多么粗略,如果我们不能至少为谈论幽默找到一些地盘,那么这种研究将是相当不完全的。两者之间的基本联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解释滑稽的尝试必定至少对理解幽默有所贡献。对幽默的欣赏无论多么恰当和给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它本身就是最高的心理成就之一,受到思想者的特别喜爱),我们也不能通过探索诙谐和滑稽的程式而避开表达其本质的尝试。

^① 滑稽快乐的根源在于大与小之间比较为“数量对比”,而它还表示一个儿童与一个成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滑稽与婴儿期没有其他联系,那么这当然是一种奇怪的巧合。

我们已经看到,痛苦感觉的释放是产生滑稽的最大障碍。只要无目的动作一发生破坏,或者愚蠢一导致伤害,或者失望一引起痛苦,滑稽作用的可能性便宣告结束。的确,一个无法避免这种痛苦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牺牲品,或至少成为受害者之一。而一个局外人则以他的行为举止表明,这种情境包含了滑稽效果所要求的一切。现在,幽默是获得快乐的一种手段,尽管还有与它相抵触的烦恼情感。它表现为情感的产生的一种替代物,把自己放在它们的位置上。如果有这么一种情况,根据我们的习惯,我们将被诱使释放一种烦恼的情感,如果压抑这种情感的动机作用于我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提供使幽默产生的条件。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下,一个成为伤害、痛苦等等的牺牲品的人可能会获得幽默的快乐,但是无关的人却因滑稽快乐而笑起来。如果这就是幽默的快乐,那么它的产生是以释放并未出现的情感为代价的,它产生于情感消耗的节省——我们不能有别的说法。

幽默是各种滑稽中最容易满足的。它在一个人那里完成全部过程,另一个人的参与并未增加任何新东西。我可以保留那发生在我身上的幽默快乐的享受,并不必与别人交流。当幽默快乐被产生时,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易说清的。但是,如果我们检查了幽默被交流或产生同感的情况,通过理解幽默的人我们自己也到达同样快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获得一些洞察。幽默的最粗野的情况——即所谓充满生活凄酸的幽默——在这种联系中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一个在周一被判处死刑的无赖说:“噢,这个星期美好地开始了。”^①这实际上是一种诙谐,因为这句话就其

^① 这件趣闻在弗洛伊德后来的论文《幽默》(1927d)中,再次做了讨论。

本身是非常恰当的,但另一方面却以愚蠢的方式放错了地方,因为对这个人自己而言这个星期再也不会任何事情。但是,幽默和制造这样一种诙谐有关——即不管是什么将这个星期的开端与别的时间区分开,都要否认那或许会引起特殊情感动机的区分。同样的情况是,当无赖在走向黄泉路上时用一块围巾围住赤裸的喉部,以不至于感冒——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预防措施,但考虑到它围在脖子上的时间太短,以致这种措施便显得是多余而不重要了。必须承认,在这个恶作剧中有一种似乎很宽宏大量的东西,这个人顽强地坚持其惯有的自我,无视那有可能将其自我推倒并使其陷于绝望的事物。这种崇高的幽默总是出现在我们的仰慕不受幽默者情境限制的情况下。

在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Hernani*)中,那个被卷入阴谋反对国王——西班牙查理一世(像法国皇帝查理五世一样)的歹徒,落入了强大的敌人手中。他预料到,由于被判了叛国罪,他注定要掉脑袋。但是这个预见并没有阻止他使自己被公认为世袭的西班牙最高贵族,他还宣布他不想放弃任何属于他的特权。一个西班牙最高贵族可以在君主面前将头盖住。那么好吧:

……我们的头有权利

在你盖住之前落下

这在绝大程度上是幽默,而且如果我们听到时不笑,那是因为我们的仰慕掩盖了这幽默的快乐。在歹徒走在死刑路上仍不想感冒这个情况下,我们开怀大笑。那能够使罪犯陷入绝望的情境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强烈的怜悯,但这种怜悯被抑制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与此关系更密切的人对此情境无能为力。由于这种理解,那已经准备好了的怜悯消耗变得不可利用,我们只是一笑了

之。可以说,我们受到了这个流氓漠不关心态度的影响,虽然我们注意到他已消耗了巨大的心理活动能量。

怜悯的节省是幽默快乐的最经常源泉之一,马克·吐温的幽默通常采用这种机制。在一次对他兄弟生活的说明中,他告诉我们他的兄弟有一次受雇于一家大的筑路企业,一个提前爆炸的地雷把他送上了天,落下时已远离了他工作的地方。我们肯定对这次事故的受害者感到同情,并想问一下他是否受伤。但是当故事继续说到他兄弟因“离开工作现场”而被扣了半天工资时,我们便完全不再有怜悯之心,并且变得像工头一样的硬心肠,甚至对马克·吐温的兄弟有可能受到的伤害也漠不关心。在另一种情况下,马克·吐温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家世,他由此追溯到哥伦布的一位航海伙伴。然后他描述了这位祖先的特点,说到他的行李完全是一堆换洗的衣物,每件衣服上都有一个不同的洗衣房标志——这时我们忍不住以虔敬感的节省为代价大笑起来,我们原准备在这个家族史开头便进入这种虔敬状态。幽默快乐的机制不受我们知识的干扰,我们认识到这个谱系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服务于讽刺目的,旨在揭露其他人的类似细节描述的装饰。就如使事物滑稽的情况一样,幽默也不完全依赖于条件的真实。在另一个故事中,马克·吐温描述他的弟弟如何建造一个地下住房。他带进去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用一块中间开洞的大帆布做屋顶。在屋子竣工的那天晚上,一头被赶回家的母牛从帆布洞里掉下来,踩到桌子上,并且将灯给弄灭了。他的兄弟耐心地把这头牲畜弄出去,将室内一切重新整理好。第二天晚上,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兄弟像第一天晚上那样处理完毕。以后每天晚上都要发生同样的事情,他的兄弟也总是一如既往地耐心应付。重复使故事变得滑稽

了,但马克·吐温如此结尾:他说在第四十六个夜里,当那头牛再次掉下去时,他的兄弟终于说话了:“这件事情开始变得令人厌烦了。”在这里我们无法抑制自己的幽默快乐,因为我们一直期望听到的是这无法阻止的倒霉会令他的兄弟勃然大怒。的确,我们带给自己的小小幽默感是以替代愤怒的生气为代价的。^①

幽默的种类根据节省的对幽默有利的那些情感的本质——如同情、生气、痛苦、温柔等而发生很大变化。它们的数量总是不完全的,因为幽默的王国总在被不断扩大,当一位艺术家或作家通过和我们所举例子中类似的技巧,成功地将我们迄今未克服的情感

① 像肥胖骑士约翰·福斯塔夫那样绝妙的幽默效果,在于轻蔑和愤怒的节省。我们将他视作一个一文不值的专营吃喝的人和一个骗子,但一系列因素消除了我们对他的谴责。我们看到他也像我们一样了解自己,他以自己的机智给我们留下印象,除此之外,身体的不成比例有这样一种效果,即在我们身上激起滑稽看法而不是严肃的看法,似乎道德和荣誉的要求必定从这个大肚皮上反弹回来。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无害的,而且还得到那些他欺骗过的人的滑稽性谅解。我们承认这个可怜虫有权利和别人一样生活并使自己幸福。我们甚至可怜他,因为在大多场合我们发现,他不过是上司手里的一个玩偶。正因如此,我们不会对他产生愤怒,而且将这个节省下的愤怒加到他向我们提供的滑稽快乐之上。约翰的幽默实际上产生于一种自我的优越感,无论身体的和道德的缺陷都不能剥夺这份优越的快乐和自信。

相反,那个机灵的骑士堂·吉诃德是个自身毫无幽默感的人物,但他的严肃认真却给我们提供了幽默的快乐,虽然这快乐的机制与幽默间有重大差别。堂·吉诃德基本上是一个滑稽形象,一个大孩子,头脑里充满了从骑士小说中得到的种种幻想。众所周知,作者起初只想表现他的这一个方面,后来逐渐超出了自己最初的创作意图。但是,等到作者赋予这个滑稽人物以深刻的智慧,高尚的目标,使他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他坚信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并且庄严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向人们许以慷慨的承诺——在作者这样处理之后,堂·吉诃德就不再是一个滑稽角色了。正如在别的情况下幽默快乐产生于情感的避免一样,在这里它产生于滑稽快乐的冲突。但是,很明显,这些例子已领我们远离了幽默的简单例子。

降服于幽默的控制之下,归之于幽默快乐的源泉时,艺术家以惶恐和厌恶为代价在获取幽默方面已经有了令人惊奇的发现。幽默的种种形式,主要是由与条件相联系并在其中产生的两种特性决定的,在这些形式下幽默是明显的。首先,幽默可能表现为和诙谐或其他种类滑稽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任务是排除那情境中隐含的可能性,即一种可能产生的将与快乐结果抵触的情感。其次,它可能完全地或部分地停止一种情感的产生。这最后一种实际上是较普通的情况,因为它更容易发生,并产生了多种形式的“沮丧的”^①幽默——透过泪水而笑的幽默。它从这种情感中抽回了自己的部分能量,作为交易又给了它一点点幽默。

正如我们在以上例子中看到的那样,由同情的根源中产生的那种幽默快乐,产生于一种特殊技巧,这技巧与移位有可比性,通过这种技巧,已准备好了的感情释放是令人失望的,同时精神的贯注经常偏移 to 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上去。但是,这丝毫无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离开情感产生的移位 in 幽默的人自身上发生。我们能够发现接受者在心理过程上模仿了幽默制造者,但是这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使这一过程在后者身上成为可能的力量。

我们只能说,如果某人通过思考世界的巨大兴趣,这是比照他个人而言的,如果他通过这而成功地漠视了痛苦的情感,那么我们尚不能将这视为幽默的成就,而是哲学思维的成就。如果我们使自己进入他的思维序列之中,我们得不到任何快乐。因此,幽默的移位无论在有意识注意的照射下,还是在滑稽比较中都是不可能

① 一个在费希尔的美学中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思而运用的术语。

的。

如果我们在防御过程中看待幽默移位,我们将获得关于它的一些信息。防御过程是反射作用的心理相关物。它完成着预防不愉快情感从内部根源产生的任务。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它们对心理事件起着自动规范的作用,最后,附加一句,这种规范作用是无害的,而且要服从于意识思维。我已经说出了这种防御的一种特有形式,失败的压抑,作为神经症发展的有效机制。幽默可以看做这些防御过程中的最高形式。它不屑于像压抑那样,将包容有忧伤情感的观念内容从意识注意中抽回,由此克服了防御的自动机制。它对这一种作用的实现,是通过寻找一种将在准备状态中就存在的不快能量提取出来的手段,及通过释放,将其转化为快乐的手段。只有在童年期,才存在着种种成年人在今天发笑的痛苦情感——就像一位幽默大师为他正在遭受的痛苦情感而发笑一样。我的自我的提高——幽默移位对之是个见证——翻译过来无疑是:“我太大度了(我太好了),以致不会因这些事情而感到烦恼。”这或许可以从他现在的自我与童年期的自我的比较中追溯出来。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被在压抑的神经过程中发生在婴儿身上的那种作用所支持。

总而言之,幽默比诙谐更接近于滑稽,它与前者共同分有它的心理定位,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假定的,诙谐是作为无意识和前意识的妥协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幽默不具备诙谐和滑稽共有的那些特性,对这些特性我们或许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滑稽的产生,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我们将被迫同时或紧密相随地将两种不同的观念形成方法运用到同一种观念形成活动中,在这之间产生了比较和滑稽的差异,这类差异产生于属于别人和某人自己的事物

之间,未变的和已变的事物之间,期待中的和已经发生的事物之间。^①至于诙谐,两种同时发生的看待事物的方法间的差异(它们运行时伴随着不同的能量消耗),适用于诙谐的听者的心理过程。这两种观点之一,循着诙谐中包含的踪迹,沿着思维路径通过无意识过程;另一种则停留于表面,将诙谐看做同那从前意识中出现又变成意识的其他措辞一样。将听到的诙谐中的快乐描述为起源于两种看待方法的不同,这一点我们或许是正当的。^②

这里我们说起诙谐,当它和滑稽间的关系尚有待阐明时,^③我们曾将它描述为长着贾纳斯(Janus)一样的脑袋。

至于幽默,我们已经提出的那个特点变得模糊不清了。的确,当某种我们期待的情感被避免时,我们感到滑稽的快乐,因为这种情感总是伴随着这种情境,在这个程度上幽默处于期待滑稽的扩展概念之下,但是对幽默来说,已不是用两种不同方法看待同一主

① 如果我们想对“期待”这一概念略微有些粗暴,那么我们会像李普斯那样,将滑稽的很大一部分领域归为期待滑稽。但是,也许滑稽的最基本实例(它们产生于别人和某人自己的消耗间的比较)是最不适合这一类(期待滑稽)的。

② 无疑,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公式,既然它不会引起与我们先前讨论相矛盾的任何东西。两种消耗间的差异必须从根本上降低到节省的压抑消耗。滑稽情况下压抑节省的缺乏和诙谐中数量对比的缺乏,将决定滑稽感和诙谐印象之间的差别,尽管它们在对同一观点采用两种观念活动这一方面是一致的。

③ 这种与“两面人”(最初用法语写成)的独特性,自然没有避开权威,麦里纳德(1895),我是从他那里借来这个短语的,可以用下面这段话说明笑的决定因素:“使一个人发笑的一方面是荒唐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熟悉的东西。”与滑稽相比,这个公式更适合于诙谐,但也没有完全包容后者。伯格森(1900)这样定义诙谐情境:“当某种情形同时属于两种绝对独立的事物时,当它可以同时被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加以解释时,这种情境就是诙谐。”

题的问题,情境受要被避免的情感的支配,这是个令人不快的特点,这个事实就结束了把它与滑稽和诙谐相比较的可能性。幽默的移位实际上是把释放出来的能量消耗用在别的地方——这是一种已被表明对滑稽作用是危险的情况。

(八)

现在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任务,将幽默快乐的机制还原为一种类似于滑稽快乐和诙谐的公式。诙谐中的快乐在我们看来产生于压抑消耗的节省,滑稽中的快乐产生于观念(关于贯注)消耗的节省,而幽默中的快乐产生于情感消耗的节省。所有这三种方式都一致地代表重新在心理活动中获得快乐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种快乐在该活动的发展中消失。当我们忽视了滑稽,对诙谐无能为力、无须用幽默使我们生活幸福时,我们倾全力追求的幸福就不过是一段生命时期的心境,在这段时期,我们习惯于使用较少的消耗来处理我们的心理活动。

附录：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谜语

弗洛伊德在第 26 页注脚中对布伦塔诺的谜语的解释是如此含糊，以致需要做进一步说明。在 1879 年，布伦塔诺（以 Aenigmatia 为笔名）以《新谜语》为名出版了一本 200 多页的小册子，书中包罗了各种不同谜语的样本，最后一种被描述为“填补谜语”。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对这些谜语作了说明。按照他的解释，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这种谜语都是令人喜爱的消遣方式，但只是最近才到达维也纳。这本小册子包括了 30 种“填补谜语”的例子，弗洛伊德引用了其中的两个，并不完全准确。把它们全部翻译出来将是使它的结构明晰的最简单的方法：

(24)

“我们的朋友是如此地受到了他所信奉的预感的折磨！有一天，他的母亲病了，我发现他坐在一棵高高的树下。风吹过树枝，许多大树叶掉下来，其中一片恰好掉在他的腿上。于是，他大哭起来，呜咽着说他的母亲要死了，是落那个那个那个引他这样 daldal-dal——daldaldal(das lasse ihn das herabgefallene daldaldal—daldaldal)。”

他本意是想说：“是落叶引他这样想的。”

(28)

“一个印度人病了，医生正在为他开药方，这时突然一个急诊将医生叫走了。医生尽快给他开完处方去看另一个病人。一会儿他听到消息说，那个亚洲人还没来得及吃下为他准备的药，便死于痉挛。‘真是个可怜人！’医生惊惧地自言自语：‘你都干了些什么？’

难道就不能在为那个印度病人那个那个……(indem du den Trank dem daldaldaldaldal—daldaldaldaldal)”。

他本意是想说：“开药时使自己的笔画动得快一点？”

一个英语译本可能使事情更清楚一些：

“强盗们闯进了一家大皮货商的仓库，但是他们受到了干扰，没拿任何东西就逃跑了，而且把展室弄得一塌糊涂。当经理早晨来到之后，向他的助手发出指示：‘不要管那些便宜货，现在最要紧的事是马上找到那个那个那个…(The urgent thing is to get the daldal—daldal)。’”

他本意是想说：“马上找到那些上好的毛皮。”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作者 = (奥) 弗洛伊德著 常宏 徐伟译

页数 = 2 4 5

S S 号 = 1 0 3 5 5 8 8 2

出版日期 = 2 0 0 1 年 2 月第 1 版